

美国加州佛利蒙城小史

S.Z.M.

加利福尼亚州的佛利蒙(Fremont)不仅是湾区第四大城市（仅次于圣何塞、旧金山和奥克兰），也是中国人和华人的一大聚居点。根据2020到2022年的数据，该市的近24万居民中华裔有4万多人，且大多都是懂中文、说汉语的第一或第二代移民。再者，佛利蒙并不仅仅是中产阶级聚居的无聊郊区城镇：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者在18世纪末的探险活动，又在之后的西进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关于该城起源和发展的中文材料几乎不存在；因此，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便是提供一些这方面的基础信息，并且为感兴趣的中文群体描绘佛利蒙充满趣味和意义的历史与现在。

“目的是为了避开人类历史的痕迹被时间抹去……” ——希罗多德《历史》

目录

一、欧洲人到来之前

1-1 旧金山湾的形成和古生物群系

旧金山湾的地质史——俄文顿阶段——贝尔采石场——韦斯利·戈登和男孩古生物学家——俄文顿又角羚——贝尔采石场与680号州际高速公路——托马斯·格雷——儿童自然科学博物馆——洛伦佐·叶兹——加州公路680计划——剑齿虎小径——其他

1-2 最早来到湾区的人类

邓肯码头——加州海岸的气候——洛斯瓦奎罗斯——湾区的贝冢——内尔斯·纳尔逊——四千年前湾区生活的图景——人口统计——坑屋和草屋建筑——饮食——墓葬——“东湾谜墙”——贝冢的再解释——现存贝冢

1-3 加利福尼亚的“中晚期过渡”

加州史前史分期——远古时代的中期和晚期——5世纪的文化迭代——梅加诺斯入侵——贝壳饰品和贝币——梅加诺斯文化的收缩——中世纪温暖时期——自然环境和动物种群的变化——上升流——工具的进步——渔业劳动组织的变化——社会分层的确立

1-4 奥隆尼民族的形成

“奥隆尼”名称的来历——“科斯塔诺”名称的来历——奥隆尼语言的分布——加州语言的分类和历史——迈克尔·莫拉托——湾区的民族史——奥隆尼（科斯塔诺）民族的分化

1-5 奥隆尼人的生活方式：政治和社会组织

子部落的定义——相关争论——奥隆尼统治阶层——选举酋长制——受限制的统治者——继位讲话——战歌——印第安人的战争——踏足侵犯——血亲复仇——跨村庄和跨部落联姻——联姻的好处——等级制酋邦——争论与总结——统治者权力的四个象限

1-6 奥隆尼人的生活方式：宗教和神话体系

库科苏崇拜——入教仪式——崇拜的分支——秘社——奥隆尼人是否崇拜库科苏——资料的缺乏——新的资料——三段有关文本——波莫人的“躺着吞”典礼——米瓦克人的“魂灵礼”——创世神话——库科苏和月亮——巫医秘社——视梦医和衣钵医——神启——动物陪葬品——动物墓葬——库科苏吊坠——其他神话——其他

1-7 奥隆尼人的生活方式：经济和日常活动

图伊班子部落——家庭结构——亲戚和社交禁忌——婚姻与婚礼——怀孕生子——姓名——童年生活——第一次月经——个人卫生——妇女的一天——草篮——植物采集——狩猎——男子的一天——黑尾鹿的利用——传统游戏——礼物经济——跨村庄贸易——私人贸易网络——集市的组织——莎草舟——莎草舟的复原

二、西班牙传教和军事殖民活动

2-1 西班牙人殖民新世界

中世纪西班牙经济——圣雅各之路——黑死病的影响——重商经济——货币需求——攫取型经济——殖民加勒比——金银狂热——殖民中南美洲——监护征赋制——农业的问题——僵化的殖民地贸易——探索加州海岸——英国和法国的挑战

2-2 加州传教所体系的建立

各殖民地人口——佛罗里达问题——俄亥俄河谷——七年战争——巴黎条约——西班牙的领土重整——“加利福尼亚”名称的来历——下加利福尼亚的传教所体系——“缩减加集中”政策——耶稣会和方济各会——何塞·加尔韦兹——驱逐耶稣会——塞拉神父——波托拉远征——传教所的建立

2-3 圣何塞传教所的奠基和早期发展

传教所选址——周边的奥隆尼人聚落——与原住民的复杂关系——原住民的反抗——奠基仪式——王家驿道——相关争论——定居点的样式——传教所早期神父——学徒还是奴隶——迷雾重重的误会——俄罗斯的美洲殖民——娜塔莉亚·谢里科娃——列扎诺夫和朗格多夫——朱诺号之行——康瑟希昂·阿圭罗——土坯教堂

2-4 传教所的政治与经济

纳斯科·杜兰——1806年加州麻疹大流行——传教所建筑群——土地所有权——原住民自治权——原住民官员——殖民政府的结构——代表选举——劳动组织和任务——作为监工的原住民代表——经济资料——罗斯要塞——对外交易的商品

2-5 杜兰神父和传教所的宗教活动

教堂的宗教装饰——装饰品的购置——杜兰神父的信件——饰品捐赠——原住民受洗——违反宗教戒律——不当性行为——传教所内的婚礼——多妻制、离婚与再婚——婴儿的出生和受洗——葬礼——着法衣下葬——杜兰神父和宗教音乐——生徒乐团——特制乐谱——《传教所音乐入门》——管风琴——170年的等待

2-6 传教所外的世界

路易斯·佩拉塔——圣安东尼奥牧场——希圭拉家族牧场——罗伯特·利弗莫尔——扬基商人——美国早期贸易政策——1812年战争——门罗主义——美国在南美的商业扩张——墨西哥独立运动——债券法令——作为金融机构的教会——圣布拉斯军港——船运与补给——1820年西班牙革命——伊图尔维德——墨西哥帝国

三、短暂的“牧场时代”和墨西哥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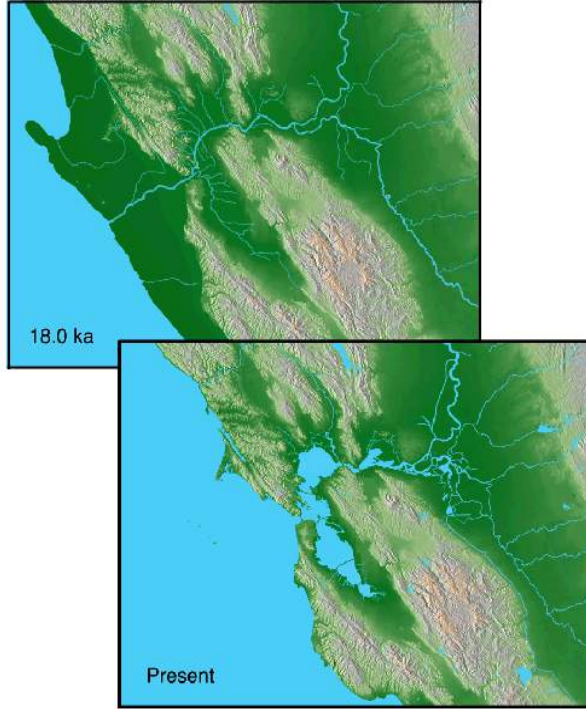
3-1 墨西哥的政治和社会

3-2 传教所的世俗化

3-3 圣何塞传教所小镇的出现

一、欧洲人到来之前

1-1 旧金山湾的形成和古生物群系



如今，任何一个来到湾区的人都不免会觉得旧金山湾的存在天经地义，似乎一直都有这么一潭水横亘在旧金山半岛和东湾的丘陵之间。但是，从地质年代上说来，旧金山湾实际上是很年轻的。实际上，就在20000年前的冰河时代晚期，旧金山海岸的位置还在如今岸线的27英里（43公里）之外。放在整个加州的尺度上这距离算不上什么，但对湾区而言其影响是显著的：如今的旧金山湾那时完全不存在，被一片河网密布的平原所覆盖。如果有人那时站在金门大桥的位置上举目四望，其视线内很可能没有一点大海的踪迹，而是被称为“莎草荡(tule marsh)”的湿地。这种地形极适合各类动物繁衍生息，而佛利蒙又正好处在几条河流的路径上，因此算是当时湾区生物群系的一个热点，生活着诸如晚剑齿虎(*Homotherium serum*)、美洲乳齿象(*Mammuth americanum*)、地懒和巨型短面熊(*Arctodus simus*)等物种。

正因如此，佛利蒙在古生物学史上也留下了一些印记。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一样是很喜欢给远古历史划分年代的家伙，并且他们所采用的标准和称呼在世界的各个地方都不相同。比方说，根据本土动物群的不同，3720万到3390万年前之间的时期在亚洲有的地方被称作“额吉利亚阶段(Ergilian)”，有时又被称为“乌兰戈楚阶段(Ulangochuan)”；与此同时，在北美洲这段时期则叫做“夏卓尼亚阶段(Chadronian)”，很是令人头疼。总之，对于学界来说地质年代的命名是很令人兴奋的事，一般其名称也来自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化石地点。而在北美陆地哺乳动物纪年(North American land mammal ages, NALMA)规范下的24个子阶段中，就有“俄文顿阶段(Irvingtonian)”，跨越了距今190万到25万年之间的时期。而这个“俄文顿”指的就是佛利蒙市下属五个镇区之一的俄文顿区(Irvington)。这是因为在1944年到1960年之间，该区境内的贝尔采石场(Bell Quarry)发现了数量和质量都颇可观的化石。

这个采石场位于两座小峡谷的交汇处，正好靠近南北走向的海沃德断层(Hayward Fault)。这个断层从里士满(Richmond)延伸至圣何塞(San Jose)，是著名的圣安德烈斯断层(San Andreas Fault)的一处分支，在采石场的位置上形成了约100英尺（约30米）的岩壁，正适合石材开发。于是，在采石场主人斯坦利和安娜·贝尔两人的管理下，贝尔采石场自20世纪早期起便一直为南湾地区的几座城镇提供用来铺路的碎石。除了碎石和砾石之外，该处还出产有大量黏土和沙子，都是远古河流冲刷山谷时留下的，在现代建筑行业里的需求也很庞大。

我们说不准最早是谁在采石场的石材原料中发现的化石，但它们首次进入学界视线是在1940年。那一年，一位名叫韦斯利·戈登(Wesley D. Gordon)的古生物学家来到了采石场，捡回了几块猛犸象的骨头，并且和贝尔夫妇搞好了关系，为之后的进一步发掘奠定了基础。不过，认真的研究工作要到四年后才开始；毕竟，在1940年时三十三岁的戈登才当从奥克兰(Oakland)的一家船厂离职不久，通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成人教育上了些金属学方面的课，终于在佛利蒙以北不远的海沃德高中(Hayward High School)谋了份教矿物学的教职，恐怕也鲜有科学资源。不过，他将不少业余时间投入到了市政活动中，和一些热心市民共同推动了海沃德市休闲管理区(Hayward Recreation District)的成立，又在1944年被任命为地区休闲和公园部门的副主任。



在之后的几年里他步步高升，一路做到了东湾地区圣洛伦佐(San Lorenzo)学区的科学事务主任，终于得以重返贝尔采石场探索——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哺乳动物专家唐·萨维奇(Don Savage)的话来说——“可能是北美洲最重要的三处古生物发现之一”。不过这次他还带上了一群被称为“男孩古生物学家(Boy Paleontologists)”的家伙，其实就是一帮十来岁，负责替他翻石头、采化石的半大小子。在若干年断断续续的挖掘后（一篇文章说他们加在一起挖了四百来天），这些“扛着铲子、锤子和刷子”的爱好者们总共获得了大约29000枚化石，包括19种哺乳动物和许许多多植物、软体动物和鸟类物种。据说在其中最高产的时候，他们一天就发掘出了属于68个物种的化石。在1975年10月的一次讲座中，戈登很是自豪地向听众们描述了他们的发掘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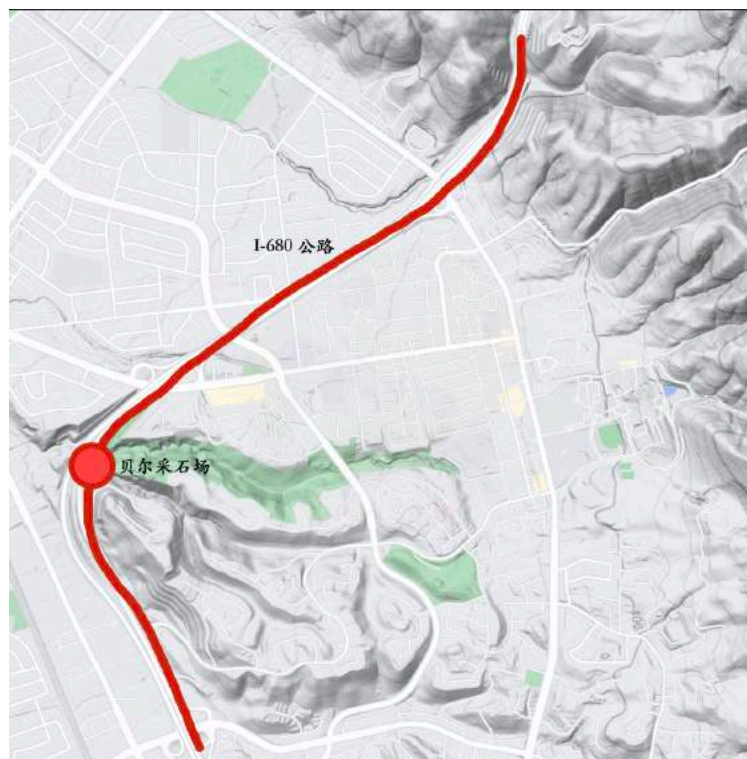
有猛犸象、乳齿象、两种地懒、所能找到最大的熊类——想象一下它像我一样直立起来，足有14英尺（约4.3米）高……也许该说是14英尺长？总之，就是那么高——鹿、只在俄文顿发现的一种羚羊；一个新郊狼种、鼯鼠、老鼠——各种各样的老鼠……这种发掘里总能发现各种各样的老鼠——青蛙、蟾蜍、乌龟、蝶螈、蛇、五种鸟儿，还有各种鱼类；灰狼、獾，还有——不管你信不信——还有海豹。



这些化石中的物种大多生活在距今130万年前的更新世(Pleistocene)，而其中最独特的当属戈登所说“只在俄文顿发现的”一种羚羊。这一物种的学名就叫俄文顿叉角羚(*Tetrameryx irvingtonensis*)，恰如其分地在脑袋上长了四根尖角，和如今只有双角的远亲们大不相同。除了上述物种之外，贝尔采石场还发现了蛤贝、驼类，火鸡、猫头鹰、短尾兔、松鼠以及剑齿虎科和马科物种的化石，其中不少种类一直存活到现在。哪怕是一些如今已经不见的动物，实际上也存活到了人类历史之初，最终才在第四纪灭绝事件(Quaternary extinction)中消亡，其中包括斯剑虎(*Smilodon*)、美洲乳齿象、巨型短面熊、拟驼(*Camelops*)在内的不少物种更延续到了距今1.5万到1万年的更新世末。在一位本地古生物学家笔下，100万年前的佛利蒙实在是个很活跃的地方：

一群猛犸象自由自在地走在长满灯心草、香蒲和莎草的草甸上，一条小河从远古的迪亚波罗山脊(Diablo Range)中流出，蜿蜒着淌下缀有橡树的林地。见一只剑齿虎也来河边汲水，母猛犸象警觉地走到河岸上，挡在掠食者和自己的孩子之间。不过这只剑齿虎看上去体态放松，没有跟踪猎物的样子，显然无意争斗。几只古西马(*Equus occidentalis*)和叉角羚见了，慌忙停步静待剑齿虎走过，才敢继续去河边饮水。不远处有一只拟驼在吃草，更远的地方一只乳齿象才结束了在橡树林中觅食，从林间探头出来也走上了这片草地。两只地懒则忙着咀嚼岸边橡树的叶片，其中一只更用后腿直立，拿长长的前爪去扯树上的枝条。郊狼的远祖也在一旁，正瞧见了只地松鼠。

和第四纪大灭绝同时发生的还有旧金山湾的出现。这一地质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冰川的融化：其所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得加州海岸线被不断吞没、向东收缩——18000年前法拉龙群岛(Farallon Islands)还是加州滨海的一座小山，到了11500年前就成了三面被太平洋环绕的半岛；而到了距今1万年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了孤悬湾区外海的岛屿，一直如此至今。不断升高的海水最终在不到1万年前涌过了狭窄的金门，开始逐渐淹没其后丘陵环抱的平原地带，形成了旧金山湾。于是，曾直接汇入太平洋的诸多河流——比如阿拉米达河(Alameda Creek)或萨克拉门托河(Sacramento River)现在直接流进了家门口的海湾，而它们所携带的沉积物也在湾区各处形成了松软的平原和湿地，为前来定居的北美原住民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那么，这么重要的遗迹现在如何呢？这其实是一个有些尴尬的问题，因为现在如果有人想去贝尔采石场参观一番，也许再捡些化石，恐怕只能失望而归了。随着男孩古生物学家们的挖掘进入尾声，美国正翻过了二战和朝鲜战争的篇章，正待进入一个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自五十年代中叶起，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政府为美国带来了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57)和国家航空航天局，还有至今仍是美国国内交通大动脉的州际公路系统(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湾区作为西海岸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自然也迎来了建设的大潮。其中一条南北干路——I-680——就计划直接通过采石场的位置。毕竟，它坐落在两座丘陵间的谷底，免去了路政人员开山破洞的麻烦。

这一决定似乎是在1957年年初作出的，而到了3月份，佛利蒙的居民们便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很是激烈的辩论。3月12日，佛利蒙下辖米申-圣何塞(Mission San Jose)区的商会以39比1的绝对多数对公路案表示了支持，认为这条路线的最大好处在于不会影响到已有的居民区，也不会难看地杵在镇中

心。唯一持反对意见的商会代表则指责其他人受了“希望开发采石场周边地产商”的影响，希望能把公路往东迁移一英里。为了平息反对的声音，商会规划委员会的主席指出州政府会资助开展抢救性挖掘，还保证在公路建成之后采石场剩下的部分会被改造成州立公园。

对一些居民来说，能抢在公路建成前挖空化石储藏就足够了，至于采石场本身保留与否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早在3月4日，当地报纸就刊登了题为《州政府拟拯救化石》的文章，很欢喜地报告说“加州公路部预计离高速动工至少还要两年，因此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发掘项目”。这位记者还有些骄傲地宣称“这样一个由州公路部和公园部合作开展的科学项目，在加州历史上还是头一回”。但是，许多佛利蒙市与阿拉米达县的居民从根本上反对这个工程，其中就包括韦斯利·戈登。他一直希望采石场原址能作为公园得到完整保留，从而为之后几代的学生们提供第一手接触古生物学的机会；他还提出在其中建设一座儿童博物馆来储存俄文顿时期的各类化石——一篇报道告诉我们，当时足有12000件化石正躺在戈登家的车库里无处可去，迫切需要良好的管理和保存。于是，他写信给了州立印第安博物馆(State Indian Museum)的馆长兼州首席考古学家利德尔(Francis A. Riddell)，对方则表示“自己可能在公路改道问题上有些话语权”。与此同时，加州州立公园系统的历史学家尼尚(V. Audrey Neasham)也对俄文顿化石群的价值表示了肯定，并和公路局的工程师们进行了接洽。一瞬间，贝尔采石场的命运似乎有了扭转的可能。

可惜的是，佛利蒙的地方官僚们似乎都很支持现有的公路计划。在地方商会压倒性地通过规划的第二天，佛利蒙市议会以4比1的多数批准了州公路局的路线。这催生了又一波广泛的反对声潮，其中有一位叫托马斯·格雷(Thomas M. Gray)的俄文顿农场主似乎尤其活跃。关于他的生平我们并不知道多少，但他在1957年写给政府官员的若干信件倒是被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保留了下来，让我们得以一睹当时决策背后小人物们的行为思绪。他的第一封信寄给了加州自然资源部公园局的负责人祝利(Newton B. Drury)和加州第八选区的联邦众议员乔治·米勒(George P. Miller)。米勒也来自东湾，当过工程师和加州野生动物及鱼类部(Department of Fish and Game)的执行秘书，因此似乎对古生物一类的事情很是上心。在回信中他指出公路建设是纯粹的地方事务，因此身为联邦议员的他可能帮不上什么忙；但他仍然赞赏了格雷“和其他人”为“保护俄文顿化石层”而做出的努力，又推荐他去联络东湾阿拉米达县(Alameda)的管理委员会和州议员。

我们不知道格雷有没有听从米勒的建议，但在收到回信的四天后他又直接联系了联邦政府的内政部长，还贴心地给总统办公室抄送了一份。在信中他挺诚恳地写道：“几年前俄文顿化石的发现是唯一一件把加州的这个角落推上国际舞台的事情，如今加州公路委员会却要用高速将其覆盖”，又敦促联邦政府尽快介入。最后，他还不无煽情地表示：“这整片区域早就应该被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了；还是说如今的美国公民们已经对自然历史不感兴趣了？”过了一个月他终于收到了最终回复——当然不是内政部长或总统写的——而是来自国家公园管理局第四区的副主任、曾在黄石、科罗拉多大峡谷和优胜美地当过建筑师的赫伯特·迈尔(Herbert Maier)。在信中他说得不很委婉：

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政策是去保存那些有全国范围杰出价值的地方。现在管理局治下已有多处重要的古生物研究区域了，譬如犹他州的国家恐龙纪念碑(Dinosaur National Monument)、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和石林国家纪念碑(Petrified Forest National Monument)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死亡谷国家纪念碑。因此我们不认为俄文顿化石坑拥有值得联邦政府永久保护的价值。

随后他又把皮球踢回给了格雷已经联系过的加州官员们：

我们建议你联系利德尔先生或加州公园部门的主任纽顿·祝利，地址是萨克拉门托市州府大道721号。

不过，迈尔也提到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和佛利蒙商会一样，他提出可以由加州政府组织紧急发掘。前文提到的利德尔被指派来负责该项目，但一切看上去似乎并不很紧迫。毕竟，就像一位支持公路建设的商会代表所指出的那样，在1957年时距离公路拨款的批准也还要至少两年，距离工程落地更是遥遥无期。事实也确实如此——这段公路直到近十年后的1966年才开工，那时的项目负责人也已经从利德尔换成了伯克利古生物学系的女研究生让·菲尔比(Jean Firby)，但戈登仍然作为其副手活跃在发掘第一线。不过对于保护主义者和科学家来说，不管多少年恐怕也是不够的。1965年的一篇报道就有点煽情地采用了“公路前”纪年，而菲尔比和戈登也雄心勃勃地计划在采石场存在的最后一年里“至少发现五个新物种”。

到头来，贝尔采石场总共产出了超过15万件标本。其中大多数都送去了伯克利的古生物学系储存，如今还能在其古生物博物馆里找到。但戈登成功说服自己曾任职的圣洛伦佐学区资助他开了一家小小的“探索博物馆(Wesley Gordo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Discovery)”，几度迁址，在戈登于1983年去世之后仍维持了将近十五年，才终于在1997年花光了经费。在那之后，佛利蒙本地一个名叫“数学和科学核心(Math/Science Nucleus)”的民间教师和研究者协会伸出了援手；自那之后，这批化石就一直在该组织的总部，也就是位于佛利蒙市中心的儿童自然历史博物馆(Children's Natural History Museum)对外展出。时至今日，在这座蓝色屋顶小楼二层的“韦斯利·戈登化石厅”，好心的志愿者和地质学家们仍然会向参观者们展示玻璃柜里来自贝尔采石场的冰河动物残骸。除此之外，一小部分标本也被捐给了市里的奥隆尼学院(Ohlone College)和历史博物馆(Museum of Local History)，现在仍然静待不多的游客前去探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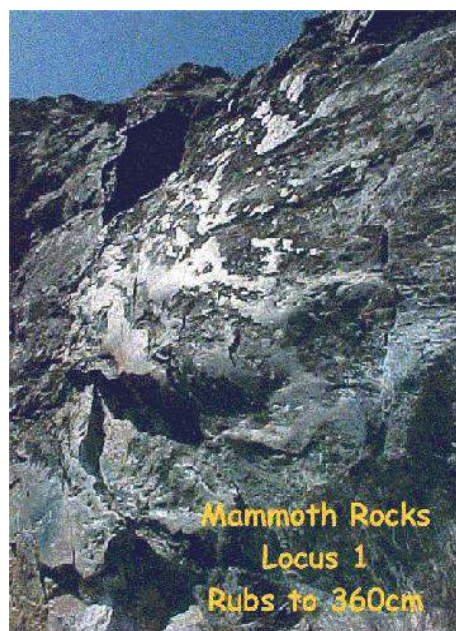
如果这些游客或本地住户注意观察，他们不难在佛利蒙各地发现和化石有关的痕迹。有时这样的发现是偶然的。事实上，佛利蒙最早发掘出的化石就是两个文化人在探矿时发现的：那是1871年7月的一天，来自森特维尔(Centerville)——后来会成为佛利蒙的一部分——的叶兹(Dr. Yates)和查尔斯·艾伦(Dr. Charles Allen)正走在米申-圣何塞附近斯托克顿峡谷(Stockton Cañon)中的河床边，不知怎么地就在“四十英尺深的地方”发现了一块乳齿象的颞骨化石。洛伦佐·叶兹(Lorenzo Gordin Yates)那时34岁，正在协助挺著名的、持续了整整十四年的加州地质大测绘(California Geological Survey)。早在1867年他就在阿拉米达县境内发现了“大象、乳齿象和水牛”的化石，但由于缺乏信

息，我们也说不准它们到底是不是在佛利蒙出土的。后来叶兹当上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会员，在学术上和当时的古生物研究大腕奥斯尼尔·马什(Othniel Charles Marsh)打过交道，还成了第一个发现索齿兽(*Desmostylus*)化石的人——这是一种在七百多万年前灭绝的哺乳动物，看上去有点儿像更难看的河马。而他在古生物学领域的兴趣和专业，也许就是在佛利蒙的土地上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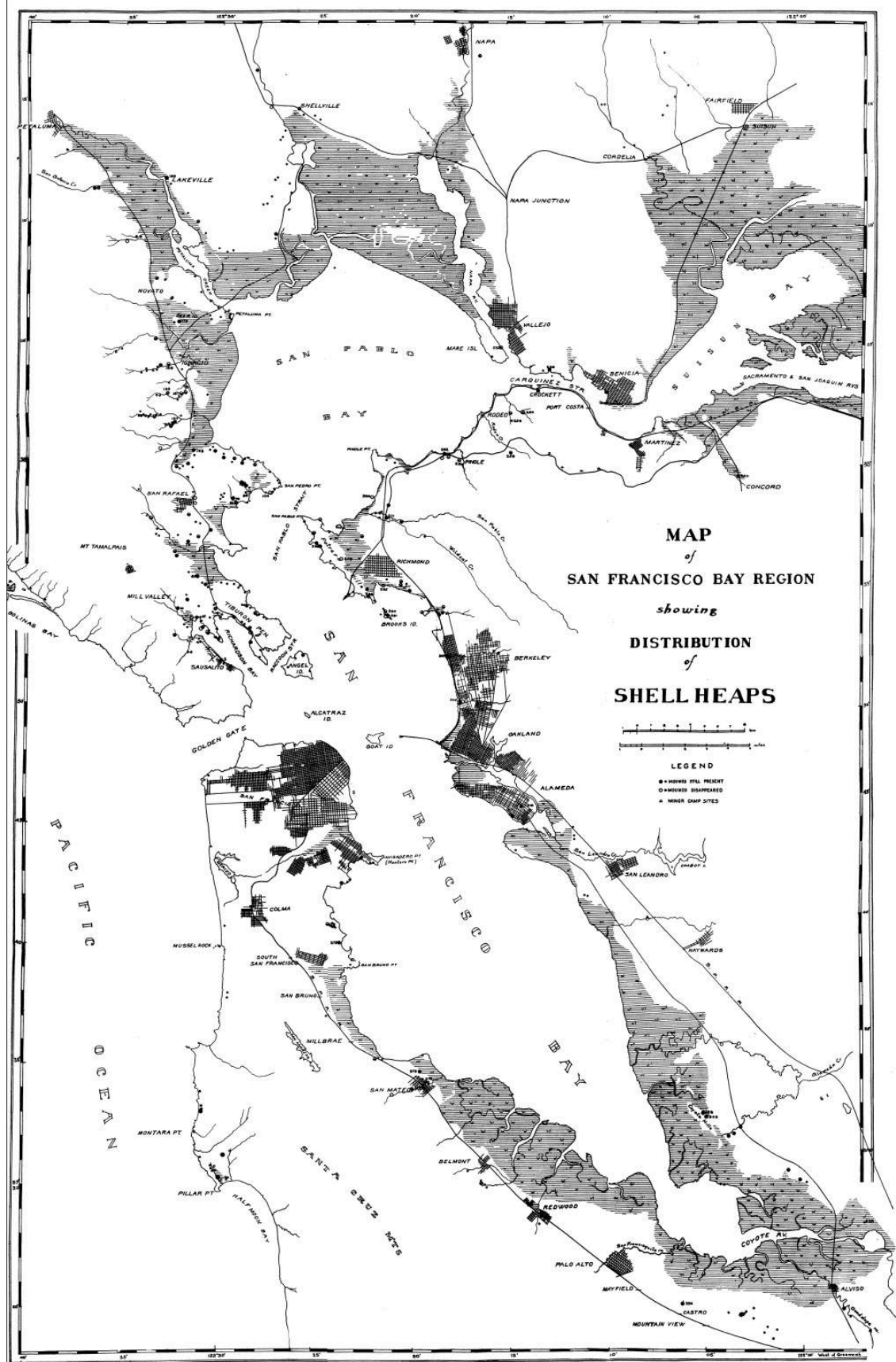
另外一些故事则没那么浪漫主义。在2013年8月，一批工人在佛利蒙的温泉(Warm Springs)区布置地下水管时碰巧挖到了一些化石。同样的事情在2018年再度发生，不过这次的主角换成了正在拓宽佛利蒙和苏诺尔(Sunol)之间680号高速路段的加州交通部(Caltrans)雇员。在政府古生物学家的监督之下这些化石都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其中一些目前也陈列于韦斯利·戈登化石厅。不过，它们的年代比贝尔采石场的俄文顿时期化石晚近得多，基本全部来自距今24万到11000年间的拉布里亚(Rancholabrean)阶段。这一阶段得名自洛杉矶附近的拉布里亚沥青坑(Rancho La Brea)，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物种是至今仍能看见的北美野牛。以上两处发掘地离贝尔采石场都只有十分钟左右车程，再次证明佛利蒙周边地区在一万多年以前的确存在很丰富的冰河时代生态。一方面为了纪念这段自然历史，一方面也为了给当地居民提供徒步锻炼的地方，2009年时佛利蒙市政府通过决议花250万美元购买了俄文顿和米申-圣何塞两区内剑齿虎小溪(Sabercat Creek)边的14英亩土地，创造了同名的“剑齿虎小径(Sabercat Trail)”。在小径的末端是一处树林稀疏的山坡，从顶端看下去还能看到山谷中车辆川流的680号公路，以及被它永远掩盖的采石场。

1-2 最早来到湾区的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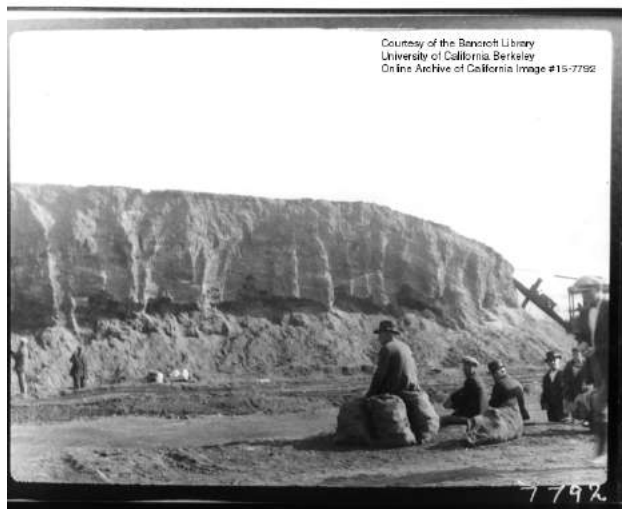
现代人类最早在四万年前跨越白令陆桥(Beringia)进入现在的阿拉斯加地区，并且最迟在距今16000年时开始了对北美洲的拓殖。在一万年前，也就是拉布里亚阶段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最早的人类出现在了加利福尼亚境内。他们的第一处据点很可能是位于索诺玛(Sonoma)县海岸的邓肯码头(Duncan's Landing)，在旧金山以北开车大概两个小时的地方。在这儿有座被称为“邓肯码头岩石庇护所(Rockshelter)”的石穴，其中的石器经测年距今大约有9000余年历史，很可能是原始人的打猎用具。对他们来说，住在这儿也是很合理的——离庇护所四公里半的地方树立着若干块磨得很光滑的大石头，被称为“猛犸石(Mammoth Rocks Site)”，其实就是当时包括猛犸象在内一些大型哺乳动物蹭痒的地方。除此之外，邓肯码头离俄罗斯河(Russian River)的入海口也不远；在一万年前极可能位于内陆的圣罗莎平原(Santa Rosa Plains)和太平洋海岸之间的“兽道(game trail)”之上，猎物充足，对原始人生存极为有利。



事实上，包括湾区在内的整个加州海岸在当时都极为宜居。北美史前考古学的元勋之一，出生于丹麦的内尔斯·纳尔逊(Nels C. Nelson)在190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世上找不到另一个维度跨越如此之大，却还能保持一致温和气候的地方了”。凭借着温暖的洋流和平缓的海岸平原，加州海岸成了那时动植物茁壮发展的理想环境；不仅如此，湾区周边的山脉还提供了自然屏障和充足的淡



水，更和诸多河流一起把海湾平原切割成了资源丰富的小区域，适合小股人类以单独部落和村庄的形式繁衍生息。一个这样的小区域便是佛利蒙东北方向一小时车程的洛斯瓦奎罗斯(Los Vaqueros)。这个地方如今成了个水库，但在一万年前还是一处群山环绕的谷地，凯洛格溪(Kellogg Creek)流经其中，四周的山坡上有着自然形成的岩石露头，正适合原始人遮风避雨。和邓肯码头一样，该处的人类居住史也可以追溯到9000年前（一个更确切的说法是9870年前）。除此之外，南湾圣塔克拉拉(Santa Clara)县内也有几处差不多古老的遗迹，但可惜佛利蒙市内并没有可以与之比较的原住民定居点。



这主要是因为旧金山湾的海岸线直到距今4000到5000年前才确定下来。因此，比起内陆丘陵地区的洛斯瓦奎罗斯和北部海岸的邓肯码头，佛利蒙和其他旧金山湾沿岸城市的原住民遗迹都拥有统一的测年结果，差不多都在四千年左右。这些遗迹中数量最多，保存也最完好的当属“贝冢(shellmound)”或“贝丘(midden)”，也就是原始人吃完肉后丢弃的贝壳堆积——由于史前时代当然不存在垃圾车和远离居民区的填埋场，这些垃圾总是被丢在离聚居点不远的地方，通常很好地标示了原住民村庄曾经所在的位置。而第一位对它们进行统计的就是前文提到的内尔斯·纳尔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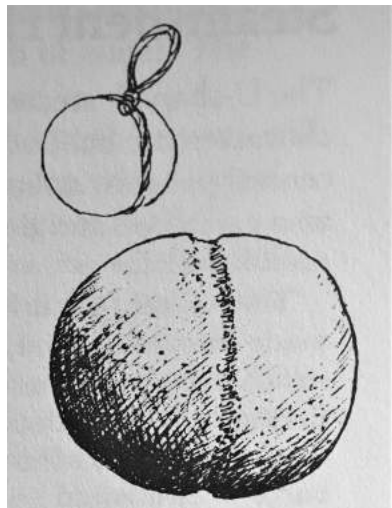


纳尔逊来自一个没什么钱的丹麦农家，从小没上过几天学。1892年时，17岁的他应叔父之邀只身来到美国，去明尼苏达州的农场上帮工，才真正开始了小学一年级的英语教育。用一名传记作者的话来说，“在我们已经能拿到博士学位的年纪，26岁的纳尔逊才刚高中毕业”。事实上，毕业后他似乎也不太确定自己的未来计划，先是在明尼苏达学了些神学，又打零工攒钱去加州的斯坦福大学读了一阵子哲学，后来才在朋友的建议下去伯克利研究考古学，期间还在一家银行当清洁工补贴家用，终于在1908年拿到了硕士学位。

而对湾区贝丘的调查就是他的毕业论文题目。纳尔逊花了一年时间遍走湾区各地，识别出了425处贝壳堆积，其中在今天佛利蒙境内的有8处外加一个小型原住民营地。这些贝冢大多是椭圆形的小丘，通常和海岸线平行，其中时常混杂有碎石泥土，为植物扎根提供了条件。因此，一些贝冢远看之下和自然形成的山坡丘陵无甚差别。纳尔逊注意到，比起南北美洲其他地方的贝丘，湾区的样本似乎更加原始——它们规模更小、没有被堆成特别的形状，也不具备防御功能。但是，其中发掘出的文物仍种类齐全，包括石制和骨制的箭簇、矛头、针、臼、捶打器、哨子、烟斗、捕鱼时候用到的沉子和似乎没有实用功能的饰品，比如贝壳挂坠和纺锤形的“符石(charmstone)”。

纳尔逊也注意到，这一时期的湾区原住民文化大约可以被形容为对内分化而又对外统一的。说它“对内分化”，是因为在不同的贝丘里时有发现作用显然一致，但样式有所区别的工具。他在论文里专门举了两个例子，同时不忘指出除此之外“还有其它显明的案例，只待后续调查研究”：

比方说，在一些贝丘遗址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带沟痕的(grooved)沉子，但在另一些靠得很近的遗迹中却完全找不到此类样本。同样，一个类型的石臼只在湾区的东北地区有所发现——大多数石臼都是桶形或平底球形的，但它们却是长方形的大石板，在磨平了的一面上有着碗形的凹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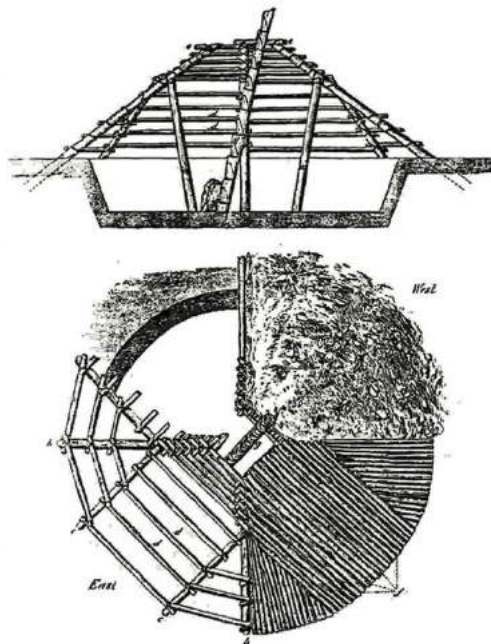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说它“对外统一”，是因为尽管湾区内部的不同贝丘有着工艺上的差异，它们仍然共享一些最重要的特征。比方说，虽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大多数史前贝丘中都发现了人们制作并使用陶器的痕迹，在湾区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证据。事实上，西班牙殖民者在18世纪60年代来到这一地区时也注意到“洛杉矶盆地以北直到旧金山湾区的原住民仍不知陶器为何物”。相比陶器，湾区的篮子倒是很出众——我们后面会再提到。除此之外，我们在湾区贝丘中也找不着原住民冶炼金属的痕迹，尽管纳尔逊告诉我们西北海岸（华盛顿州）的部落在那时已经掌握了相关技术。在这两点上，湾区和北加州包括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和蒙特雷(Monterey)在内的几个地区是很一致的——北美原住民的金属制品集中在在阿拉斯加、加拿大的育空(Yukon)地区、大湖区、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大西洋沿岸的一些地方，以及墨西哥，但在加州，尤其是北加州却丝毫不见踪影。如果你在地图上标出美洲每一处有原始冶金迹象的遗迹，就会发现加州大部好像被故意跳过了似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加州被东边的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北部的克拉马斯山脉(Klamath Mountains)和东南部的沙漠围成了一个独立的地理区域，和外界经济与技术上的交流本来就少，加上北加州河网纵横、水草丰茂，也缺乏跨地区迁徙或贸易的动机，更杜绝了冶金、制陶一类工艺的传播。

通过这些贝丘，我们也许能一窥三四千年前湾区原住民生活的图景。在海湾四处散布着数百个贝丘，其中在南湾和北湾最为密集，在一些地方更形成了小型聚落。纳尔逊估计整个湾区在那时大约有12000人居住，一直到18世纪都还是北美大陆上除墨西哥阿兹特克(Aztec)文明外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这一统计方法靠的是一些贝丘周围遗留的住宅坑数量，用它乘以传统上的原住民家庭人数就能得到比较准确的聚落人口数据。这个方法实际上很简单，但不知怎地直到1869年才被一个叫史蒂芬·鲍威(Stephen Powers)的记者兼探险家第一次使用。有意思的是，他“发明”这一计算方法时也正在加州考察，后来把研究成果编成了很受欢迎的《加州诸部落(Tribes of California)》一书。总之，利用这一数数方法，纳尔逊发现每座贝丘平均对应五幢住屋，每屋六人。这样估算下来，三千年前佛利蒙的人口大约在250左右，其中约150人集中在海边的郊狼丘(Cayote Hills)。

和他们的后代一样，这些人很可能住在莎草(tule)编成的圆屋或低矮的土屋里，因为这些材料是在当地最容易取得的。这些小屋的选址一般在溪流的岸边稍高过涨水时节水位的地方，有时他们还会运来河泥填平建屋的地基。每年春天都是扩建聚落、修整旧屋的好机会，因为一旦到了炎热的

夏季，被毒辣阳光烤硬实的大地会让挖土变得困难无比。总之，那时的建筑师们得先在地上挖出直径3到5米的浅坑——这么做不仅保证了室内冬暖夏凉、减少了恶劣天气的影响，还节省了建筑材料——然后在坑里立起粗粗的木杆，支撑着数根细一点的木梁；木梁上则铺有苇草编成的席子，在用随处可见的小草填上空隙，最后，人们把挖坑时掘出的泥土铺到草席上，待其干透后就成了遮风挡雨的屋顶。这个屋顶的正中通常开有一个供室内火堆散烟的方洞，同时也用作出入的“天窗”。



相比这样的“坑屋(pit house)”，完全建在地上的莎草屋(tule hut)似乎在湾区的东南方向更为常见，包括阿拉米达和圣华金(San Joaquin)两县。这种屋子一般体积较小，说到底就是在树枝搭成的圆锥形框架外盖上几层莎草席子而成的简单建筑，从防风、挡雨和生火等方面说来都不算特别方便。可惜的是，由于有机材料难以保存，我们并没有机会一睹真正原始莎草屋的样貌。不过，在佛利蒙海岸上的郊狼丘地区公园(Coyote Hills Regional Park)，游客们每月有两天可以钻进参观信息中心门口的粗糙复制品里一探究竟。公园讲解员可能还会不太好意思地告诉你这其实是一位童子军为了挣到最高的鹰级等第(Eagle Scout)而做的手工项目，所以苇草编得不如真正的原住民那般整齐厚实。当然，湾区原住民的建筑形式远不止坑屋和锥形草屋。北加州的波莫人(Pomo)和约库特人(Yokut)有时会用苇草、树皮和其他材料建起10米多长、5米来宽，顶高3米有余的椭圆形长屋，每座足以容纳好几个家庭作息。他们也会为了休闲和宗教建设不同版本的坑屋和草屋，譬如举行净化仪式的“汗屋(sweat lodge)”和直径可达18米的大型“舞蹈屋(dance house)”等等。不过，我们也许可以猜想这些更复杂的建筑都是年代更晚，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产物。因此，在出现新的考古证据之前我们最好还是谨慎些，称四千多年前的湾区贝丘人仅仅居住在简单的坑屋和小草屋里而已。



哪怕如此，研究者们也提醒我们他们绝非落后的原始野人。在普通的一天里贝丘人的男性会披着毛皮出门打猎捕鱼——用的是石矛、骨矛和绑着石块的渔网（当时他们还未发明弓箭）——而女性则负责用苇草篮子采集植物，再用石臼把其中一些捣成粉末加工食用，比如至今仍可见到的“橡果粉(acorn flour)”，被一部1933年的黑白短片称为“加点儿熊果(squawberry)的刺激，就成了只有印第安人享受得来的珍馐”。到了日落时分，男人们总能带回各种各样的肉食——贝丘中出土的动物骨头证明他们是很成功的猎人——比如麋鹿、水獭、兔子、海狮、鸭、鹅，甚至臭鼬和豚类。他们显然也捕到过灰狼，但从未成功将其驯化。在这一问题上，纳尔逊也作出过挺有趣的观察：

[我们注意到]鸟骨，主要是鸭子和涉禽的骨头，尤其在贝丘的上层是极多的。它们的存在指出了两点…其中第二点是，此处的居民们从未拥有过驯化了的家犬。要得出这个结论并不困难：如果这个地区曾存在饥饿的半野狗，这些鸟骨是不可能保存得如此完好，不受干扰的。

除了陆地动物和植物产品之外，贝丘人的食谱还包括若干鱼类和差不多15种贝类，譬如牡蛎、贻贝、蛤贝和蜗牛。不过，他们似乎不会把鱼带回家里，因为贝丘里的鱼骨数量少得惊人；纳尔逊猜测鱼肉被带到了单独的地方处理储存。我们知道贝丘人早就掌握了用火的本事，所以易于制作和保存的熏鱼也许在那时已经成了他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晚餐之后，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石器时代居民一样，贝丘人可能也会以家庭为单位聚在火堆旁分享生存经验和口口相传的故事。由于他们缺乏任何形式的书写体系，我们无法得知其确切的思想或信仰，但从这些聚落的物质遗存中可以推断出他们确有着抽象思考和创造的能力。贝丘人会将同聚落的死者小心地埋葬在贝丘里，还会在尸体下铺上一层木炭和一层红色的铁氧化物。除此之外，有时他们还会在死者身边留下其生前的衣物、工具和饰物——男性的话一般是武器和烟斗，女性是石臼和石杵，小孩则统一和装饰用的小珠子和海贝为伴。考古学家们也找到了贝丘人使用红色涂料的证据，但没有任何艺术痕迹——不论是墙上的还是身上的——留存。

由此可见，虽然我们可以推断出几千年前湾区原住民生活的大致场景，关于他们仍有很多谜团。可能正因如此，有关的考古传说层出不穷。纳尔逊就提到在湾区北部瓦列霍(Vallejo)市的马累岛(Mare Island)上有座贝丘，据说里头出土过一块“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石板”，而附近圣巴勃罗县(San Pablo)里的贝丘中则“传言”发现了一片不该出现在原始北美社会的“红色丝绸”。可是这些发现要么拿不出证据，要么资料太少或者可以勉强解释为殖民时代跨地区贸易或后期污染的结果，引不起什么大众好奇心，最终只是昙花一现。相比之下，一个引起人们比较长久兴趣的流言是所谓“东湾谜墙(East Bay Mystery Walls)”，一系列断断续续、半人左右高的石墙，从圣何塞附近沿着东湾的丘陵山脊延伸到伯克利，也可以在佛利蒙东部的米申丘陵(Mission Hills)上看到。



一篇2018年的文章将这个谜的起源追溯到了1896年3月8日《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上的报道，提到说在那时东湾山上“石墙遗迹的来源已经困扰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许久”了。自那时起，不少民间人士开始提出一个又一个狂想：有的说它是亚特兰蒂斯大陆的殖民地，有的说它是中国来的古代巨人之杰作，还有些保留了一定理智的家伙则比较保守地说它可能是中美洲托尔特克(Toltec)或前托尔特克文明的前哨——换句话说，至少也得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了。有趣的是，专业人士的加入并没有帮到什么忙：1904年，加州大学的化学教授亨利·科芬贝里·迈尔斯(Henry Coffinberry Myers)——科芬贝里家族似乎是一群很喜欢刨根究底的人，在1927年出版了一本六十多页厚的家族史，甚至在1952年再版了一回，其中亨利的名字

被并列在贡献者的栏目下——声称自己在石墙附近找到了奇怪的“五面石像(five-faced stone image)”和石斧，通过一些乱七八糟、后来被怀疑是个噱头的分析得出结论说石像的历史“在一千到一万年之间”——可能和贝丘的居民们扯得上点关系。近来更可能的解释是这些石墙仅仅是19世纪农场和牧场主标记土地边界的手段。但是就算这样，仍有两件事不可否认：一是人们一直以来对湾区古印第安人充满着浪漫化和神秘化的想象；二是人们对他们的了解实际上还是少得可怜。

艾伦·列文索尔(Alan M. Leventhal)的研究就很好地证明了这第二点。他是湾区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SJSU)的人类学讲师，在70年代辗转于纽约州和内华达州的几所博物馆和政府部门从事考古方面的工作。在他1993年完成的、长达450多页的专著《从葬仪角度对一些湾区贝冢的再解释》中，列文索尔反驳了包括纳尔逊在内一批考古学前辈的理论，认为贝丘并非简单的垃圾堆积，而是逐渐发展成了仪式性、甚至宗教性的地点，专门用来埋葬并纪念聚落中的死者。他认为贝丘遗址中的动物骨骼和工具遗存比起长期定居点而言数量实在太少，更像是原住民们偶尔聚集、举行活动的场所。不过，仪式场地和日常聚落的分野并不是那么明确的——更有可能的是，在聚落形成之初贝丘的确仅仅是丢弃垃圾、厨余和废弃工具的便捷场所；但是很快人们注意到，松软的贝丘不仅仅是挖掘墓葬的好地方，也是当时技术条件下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人造物。于是随着原住民社会的发展，贝丘逐渐成为了仪式的中心地点，丧失了纯粹的实用意义。

和贝尔采石场一样，贝丘作为湾区历史的重要见证如今也消失在了城市化的进展之中。纳尔逊在将近120年前就抱怨说许多贝丘在他有机会参观考察前就被推平了，而其中最大、最壮观的爱莫利维尔贝丘(Emeryville Shellmound)也在1924年被工厂取而代之，只在原地留下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土丘。可惜的是，自纳尔逊之后似乎再没有人对湾区的贝丘做过整体性调查，所以我们不能百分百确定那425处贝丘中幸存的还有几座。就这个问题我查了不少资料，又问了在东湾地区公园部门(East Bay Regional Parks)工作的负责人杰里米·斋藤(Jeremy Saito)，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湾区很可能只剩下了20世纪初贝丘数量的0.5%——也就是2座。其中一座位于里士满市的布鲁克斯岛(Brooks Island)，另一座则坐落在佛利蒙海滨的郊狼丘上，默默讲述着湾区第一批居民的故事。



1-3 加利福尼亚的“中晚期过渡”

从四五千年前的贝丘居民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湾区的经济、社会和技术都没什么大的变化，直到距今1100年到750年前的所谓“中晚期过渡(Middle/Late Transition)”。不过，在介绍这一过渡之前，我们最好先简单了解一下加州历史的分期——确切地说，加州史前史的分期。和其他地方的史前史一样，许多加州历史阶段都是以某个特定的、具代表性的遗址命名的。考虑到哪怕在同一时期，一个地方的遗址可能也不能很好地代表邻近的另一人群，加州的各个地区大多有着互相重叠，名字也各不相同的历史分期，大致如下图所示。

距今 (~年)	公元 (年)	加州各地区历史阶段名称 (部分)				
		旧金山湾区	萨克拉门托河口	萨克拉门托	加州中部	全州范围
>11000	/					旧印第安时代 Paleo-Indian Period
11000	前9000					
10000	前8000					
9000	前7000					远古时代早期 Lower Archaic Period
8000	前6000					
7000	前5000					
6000	前4000					远古时代中期 Middle Archaic Period = 早期范围 EARLY PERIOD
5000	前3000	斯泰格 Stege	石谷 Stone Valley			
4500	前2500					
4000	前2000					
3800	前1800					
3600	前1600					
3400	前1400					
3200	前1200				加伍德 Garwood	
3000	前1000					
2900	前900					
2800	前800	早湾 Early Bay				
2700	前700					
2600	前600					熊溪 Bear Creek

2500	前500					
2400	前400					
2300	前300	帕特森 Patterson	康科德 Concord		霍兰德 Holland	
2200	前200					
2100	前100	卡斯特罗 Castro	斯莱特 Slater	摩斯 Morse	卡索 Castle	远古时代晚期 Upper Archaic Period
2000	0					
1900	100	阿尔瓦拉多 Alvarado				=
1800	200			希克斯 Hicks	伍兹 Woods	中期范围 MIDDLE PERIOD
1700	300	舍伍德 Sherwood	加灵多 Galindo			
1600	400			布拉希尔 Brazil	奥伍德 Orwood	
1500	500	费利佩 Philippi	拉蒙 Ramon			
1400	600	索布兰特 Sobrante		尼德 Need	马丁 Martin	
1300	700		努切斯 Nueces			
1200	800	庞切 Ponce	马特比 Maltby	卡尔霍恩 Calhoun	达尔波多 Dal Porto	显现时代 Emergent Period
1100	900					
1000	1000	克罗克 Crocker	韦尔 Veale	艾钦伯格 Eichenberger	卡尔迪诺 Cardinal	=
900	1100					
800	1200	湾岸 Bayshore	霍奇克斯 Hotchkiss	霍利斯特 Hollister	帕克 Park	晚期范围 LATE PERIOD
700	1300					
600	1400	纽瓦克 Newark	丹维尔 Danville	约翰逊 Johnson		
500	1500					
<div style="display: flex; flex-wrap: wrap;"> <div style="width: 33%;"> 埃利斯码头时期 Ellis Landing</div> <div style="width: 33%;"> 霍利斯特时期 Hollister</div> <div style="width: 33%;"> 爱莫利维尔时期 Emeryville</div> <div style="width: 33%;"> 摩斯时期 Morse</div> <div style="width: 33%;"> 梅加诺斯时期 Meganos</div> <div style="width: 33%;"> 其他时期（见表格内标注）</div> <div style="width: 33%;"> 磨石文化群 Milling Stone</div> <div style="width: 33%;"> 伯克利文化群 Berkeley</div> <div style="width: 33%;"> 奥古斯丁文化群 Augustine</div> <div style="width: 33%;"> 文德米勒文化群 Windmiller</div> </div>						
注：左侧栏中时间对应的是方框的下划线；比方说，公元1300年指的是“700/1300”两个方框下加粗的黑线						
表格资料整理自加利福尼亚考古协会 Society for California Archaeology 资料索引，具体见书末所引材料						

如上可见，最早的湾区贝丘人大约出现在远古时代中期的斯泰格阶段——正像前一节中提到过的那样，这个时代出现了以贝丘为中心的定居点、较多样的食物来源和一定程度的象征和艺术表达，但整体还比较原始。远古时代中期大约在公元前500年进入了尾声，而远古时代晚期则一直持续到了公元第一个千年以后，在大约公元1050年正式步入了所谓“显现时代”。由于远古时代晚期也被称为整个加州史前史的“中期范围”，而显现时代又被称为“晚期范围”，这两个阶段交接的那几个世纪——大概在10和13世纪之间——便被顺理成章地称为了“中晚期过渡”。

在远古时代晚期的上半部分，湾区的一切和贝丘人的时候相比没有什么变化：人们抛弃了磨成长方形的贝壳，但螺旋形和碟形(saucer)的橄榄贝(*Olivella*)作为装饰品则开始流行；在湾区的一些地方首次出现了鱼叉、用麋鹿腿骨制成的铲子(spatulae)——有点像现代人炒蛋时会用到的那种——还有一种被叫做“卷圈”的制篮(coiled basketry)技术。但总地说来，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经济模式都还是老样子。可是到了5世纪以后（被一些学者称为绕口的远古时代晚期末端 Late Upper Archaic），湾区似乎发生了某重大的文化迭代，极大打击了以碟形橄榄贝为主要饰品的湾区土生居民（在学术著作里被叫做M1类型）。在公元430年到500年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湾区的103处已知M1类型定居点中有53处遭到了废弃，而剩下的居民点中也神秘地出现了大量海獭骨，也许代表着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很大改变。这一迭代的罪魁祸首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最可能的嫌疑人是来自加州中部、圣华金河三角洲(San Joaquin Delta)附近的梅加诺斯文化。这个文化不仅摧毁了东湾已有的文化风俗，还带来了属于自己的物质文化，同样根据贝类饰品的外形被分为M2、M3和M4三个类型，分别指向马鞍型(saddle)橄榄贝饰品、方形小马鞍型橄榄贝饰品和逐渐兴起的鲍鱼壳饰品。其中，公元5、6世纪的M2类型还包括鱼尾形状的符石和云母矿石(mica)制成的工艺品，而7到8世纪的M3类型则被视为该文化的高峰。根据佛利蒙捷运站的考古发掘，这座城市当时很可能正坐落于这所谓“梅加诺斯入侵(Meganos Intrusion)”的边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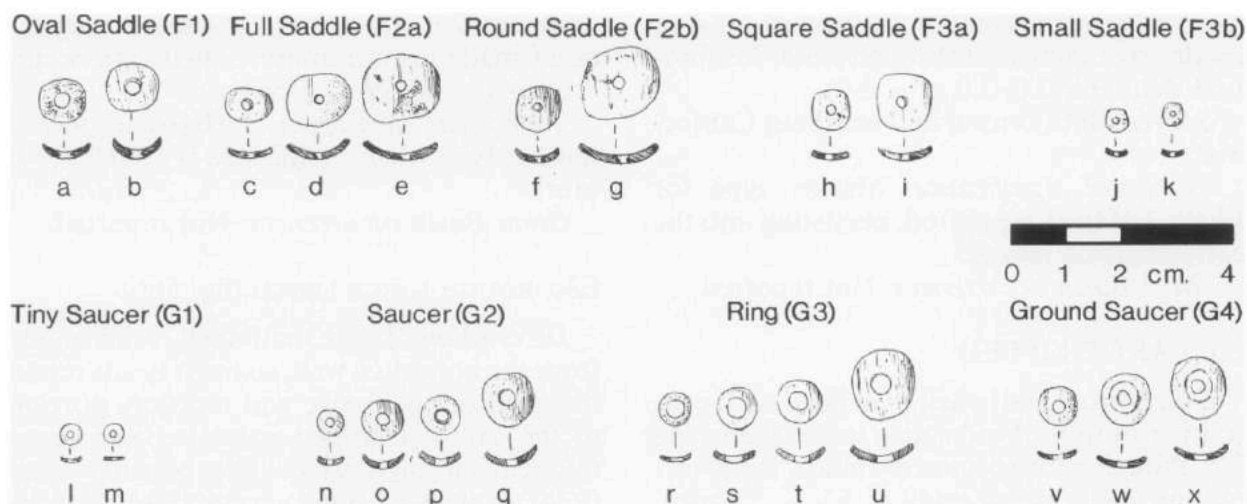


Fig. 6. *Olivella* shell beads, classes F and G.

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上面这段话里“贝”字出现了很多次，这也是不足为奇的。首先，对于湾区的原住民来说，海贝不仅是容易取得的食物来源，更是最易收集、切割和打磨的艺术材料；其次，贝壳较早地在北美印第安人文化中被赋予了象征意义。据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的贝类考古专家雪尔·克拉森(Cheryl Claassen)所说，许多原住民群体都相信贝壳组成了大海的底座，而整片大地就这么漂流在贝壳的海上；因此，贝壳不仅象征着陆地出现之前的茫茫之海，也预示着世界终结后同样的混沌，是很重要的意象。最后，一项2020年的研究将加州原住民使用贝币的时间往前推到了距今2000年左右的远古时代晚期；这批研究者们提出了四条判断贝壳制品究竟是饰品还是钱币的标准：

1. 比起贝壳饰品，生产贝币是一项更劳动密集的活动。
2. 作为钱币的贝类在外形上应当是更统一、更标准的。
3. 体型更大、更惹眼的贝珠(beads)更可能被用作装饰。
4. 作为钱币的贝类分布更加广泛。

利用上述的四大标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人类学教授琳恩·甘博(Lynn Gamble)比较了距今1000年前的原住民贝币和一批更古老的贝壳制品，发现这两组物件本质上“一样具备高标准化的特征”，并且同样分布广泛，在湾区和洛杉矶周边都有大量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有着2000年历史的贝币正是碟形橄榄贝，而且在时间上恰好与同类型贝壳制品在湾区的兴起所对应。因此，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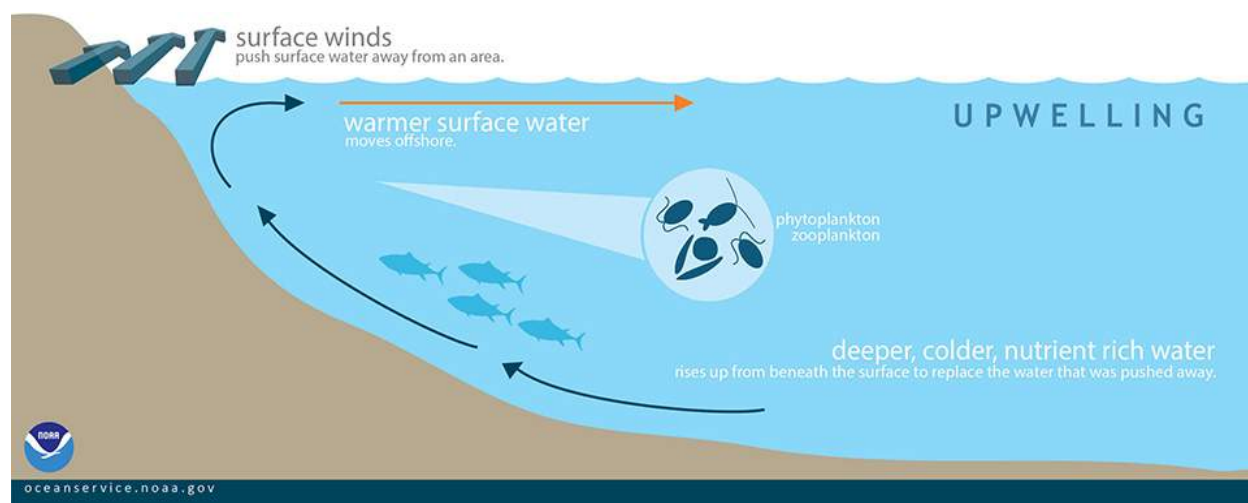
我们也许可以推测，自远古时代晚期以来湾区的贝壳制品并非仅仅是装饰品，更带有交换物品的钱币特征，暗示着一定范围内的贸易体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梅加诺斯文化下M2、M3和M4类型对早先M1类型的取代可能不仅仅是审美和文化上的扩张，更是经济上的征服——梅加诺斯文化居民（也被称为原始米瓦人 Proto-Miwok）对东湾贸易网络的控制意味着原先通行的碟形贝币丧失了实际的功用，逼迫着佛利蒙等地的湾区聚落转而使用并生产新的通用货币，也就是马鞍型橄榄贝。

总之，强大的梅加诺斯文化自公元5世纪以来对东湾的影响终于在1050年前走到了尽头，退回了更东边的山区丘陵之中，成为了今日平原米瓦人(Plains Miwok)和约库特人两大部落的祖先。与此同时，东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中晚期过渡”高峰期，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则遭遇了所谓“中世纪温暖时期(Medieval Warm Period)”或有点儿不祥的“中世纪气候异常期(Medieval Climate Anomaly)”——在公元900年和1300年之间，欧洲和亚洲的气象记录中都出现了反常的气温升高。在欧洲，这一现象带来了良好的谷物收成、葡萄种植区域的扩张和新市镇的建立；欧洲人口在四个世纪内翻了个倍，维京人(Vikings)也借着难得的时间窗口殖民了大多时候都冰天雪地的格陵兰(Greenland)。在亚洲，中亚和东北亚的耕地面积有了一定扩大，将农业覆盖到了俄罗斯北部、黑龙江河谷(Amur Valley)和北日本。而在2001年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上，它则引发了气象学界的一大丑闻：不少学者指责委员会故意忽视了许多相关证据，而仅

仅基于一份对树木年轮(tree ring)的研究得出了“中世纪温暖时期并不存在”的官方结论，以此来凸显近年全球变暖的单一性和紧迫性。至今这个问题还能在满是气象历史学家的房间里引起不小的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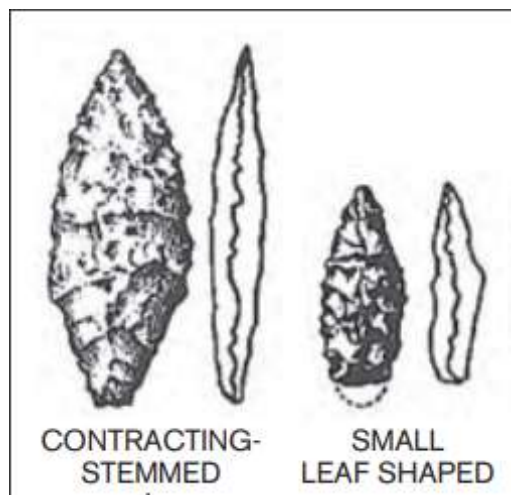
说回正题，在美洲，这一温暖时期的作用似乎没有亚欧大陆上那般友好。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Yucatan Peninsula)遭遇了过去七千年里最严重的大旱，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古典时期玛雅文明崩溃的主要原因——截至公元1000年，玛雅文明的人口比起几百年前的鼎盛时期减少了数百万人，南部低地(Lowlands)上宏伟的丛林都市也遭到了放弃，经济和社会的重心开始永久向半岛北部转移，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到古典时期的人口规模或发达程度。在加州的海岸线上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用圣巴巴拉地区考古学权威罗杰斯(David Banks Rogers)的话来说，中晚期过渡的一大物理特征就是“村址遭到广泛废弃”。一份2005年关于北加州地区史前气候的研究也确定地告诉我们，旧金山湾区在公元960年到1120年之间进入了“较干燥的时期”：汇入海湾的淡水河流流量减小了，再加上更高的水蒸发，这一时期的海水含盐量出现了上升，导致了植物群落的更替。比方说，生长于淡水环境的芦苇(*Phragmites communis*)在公元1000年后让位给了能更好在咸水中生长的美洲蘆草(*Scirpus americanus*)，然后又被更耐咸的盐角草(*S. virginica*)和海岸盐草(*Distichlis spicata*)所取代。

湾区的哺乳动物也受到了影响。长期的干旱显然威胁到了包括鹿——加州原住民的首选猎物之一——在内的大型动物种群规模。在加州中部海岸线上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县(San Luis Obispo)境内的库恩溪(Coon Creek)附近，研究者发现中晚期过渡段内的聚落有着非常独特的动物骨骼遗存：进入过渡期之前的骨骼堆里鹿骨一般占了30%到40%以上的比重，但在过渡期内的样本里只占不到3%。相比之下，兔子占了将近30%、海獭占了14%到17%，就连鸬鹚都占了24%——大都是体积更小，也更容易在干旱年代生存繁衍的动物。除此之外，他们也注意到，海生生物——包括海獭和靠海吃鱼的鸬鹚——在加州原住民的饮食中占比大幅上升。这是因为，中世纪温暖时期在带来陆地干旱的同时也造成了海洋营养物质的极大丰富，而这要归功于一种被称为“上升流(upwelling)”的现象。所谓上升流，其实就是吹过海面的风带动海水从海底向海面上涌的过程。由于靠近底层的海水温度更低也更富含养分，上升流有效地提升了海面附近的生物多样性，让鱼儿更多、更好抓，也让其他靠海吃海的动物变得更多、更好抓。



加州南部的考古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迹象。在圣巴巴拉海岸上的圣克鲁兹岛(Santa Cruz Island), 比起中期, 中晚期过渡时的古人食谱里多了10%的鱼和25%的海獭, 但体型更大、更难在气候变化下生存的鲸豚类(Cetaceans)则几乎消失在了他们的餐桌上——中期聚落中它们的骨架占了全部海生哺乳动物残骸的30%以上, 但到了过渡期这一比例立刻跌到了5%。在圣巴巴拉以西的普利西马角(Purisima Point)上, 12世纪中期的地层中几乎没有鹿骨, 但却有极大量的贝类遗存。由此可见, 中晚期过渡时加州海岸所遭受的气候变化是切实存在, 且对原住民生活造成了普遍影响的。

生物群落的变化首先反映在了物质社会的方方面面。首先, 更小、更敏捷的猎物自然更难捕捉猎杀, 因此需要更有效的武器来对付。截至公元1100年, 体积较大的两面石镖(bifacial dart)在湾区基本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更小、更尖锐的石制箭头。由于石镖一般作为标枪头使用, 这本质上代表笨重的标枪终于让位给了更轻便且致命的弓箭, 永远改变了加州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库恩溪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中晚期过渡的箭簇整体呈现缩小的趋势, 从较大的“两头尖(contracting-stemmed)”箭头一家独大逐渐变成了“两头尖”和更精巧的“叶形(leaf-shaped)”共存的模式, 然后又在13世纪中期被更细小的“槿树叶形(cottonwood)”取代——这种箭头到了18世纪仍然还在印第安人群体中得到使用。



同样的进步也发生在渔业领域。在南加州, 居住在近海小岛上的丘马什(Chumash)人早在8世纪就发明了名为“图莫尔(tomol)”的木板舟, 但似乎在中晚期过渡的气候异常期里才对当地渔业造成了较大影响——自12世纪初起, 南加州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上的遗迹中才开始出现尖嘴鱼科(billfish)的残迹, 主要是体型较大、游速较快, 并且生活在深海的剑鱼; 学者们相信, 要持续地抓到这种难缠的鱼类, 靠的只能是中晚期过渡时普及的木舟和鱼叉。与此同时, 在湾区和加州中部等地渔业则发生了另一种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是技术上的, 而是劳动组织上的——事实上, 在包括库恩溪在内的一些地方, 中晚期过渡反而见证了技术上的“去集约化(de-intensifi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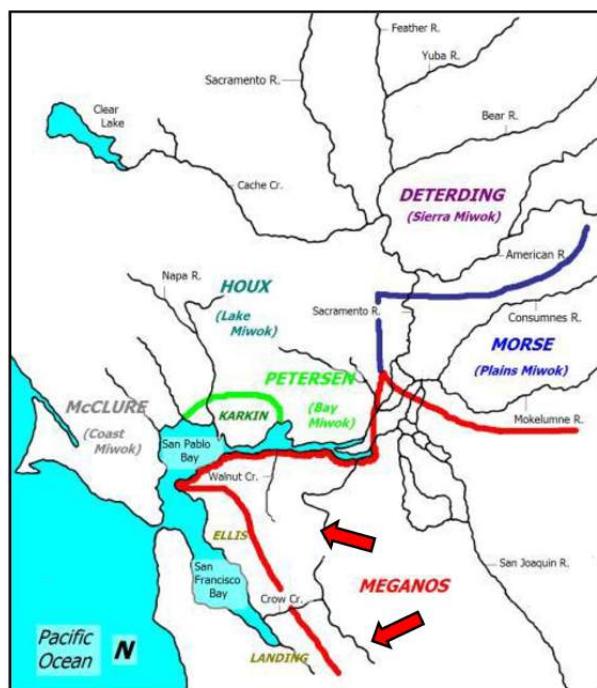
用正常人的话来说, 人们放弃了渔网等较先进的工具, 转而使用在中期已经不怎么用了的鱼钩。而任何见过渔网和鱼钩的人都不难看出, 前者一次能抓到多得多的鱼, 因此这一转变必然是不明智的, 对吗?

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研究者提醒我们, 加州中晚期过渡的整体背景是陆地自然环境和人类生存条件的恶化。尽管原住民们通过技术和行为上的调整试图应对, 但总地说来, 这段时期的人口是成下降趋势的。如果理解起来有些困难, 不妨想想欧洲14世纪的黑死病——从长远历史角度上来看, 它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但在当时仍然造成了不小的破坏, 迫使受影响的人们在短期内忍受更糟糕的生活标准、更虚弱的社会组织 and 更差劲的经济活动。对10世纪到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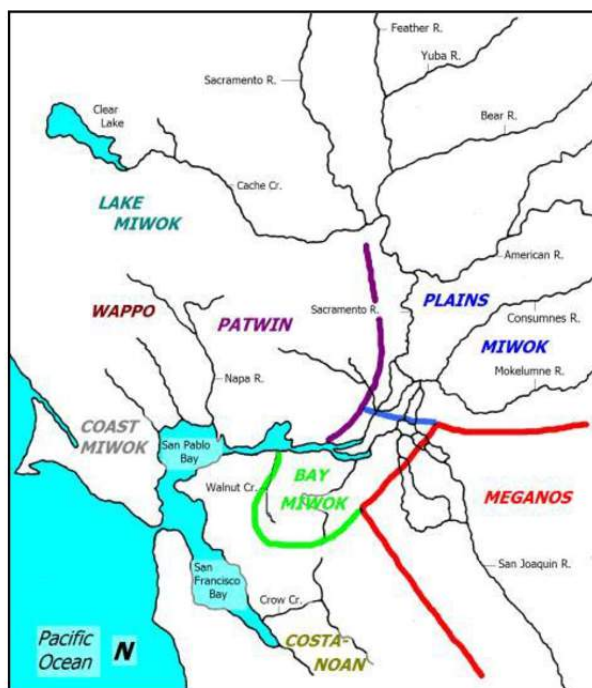
世纪的加州人来说也是这样：渔网的编织和使用是一项社会活动，需要一群人分工合作方可达成，而且捕到的鱼还要在这群共同出力的渔民之间分配，对组织能力的要求较高。因此，随着中晚期过渡时人口的下降和社区的崩溃，这种程度的社会组织变得越来越难以达成，其生产力反而不如人们各自为战，独自钓鱼喂饱家人。

但是，就像黑死病一样，中晚期过渡的气候异常在打击了原住民社会组织的同时，也迫使他们逐渐发展出了应对的手段。面对资源和人口的减少，对这两者的有效利用变得越发重要；换言之，经济环境的恶化使得人们需要建立更复杂、更高效的社会管理体系。就这样，显著的阶级差异首次在中晚期过渡的末端出现在了加州和湾区。当然，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层和组织体系在9世纪前就已经存在了——北加州和俄勒冈州(Oregon)的原住民群体早在公元700年左右就发展出了基础的社会功能以保障季节性的捕鱼活动和渔获的大规模储存——但自12世纪初我们才发现了最明显、最直观的证据。比方说，自那时起加州出现了火葬(cremation)的习俗，而且火葬的葬坑（有时在湾区贝丘靠近顶层的土堆里有所发现）“总是和最丰富的陪葬品联系在一起”，作为墓主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南加州的圣米格尔岛(San Miguel Island)上的考古调查也发现，和公元900年相比，公元1100年的出土文物数量翻了四番，各类珠子的数量也经历了类似的增长。考虑到我们已经确定这些小玩意很可能起到了货币的作用，珠子数量的激增很可能暗示了经济活动的极大发达，而历史告诉我们，经济活动的发达几乎总是伴随着社会阶级的不平等。

最后，再回看上文的表格，这时北加州已经正式进入了显现时代。梅加诺斯文化已经撤退到了湾区以东，将东湾的平原留给了如今仍生活在此的科斯塔诺(Costanoan)人，也就是所谓“奥隆尼人”。



B: Meganos expansion during the Middle Horizon



D: The end of the Meganos era (AD 900-1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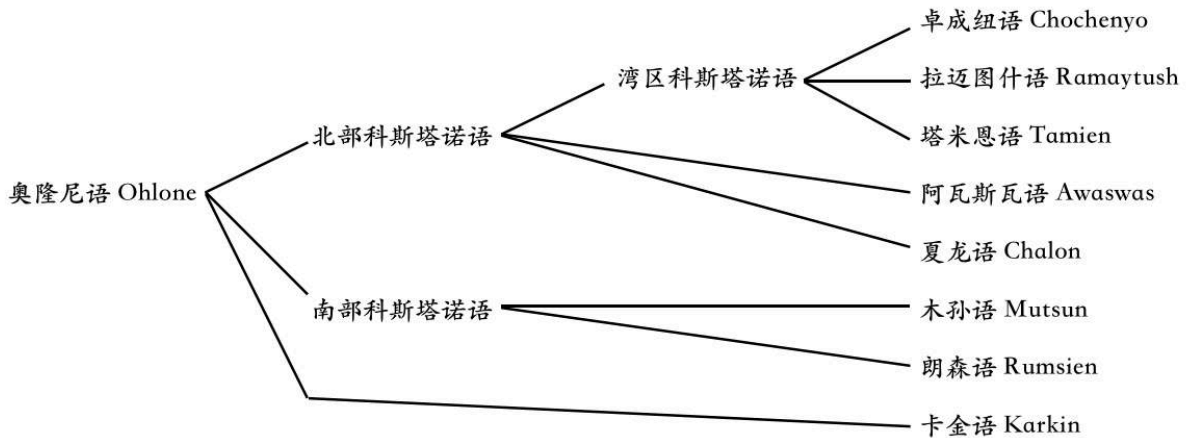
1-4 奥隆尼民族的形成

“奥隆尼(Ohlone)”这个名字，在佛利蒙和东湾应该没有什么人会不知道：佛利蒙山腰上的奥隆尼学院(Ohlone College)是东湾最大的社区大学之一，还在附近的纽瓦克(Newark)有个附属校区；东湾的山里有个奥隆尼地区荒野公园(Ohlone Regional Wilderness)；佛利蒙的动物保护组织叫做“奥隆尼人道协会(Ohlone Humane Society)”；再往北开车二十分钟的地方有个奥隆尼射箭场(Ohlone Archery)；而整个东湾和南湾以“奥隆尼”命名的马路不下六条。可是，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说，用这个名字来指代湾区原住民都是不太精确的——“奥隆尼”实际上是西湾圣马特奥(San Mateo)县境内一座原住民村庄名称的误读。这村子的读音转写下来大概是“?olxon”，但在欧洲探险者笔下变成了“Olhones”、“Olchone”、“Alchone”、“Oljon”或“Ol-hon”。根据韦伯斯特大辞典(Merriam-Webster)的研究，这些拼写最早在1831年进入了英语，但现代的“Ohlone”拼法到了1861年才首次出现，其原因被认为是《加州农民报(California Farmer)》的拼字工排错了版。

和“奥隆尼”这个名字同时流行的还有“科斯塔诺”。只不过比来源于当地语言的前者，后者纯粹是西班牙探险者的构造：在西班牙语里，“costeños”是“海岸人(coastal people)”的意思，指代了整个加州北部和中部海岸平原和丘陵的居民。后来这个称呼在英语里被转写成了通行的“Costanoan”，从此一直在学术作品里出现。在今天的日常用语中“奥隆尼”已经完全取代了文绉绉的“科斯塔诺”，但这两个词的本意是一致的——一群居住在旧金山湾和周边地带，讲差不多语言的原住民，而这组语言也和它的使用者一样被称为“奥隆尼”或“科斯塔诺”。在17和18世纪时，讲奥隆尼语言的聚落从今天旧金山湾东北角上的圣巴勃罗(San Pablo)一直延伸到大苏尔(Big Sur)，囊括了整个旧金山半岛，但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它想象成某种单一语言。打个不算最恰当的比喻，比起普通话，奥隆尼语更接近汉语——每个地方人们所讲的都不太一样，隔得远了还会有地区性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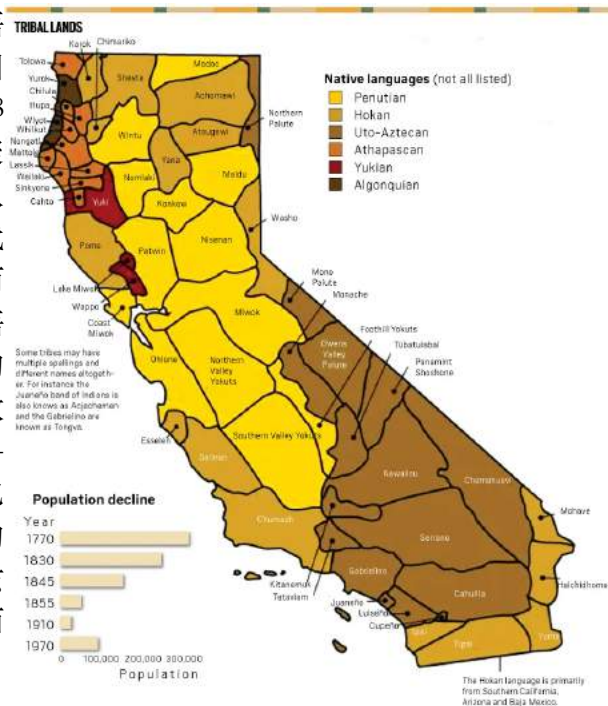


就好像汉语被分为粤语和吴语等方言一样，奥隆尼语也被分为八大分支。东湾的卓成纽语(Chochenyo)，西湾的拉迈图什语(Ramaytush)和南湾的塔米恩语(Tamien)一同被归纳到了所谓“湾区科斯塔诺语(San Francisco Bay Costanoan)”名下；而湾区科斯塔诺语又和阿瓦斯瓦语(Awaswas)和夏龙(Chalon)语一起组成了“北部科斯塔诺语(Northern Costanoan)”，和“南部科斯塔诺语(Southern Costanoan)”——包括木孙语(Mutsun)和朗森语(Rumsien)——相对。目前比较通行的理论认为除了湾区科斯塔诺语之间，其他奥隆尼语使用者不能顺利地互相理解，但在一些词汇和语法上有所关联。



当然，当西班牙人在18世纪开始正式殖民加州北部时，奥隆尼（科斯塔诺）语并非该地区唯一的原住民语言系统。加州的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住着讲六种约库特语方言的约库特人(Yokuts)；萨克拉门托周围和旧金山湾以北的地方住着讲五种米瓦克语的米瓦克人(Miwoks)——被很没有创意地分成了“海岸米瓦克”、“湖岸米瓦克”、“湾区米瓦克”、“平原米瓦克”和“山区米瓦克”五种方言——再往北一些的地方则是讲波莫语(Pomo)的波莫人和讲帕特温语(Patwin)的帕特温人。不管是西班牙人还是原住民自己都通过这些语言上的差别来分辨各自的村庄、子部落(tribelet)或大部落；因此，语言的边界很多时候代表了文化的边界，而语言的历史也代表了民族的历史。共同语言的形成几乎总是暗示了共同的文化背景、社会交流和历史经验。但是，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得知，东湾在5世纪和12世纪初之间都处在原始米瓦人的梅加诺斯文化影响下，因此不存在广泛、统一的奥隆尼（科斯塔诺）语言-文化群。所以，这样一个群体是怎么在之前和之后的时间中形成的呢？

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对加州原住民语言的分类体系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学界公认加州有着北美大陆上最多样的语言分布，其数量不下78种，可能和该地区水网纵横、资源丰富，因此聚落间交流不充分有关。但是，这些语言并不是从出现伊始就互不相通的，而更有可能是史前时代某些始祖古语言在使用者散居各地后逐渐分化而成。通过对现存的加州原住民语言进行分类，语言学家们识别出了六个主要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中部和北部的佩努提恩(Penutian)语门、分散的霍坎(Hokan)语门和东南部的乌特-阿兹特克(Uto-Aztecan)语门。在这三个体系下，佩努提恩语门包括了科斯塔诺语，霍坎语门一直延伸到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Baja California)半岛，而乌特-阿兹特克语门则有两个主要分支：一个在南边的墨西哥，一个集中在美国西岸各州的内陆地区。



这几个体系各自代表了一个史前时期的始祖语言，因此也很有可能各自指代了一个始祖文化群。可惜的是，对史前语言的重建总是困难重重，而加州原住民又鲜有留下文字或语音证据，所以直至今日学界只能达成一些比较基础的共识。这些共识中的大多数都来自一个叫迈克尔·莫拉托(Michael J. Moratto)的考古学家在1984年出版的《加州考古学(California Archaeology)》，一本将近800页、听名字就野心勃勃的专著。有意思的是，我们对这么一位在领域内影响颇大的学者却知之甚少，网上甚至找不到他的一张照片。《加州考古学》的扉页上提到他当时同时任职于加州科学院(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和一家名为“信息科技发展(INFOTEC Development)”的公司。这家规模不小的公司专营航空航天领域的任务控制卫星和相关的电脑网络设计，其董事长费尔南多·尼布拉(J. Fernando Niebla)后来还参与了美国载人航天项目的管理。不过莫拉托本人似乎主要从事的是历史遗址考察，比方说在公路开工前检查施工地点以保障不会损毁考古遗迹等等。

佩努提恩语言的分层			
佩努提恩语 Penutian			
约库特-乌提语 Yok-Utian			
乌提语 Utian		约库特语 Yokut
科斯塔诺语 Costanoan	米瓦克语 Miwok	

莫拉托的理论不是没有挑战者的：伯克利的语言学家维克多·戈拉(Victor Golla)、俄亥俄州立的名誉教授凯瑟琳·卡拉汉(Catherine Callaghan)和肯塔基大学的人类学家理查德·莱维(Richard Levy)等人都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抛开这些学者间的诸多争论，我们大致可以建立如下历史基准，来把考古发掘的证据和语言学上的猜想综合成一条连续的时间线。

最早的佩努提恩语使用者被认为居住在北美大盆地(Great Basin)的北部和哥伦比亚高原(Columbia Plateau)一带，也就是今天的内华达州西北部、俄勒冈州南部和加州最北端的多山地区。这种原始语言(Proto-Penutian)很可能在8000年前（公元前6000年）就已经出现，然后在接下来的三千多年时间里分化出了几个次级语言体系，包括原始乌提语(Proto-Utian)和原始约库特语(Yokutsan)。到了大约公元前2500年的时候，讲原始乌提语的群体开始向加州中部迁徙——可能是为了追寻生态环境更良好、自然资源更丰富的栖居地——最后停留在了萨克拉门托地区。原始约库特语的使用者开始迁徙的时间晚一些，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时进入了加州的中央谷地，其后分化出的部落至今仍分布在这片区域，但和乌提语的使用者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比起原始约库特人，原始乌提语族群面临的情况更复杂些：从科斯塔诺语和米瓦克语的相似度和复杂度来推断，这两种语言在原始乌提语民族进入萨克拉门托地区后的500年内（也就是最晚在公元前2000年前）就完成了基本分化——讲科斯塔诺语支的成了原始科斯塔诺人(Proto-Costanoan)；讲米瓦克语支的则成了原始米瓦克人(Proto-Miwok)。与此同时，离萨克拉门托不远的湾区已经有了原始霍坎语(Proto-Hokan)使用者的存在，被称作原始埃塞伦语(Proto-Esselen)族群。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原始科斯塔诺人和原始米瓦克人开始从萨克拉门托河河口向湾区发展，和霍坎人文化交流碰撞，创造出了伯克利文化群。后来，原始米瓦克人在公元前1500年和前1000年间转而北上，占据了旧金山湾以北的山区，而原始科斯塔诺人则顺着东湾南下，在前1200年左右留下了帕罗奥图(Palo Alto)的大学村(University Village)遗址，把沿途的霍坎语使用者赶到了更往南的海岸。

于是，在公元初期，湾区基本上成了原始科斯塔诺语言使用者的领地；原始米瓦人聚居在北湾；原始约库特人的土地则从萨克拉门托向南延伸至圣华金谷。这么一来，当时的原始科斯塔诺人和西班牙人遇到的“近代”科斯塔诺人一样控制着佛利蒙和东湾，只不过期间遭到了梅加诺斯文化长达近七个世纪的占领。那么，这个从湾区东部丘陵袭来的神秘族群，又源自何处呢？莫拉托在这个问题上有些躲闪，但伯克利的博士生肯尼斯·卫斯勒(Kenneth Whistler)——现在在颇受尊重、负责制定电脑统一码的的统一码联盟(Unicode Consortium)担任技术总管——提出了可能的解释。我们已经知道在公元400年左右圣华金谷遭遇了大旱，因此卫斯勒猜测这一气候变化推动了一小部分原始约库特人离开当地向北迁徙，来到了东湾。后来一支原始米瓦人和另一些讲佩努提恩语的族群加入了他们，汇聚形成了复杂的梅加诺斯文化，共同压缩了原始科斯塔诺人的生存空间。

所以，当梅加诺斯文化在10世纪开始收缩时，原始科斯塔诺人迅速收回了曾经在东湾的领地，并且像松开的弹簧一样开始反弹。一些学者形象地把这一科斯塔诺文化和语言的快速扩张称为“科斯塔诺辐射(Costanoan radiation)”：他们在公元1000年左右继续向南抵达了蒙特雷湾(Monterey Bay)附近，而南部科斯塔诺语的两个现代分支——木孙语和朗森语——也大约在11世纪开始了分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和蒙特雷湾地区讲霍坎语的、更孤立、技术上更落后的原住民发生了接触，从此在文化和语言上和留在湾区的科斯塔诺兄弟姐妹出现了区别，是为今日湾区科斯塔诺语和南部科斯塔诺语不能顺利交流的源头。从那时起直到18世纪，湾区的科斯塔诺人便再没有遭到过大规模、长时间的外来文化影响。尽管因为村庄之间距离较远、长距离交通不便等因素产生了三种方言，却仍然保留了比较一致的文化传统、社会组织和经济活动。这些方面随着时间慢慢发展着，形成了今天湾区居民对奥隆尼人生活方式的第一印象。

1-5 奥隆尼人的生活方式：政治和社会组织

正如上文所述，湾区的水网、丘陵和沼泽保障了小型聚落的独立存在，因此奥隆尼（科斯塔诺）人的政治组织也是极分散的。他们大约分成58个小部落，每个部落的人口通常在100到250人不等，其中规模比较小的实际上不过是几个旁支聚居一处的大家族(extended family)而已，而其“头人(headman)”通常也只是一家之主。正因如此，和大平原上的正牌“部落(tribe)”不同，湾区的小型社会一般被称为“子部落(tribelet)”或小部落——有点儿像“书(book)”和“小册子(booklet)”或“岛屿(isle)”和“小岛(islet)”之间的关系——这个名词由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Louis Kroeber)在1955年创造，虽然在学术上不无道理，但一直遭到原住民群体的反对。一篇持较批判态度的短文这么写道：

人类学研究，尤其是加州民族志(ethnography)领域的研究，一直有着以固有(pre-conceived)术语去描述印第安社会的问题；[比方说]对“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祭典体系(ceremonial system)”和“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一类词语的使用就和研究对象——也即原住民本身——的文化观念与文化范畴没什么关系。自克罗伯以来，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和作家都使用了“子部落”一词，维持着加州原始文化规模极小、形式极简单的印象…因此，这些参考系和术语的使用总是使人们不愿去对加州和湾区的早期文化与社会作更详细、更深入、更复杂的分析。

这个论点乍一听不无道理：要真正理解一个文化，不是本就应该去研究它如何看待自己和外部世界吗？但是，我们总该意识到，一些现象是不以任何文化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无论一个族群有没有“物质文化”的概念，他们毫无疑问必须依赖现实世界的物质来生存，因此必然会产生物质的遗存；与此同时，由于一个族群必然拥有某些共性，其物质遗存必然也拥有一些相似之处，而一个物质文化——无论规模或形式如何——就这么出现了。同理，“社会”作为一群人的组合，是客观存在的，而一批组合在一起的人必然会遵循某种组合的方式；退一万步说，哪怕他们缺乏任何形式的组合，仅仅是随机地生活在一起，那这种“组织体系的缺失”本身也是一种异常的组织方式，也许可以被叫做“随机组织”或“原始无政府”什么的——我说不准，毕竟我也不是人类学家。总之，对原住民文化的尊重没有必要靠对客观研究方法和名词的重构：也许比起“tribelet”，更不带价值色彩的“small tribe”确实是更好的选择，但是这不能否认加州部落比起其他大多数美国原住民群体规模更小的客观事实。并且，“tribelet”这个词用了将近70年，但在这70年里关于湾区原住民“详细、深入、复杂”的分析并不鲜见。说到底，要是没有这些对奥隆尼人和其他部族细致入微的研究，这本小书的这个部分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说回子部落本身：其中规模大一些的可能控制着若干小聚落和一个“中心村庄”。这样的村庄一般也是一个地区的贸易中心和举行宗教典礼的地方，居住着社会地位和氏族血脉各不相同的多个家族。这些氏族的起源已经很模糊了，但贵族和平民家族间的血脉差别仍然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各个奥隆尼子部落的统治权通常没有异议地在某几个确定的“首领家族(chiefly family)”中流传。但是具体人选的确定却靠的是一种比较民主的方式：在上一任酋长去世后，其家族的其他成员会认真咨询部落中的重要人物以参考他们的意见。这些“长者”不仅包括各个贵族家庭的家长和部落萨满(shaman)，还包括富裕的商人和一些不可或缺的手工艺者，比如为部落制作猎具和武器的弓箭匠等。作家马尔科姆·马戈林(Malcolm Margolin)在他关于奥隆尼人的通俗读物里总结道：“若缺乏各位部落领袖普遍——最好是一致——的支持，首领家族决不敢擅自拥立新酋长”；但一旦这些大人物决定了新酋长的人选，他们的意见几乎是不可变更、近乎绝对的。通常他们会礼节性地让老酋长的长子世袭，但如果他实在不得人心，前酋长的兄弟、侄子，甚至女儿也都有继位的可能。这么看来，说奥隆尼人的政治制度接近选举酋长制，或者某种原始的贵族民主——甚至简单的雅典民主，也是说得通的。



不过，这些酋长的具体权力是极松散，也极形式主义的。毕竟子部落这样一两百人的政治实体本身也不具备什么组织机构。他们手下没有军队，没有收税官，没有卫队，也没有警察或法庭——有的只是部落民众的普遍认可和自身的领袖气质与魅力。他要扮演部落“主持人”的角色，慷慨地宴请附近部落的头人与商人；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保证其部落能够维持长久的和平与贸易繁荣，也是为了确保周边部落会对旅行在外的本部落成员提供相同的良好待遇。他也要负责各种宗教活动的协调与组织，并且在仪式上扮演中心角色。作为担任“公职”的回报，酋长们不用从事劳作、可以多娶几个老婆，也可以穿代表了高地位的华丽“王服(regalia)”；虽然他要自负宗教仪式的各项开支，但无论是日常吃穿用度还是“外交”往来，都是由部落里的其他人特别供给的。

有意思的是，奥隆尼人部落中似乎也出现了类似原始“社会契约”的概念：由于部落规模小、社会关系也较简单，酋长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他“治下”人民的严密关注：仪式上的表现符合传统吗？外来的贵族有没有受到应有的对待？如果今年年景好的话，他是选择把所有供应的好东西都据为己有，还是决定大方地把它们奖赏给部落里的大家？一旦他违反了类似的、无声的契约承诺，人们对他的尊重与认可就会消失。而在这样一个政治与社会权力基于普遍认可和名声的组织中，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恐惧的了。换言之，奥隆尼酋长们实际上“被极强的条规束缚着”。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难注意到一个有趣的跨文化趋势——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越原始的政治组织中其领袖的权力绝对性就越弱，束缚他的“条规”也越严格。苏丹境内的尼罗人(Nilotic)部落直到上世纪还相信仪式性的弑王能阻止干旱；纳米比亚的奥万博人(Owambo)国王不能离开他的领地；一些原始文明更相信其神王，作为神圣概念（譬如丰收或生长）在世间的化身，必须保持健康青春，因此必须在现出疾病或衰老迹象时通过极复杂的仪式处死——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在其大作《金枝(The Golden Bough)》里就提到了许多例子，从凯尔特人到南印度的奎拉卡雷(Quilacare)都有涉及。奥隆尼人的情况显然没有这么极端，但也可作为原始社会中酋长和国王统治权更虚弱、更受限制，也更依靠全体政治参与者共识的例证。这样的共识最直观地体现在新酋长继位时部落长者的讲话中。我们手头缺乏奥隆尼部落的第一手记录，但马戈林为我们提供了一段来自邻近米瓦克人部落的演说。读完之后，我们应该不难得出结论——湾区原住民部落的酋长确实是深受传统和规范影响的，而他在行为上也很难突破无数前辈留下的印记和边界：

这名男孩就要成为酋长了。你们所有人都为他做好准备。准备好一切…他将将会和他父亲一般做事。他和他父亲将有一样的方式…自其父去世后他便在准备了。自其父去世后他便在准备了。他将会和他父亲一般做事。自其父去世后他便在准备了。自其父去世后他便在准备了。他将会和他父亲一般做事…他将会和他父亲一般做事。他将会做他父亲所做的。准备好东西。准备好东西。修整地面…

考虑到这种演说一般通过抑扬顿挫的语调和慷慨激昂的韵律来表达部落人士的意愿，通过文字阅读它的人们可能不太好评判其质量。不过，我们可以确知口头表达在奥隆尼等湾区原住民群体中扮演着极重要的政治角色——作为既实用（说服他人）又充满仪式意义的交流工具，类似的讲演也被运用在部落间战争的各个阶段。根据1839年一名俄国探险者的报告，战前，人们会喊道：

领袖们，让我们出战去吧！
让我们出外去捕获，漂亮的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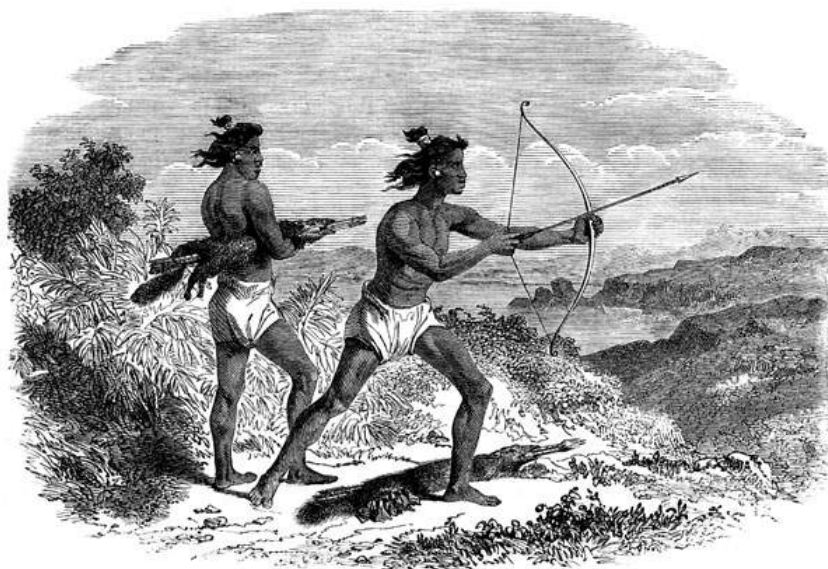
在靠近敌人村庄，两军接战之时，进攻的一方又会高呼：

我们何时翻过山丘？
我们第一个会看到谁？
我们的标枪又尖又利，
把你们的也拿出来罢。

而他们的酋长——可能是指派或推选的临时“战酋 war chief”，一般是骁勇的猎手——则会回道：

前进，前进，
上战场去了，
坚定的人们，跟着我！
不要害怕，敌人的箭矢
伤不到你。

虽然听上去很是令人振奋，但相比起北美大陆上的其他地方，加州的原住民部落比起美洲的其他地方是较平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不存在。一位军事史学者写道，战争在印第安人社会中起三个主要作用：维护部落间“正常”的政治关系；提升参战者的社会地位；以及血亲复仇(blood revenge)。除此之外，我们也许还可以加上偶尔的经济因素——1648年爆发于大湖区的休伦-易洛魁战争(Huron-Iroquois War)很可能就是后者希望垄断与欧洲人之间皮毛贸易的结果——但不少学者相信纯粹出于经济动机的战争在殖民者来到北美洲前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就算这样的战争存在于大陆上的其他地方，在自12世纪以来就气候宜人、资源丰富的加州中北部和湾区应当也没有爆发的土壤。两位学者在1975年发表的《加州印第安人战争(California Indian Warfare)》一文中总结了大量有关奥隆尼人冲突的材料，只发现了一起完全出于经济原因的冲突——卡梅尔(Carmel)附近的奥隆尼人和圣卢西亚山(Sierra de Santa Lucia)周边的萨利纳人(Salinan)为了争夺产松果的松林爆发了多次战争。不过这不仅是在欧洲殖民者抵达该地区之后，更发生在靠近奥隆尼族南部边界的地方。那里山脉直接沿着海岸隆起，几乎没有在湾区唾手可得的河流与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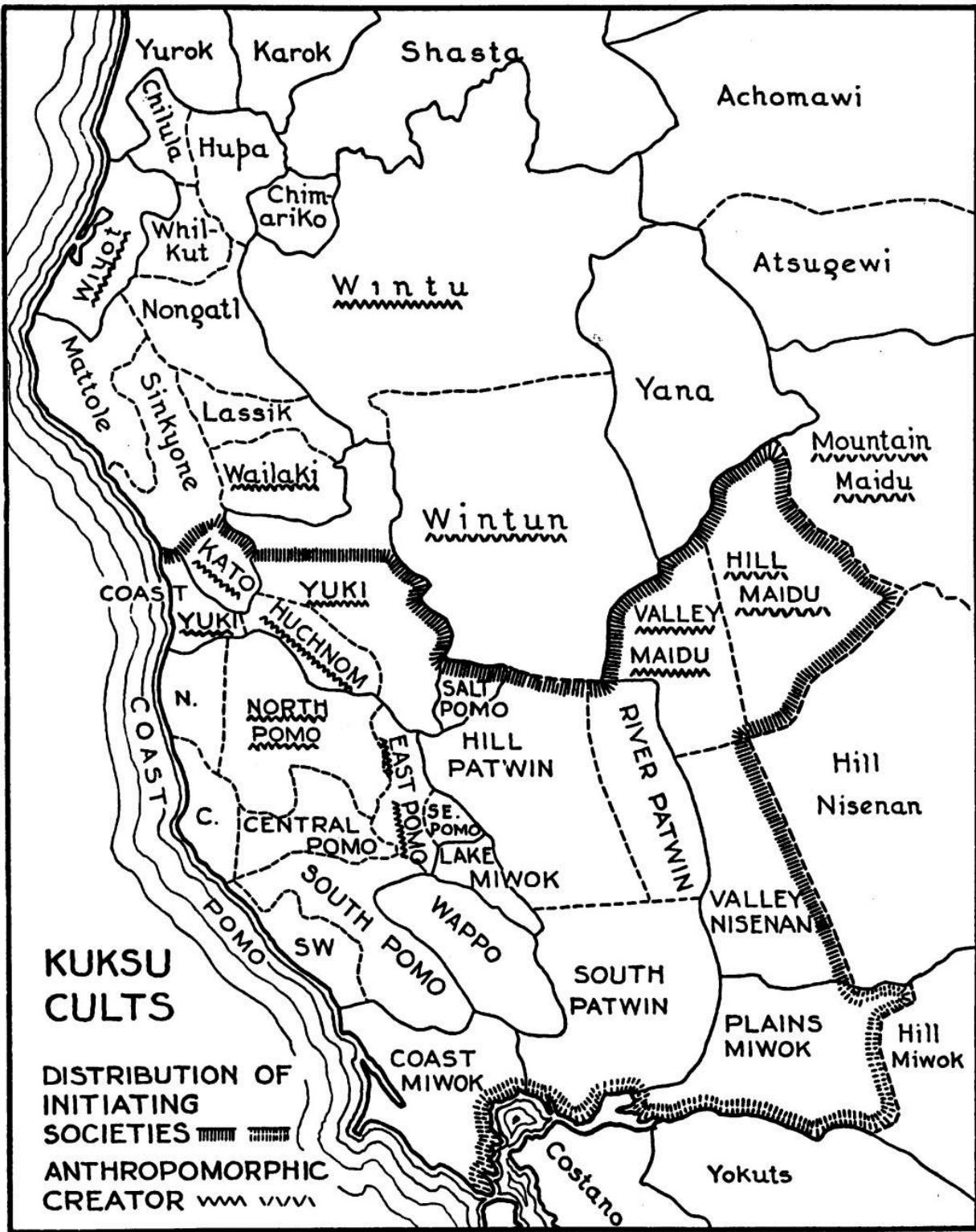
相比之下，奥隆尼部落之间因政治原因或复仇开战是常见得多的情形。前者主要表现在“踏足侵犯(trespass)”这一行为中：每个部落和村庄都有自己历史上的边界，包括狩猎范围、采集区域和沐浴的溪流河道等，而另一个部落的成员若未经邀请或认可便进入其中狩猎、采集或洗澡，便会被视为严重的挑衅行为。曾任西班牙殖民帝国新墨西哥行省总督的德·安扎(Juan Bautista de Anza)在1769

和1770年间到访湾区时就提到护送他的当地人最远只能领他到部落范围的边界，之后一步也不愿再走，因为这样因踏足外人土地而爆发的纠纷“在他们之间是很常见的”。至于血亲复仇也很好理解：如果一个部落的成员被另一个部落的成员所伤害欺侮，受害者的亲朋（由于一个部落规模不大，这些亲朋通常指的就是该部落的大多数青壮）在传统上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反击。这通常会导致两族或两村间的世仇——A部在反击中必然会伤害到B部的其他人，而这些人后代亲人又会再攻打回去，导致新一代A部成员把仇恨持续下去……在一些同样从事血亲复仇的文明中，最初的争战原因早已被遗忘，但两族间的憎恶已经深深烙印到了双方的集体记忆中，仍然继续引发着流血事件。最晚在1859年——美国内战爆发的两年前——奥隆尼人仍然和一些周边族群保持着战争状态，不过那时他们已经从手持弓箭标枪的猎人变成了背着步枪的骑兵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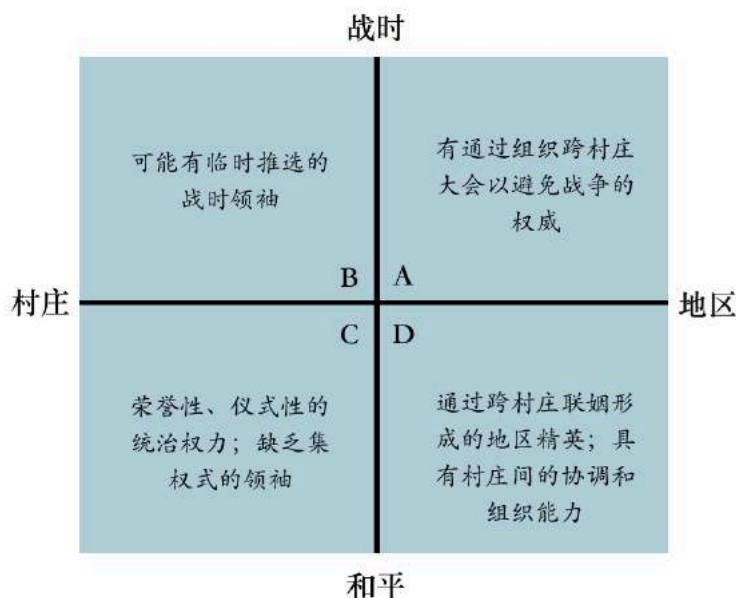
另一个在奥隆尼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元素是其广泛的联姻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湾区有不少人口不及百人的小村庄和小部落，不可能完全依靠内部通婚来延续族群。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旧金山半岛西部海岸上的阿拉麦(Aramai)子部落；他们只有两座小小的村庄，其中超过一半人口都是其他部落嫁娶过来的“外来户”。这也带来了联姻的另一个好处：像阿拉麦这样的部落和他们的邻居之间会在一代又一代的通婚中建立很强的共存关系，提升了村庄领袖作为部落间话事人的地位。正因如此，人口稀少的阿拉麦人实际上是“旧金山半岛上十个部落中政治影响力最强的”：据记载，18世纪末的一位阿拉麦酋长有六个孩子，积极地与其他村庄的头人家族联姻，逐渐掌握了附近西班牙传教所里将近三分之一的原住民领袖职位。一些探险家也记载了这种跨村庄领袖维持部族间和平的能力：有时候，如果某村民或偷或抢了邻村的财物，这些领袖会组织跨村庄的村民大会以决定惩罚手段，而非坐视有血缘联系的两村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在联姻更频的地区，冲突是相对更少的。

有时这样的联姻网络会延伸得更远一些，甚至跨越语言和大民族的界线。南部的奥隆尼部落有时会和约库特人或埃塞伦人联姻，而湾区部落和米瓦克人通婚的事例也不鲜见。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怀疑奥隆尼人的政治社会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可能是最近三十年里最有成就的湾区考古学家兰道尔·米利肯(Randall Milliken)——他人生的前三十年辗转于三所大学和三个半途而废的专业（林业、历史和植物生态）之间，当过园丁、离过一次婚、跑去芝加哥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一起反对芝加哥的种族隔离，还因为参与反越战游行和逃避征兵蹲了一年联邦监狱——就曾提出应当把几个有姻亲关系的村庄和部族视为一个更高的政治单位。另一些研究者则试图将其纳入“等级制酋邦(ranked chiefdom)”的模型。所谓“等级制酋邦”，其特点是对氏族背景和系谱(genealogical)地位的强调，而个人的社会地位则随着他在谱系上离统治者的距离增加而递降。但是，这一模型的问题在于，世界上大部分“等级制酋邦”都有着强大的集权统治者，而该统治者也扮演着集体资源的分配者；不过，这样一个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首领形象在大多数奥隆尼部落中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总结地来看，奥隆尼人的政治和社会也许应当分为四个象限来看待：和平-战时和村庄-地区。在和平时期的单个奥隆尼村庄内，酋长的权力是极受限制，更接近荣誉性质的；而在战时，“战酋”等特别领袖职位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统治者的权威，让他们短暂地拥有了平时不具备的成组织、听指挥的武力。更显著的差异显示在村庄和地区的尺度上——在一个包括若干村庄的地区内，有时会出现通过联姻而构建的地区性酋邦；在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内统治者具备村庄领



(Modified from Kroeber, 29:393, 1932.)



袖所不可能获得的权威，而他们庞大的家族也使得血缘等级制的出现成为可能。尽管没有确切证据，但他们也许和世界上的其他等级制酋邦统治者一样拥有分配财物的责任——毕竟，当西班牙人在1770年建设蒙特雷传教所的时候，他们就注意到一位名叫查安杰(Chanjay)的地方酋长会带领部落青壮去寻找合适的猎区与最富饶的渔场，而这本质上就是经济性的权力与义务。最后，这些地区酋长的权威在争端出现时起到了协调司法、避免冲突的作用。总之，他们的权力是动态、多层次的，而这两个词可能也是对奥隆尼人政治与社会的最好形容。

1-6 奥隆尼人的生活方式：宗教和神话体系

北美印第安人的信仰体系几乎和他们的语言体系一样复杂与多样——仅仅在美国境内就有数百种不同的宗教传统，有时相邻的部落也会有着很不相同的信仰或仪式。好在北加州的原住民信仰显现出了一定的共性，被统称为“库科苏崇拜(Kuksu cult)”；所谓“库科苏”就是这个信仰体系中的上神，在一些近代文献中也被附会成类似其它文化中“神使(Messenger of God)”或先知的角色。他很多时候出现在创世神话里，被认为是郊狼神和灰狐神的后代。这一宗教传统在形式上接近一种秘仪，因此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入教(initiation)”仪式的重视。说是“入教”，可能并不是最准确，因为无论是否经历该仪式，部落成员几乎都是相信同一个神话、参与同一个集体活动的。一个更合适的翻译也许是“成年礼”，因为该仪式通常代表着受礼者人生一个阶段的结束和下一个阶段的开始：在一些部落里，只有经过这个典礼，一个男孩才能担任巫师职责；一位学者更观察到，当部落里的男孩被选中参与该典礼时，他们的母亲常常抽泣不能自持。据他分析，这暗示了仪式作为参与者“死亡再复活”的象征。

根据上世的几场大规模实地考察，人类学家们根据该仪式的程序不同把加州的库科苏崇拜体系分成了东、西两大分支。西部分支包括了湾区北岸的波莫人、玉奇人(Yuki)、卡托人(Kato)、海岸米瓦克和湖岸米瓦克人，东部分支则包括帕特温人、丘陵麦杜人(Maidu)、山谷麦杜人和平原米瓦克人等部族。在西部分支下的部落里，每个部落通常具备两个“秘社(society)”作为“入教”成员的社会阶级。任何一个经过了成年礼的男孩（和一些女孩）都能成为第一个秘社的成员，但第二个秘社是更严格的：经过成年礼后，只有符合一定要求的部落成员方可通过第二场仪式加入其中；在一些部落中，只有该高级秘社的成员才能担任巫医。东部分支下的部落则没那么统一，其秘社数量从一个到三个不等，但一样拥有不同的成员资格，每个秘社的“入教礼”和“成年礼”也各不相同。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在上一页的地图里发现了问题。在图中“科斯塔诺人”被画在最下方，正好处于库科苏崇拜区域之外。难道奥隆尼（科斯塔诺）人的宗教系统是独具一格的吗？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因为我们缺乏确凿的第一手资料。除了考古发掘得来的信息和早期殖民者的只言片语，我们对加州库科苏崇拜的绝大多数知识都来自两个人：前文提到过的阿尔弗雷德·克罗伯和他的学生埃德温·洛伊伯(Edwin M. Loeb)——他来自一个纽约的富裕家庭：父亲阿尔伯特(Albert Loeb)是银行家所罗门·洛伊伯(Solomon Loeb)的外甥、母亲萝丝(Rose Guggenheim Loeb)是著名的古根海姆家族成员，还有一个写小说的哥哥。克罗伯的相关研究出版于1925年，而洛伊伯的调查也差不多同时进行着；那时北湾的印第安人部落还保留着一些仪式知识，但东湾、西湾和南湾的部落在西班牙人的长期殖民和美国人的城市化进程下已经丧失了大多数宗教和社会传统，因此研究者们得不出什么有效结论。一篇论文失望地报告说：

没有一个和[南湾]圣塔克拉拉谷地(Santa Clara Valley)[奥隆尼]族群相关的仪式故事或仪式过程曾被记录下来…

东湾和西湾的奥隆尼部落也没好到哪儿去。在他的总结性著作《加州印第安人手册(*Handbook of Indians of California*)》中，克罗伯怀疑他们也从事库科苏崇拜，但这更多源自推理而非证据：

[在宗教问题上]庞大的科斯塔诺和萨利纳人族群只留下了最最稀少的资料，完全可以总结成“在圣何塞(San Jose)与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两处传教所都曾进行库科苏类型的舞蹈”一句。这本身也许能作为足够的证据，但我们知道这两处传教所[在接纳科斯塔诺人和萨利纳人的]同时也有圣华金谷地的原住民。不过，萨利纳[即圣安东尼奥]传教所接受的内陆民几乎完全来自约库特族…而约库特传统领地内的居民似乎完全没有与库科苏或任何秘仪相关的知识…因此，圣安东尼奥传教所的库科苏舞蹈更有可能是本土的。既然如此，居住在萨利纳人和[同样从事库科苏崇拜的]帕特温人之间土地上的科斯塔诺人也更有可能信仰相似的宗教。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于奥隆尼人兴趣复萌，一些学者试图再次去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一些甚至挖掘出了前所未有的资料。圣何塞州立大学的人类学硕士（后来当上了讲师）艾莉西亚·贺奇斯(Alicia Hedges)就在20世纪早期语言学家约翰·哈灵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的野外调查笔记——总共有近75万件，以微缩胶卷的形式存储在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里找到了一段他和两位奥隆尼部落领袖的采访记录。他们暂住在东湾丘陵中的普莱森顿(Pleasanton)小城，离佛利蒙不到十分钟车程，而且都在故事里提到了库科苏的名字。其中一位名叫何塞·古兹曼(Jose Guzman)，是世上最后一批卓成纽语母语者之一，还为我们录下了几首仅存的奥隆尼人古语歌曲，现在还可以在Youtube网站上找到。他对哈灵顿讲了两段谜样的故事：

库科苏跳着舞上了山，说道“呼呼”。
他戴着鸟翼尖羽毛做成的大头饰。
印第安人管它叫库科苏伊(Kuksui)但西班牙裔加利福尼亚人叫它库克苏伊(Cúcsui)。
他令大地震颤。他深知这点。
他听说库科苏在白天来临治愈病人。
他带着一枚大哨子吹出夜晚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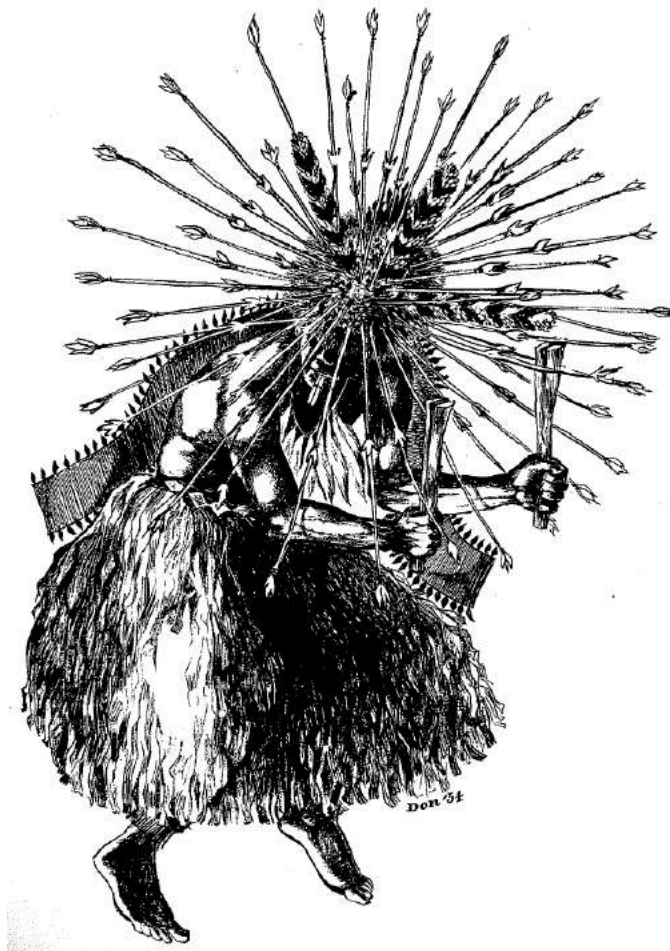
以及：

我今天在此走向希福(Hifu)
我在此走向我的表兄
我今天在此走向米申峰(Mission Peak)
我今天在此走向米申峰
我在此走向希福
我在此出走
吽吽(ja ja)。

另一位原住民领袖是女性的安吉拉·科洛斯(Angela Colos)；她告诉哈灵顿：

库科苏伊是个大脑袋的恶魔。
白人们曾远道而来看他的歌舞。
这歌舞在汗屋里进行。

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说库科苏崇拜显然存在于前殖民时期的旧金山湾部落中，但是库科苏的仪式身份似乎不是很明确。不过哪怕在这短短的三段文字里我们也能一睹仪式的某些元素。古兹曼和科洛斯都提到了歌舞的元素，而歌舞也是库科苏崇拜“入教礼”和“成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脑袋”或“大头饰”也是库科苏其中一个著名的特征，也在宗教典礼的着装上得到了体现——波莫人的典礼装扮更是被直观地称为“大头(Bighead)”。事实上，整个库科苏崇拜的仪式体系几乎都基于部落成员对神话角色的扮演。为了对此有一些更直观的印象，我们可以参考洛伊伯对波莫人或米瓦克人典礼细致入微的记录。作为库科苏崇拜西部分支的成员，这些族群都有至少两个级别的“秘社”，各有一套入社礼。在北方波莫人中前一典礼被称作“躺着吞(dike meten)”，每七年举行一次，接纳部落中若干10到12岁的男孩。他们会被父亲或舅舅带去专门的“舞蹈屋(dance house)”作准备，并在里头度过四天时间——和其他一些部落相比是很短的。不过，他们一进屋就得排排躺在地上，并在身上盖满稻草。在接下来的四天里男孩们不许进食喝水，甚至不能伸手搔痒，只好用痒痒棒(hai makate)代劳。除了他们之外，仪式的参与者还有负责统筹的首长、四五个吟唱人、一个维持火堆燃烧的人和若干扮演魂灵的舞者：



每晚吟唱者(kemea)都会呼唤魂灵(djaduwel, 直译为夜之人)们从山丘上下来。他们会先爬上舞蹈屋的房顶,高高在上地摇起手里的木音叉(hai kataka, split stick rattle),发出“呼呜呜呜”的呼号。紧接着魂灵们便会冲进舞蹈屋里,围着火堆逆时针再顺时针各转四圈,如果出了差错还要课以罚金。这些魂灵既不戴夸张的头饰也不以细枝遮盖面孔,只是用木炭涂黑了脸而已。他们身上画有红、黑、白三色条纹,头发里插有老鹰、鸺鹠(buzzard)或秃鹫的羽毛,手上则握着顶端用鸟羽装饰的浆果鹃(madroña)木棒。

在这些魂灵进入舞蹈屋后,男孩们会坐起来看。魂灵们先绕火堆转圈,然后拿出四五枚木头吼板(bullroarer)挥来挥去制造巨响。接着他们会带着男孩们一块跳舞,仍然是绕着火堆逆时针顺时针各转四个圈,再把他们在火堆上摇来晃去。如果孩子不听话的,还会被抛到屋顶上去。在那之后魂灵们会进行一些其他表演,譬如戏火、播撒灰烬等等。有时一些魂灵还会在鼻孔和嘴巴里戳上树枝扮演小丑做出各种滑稽的动作。不过,如果哪个男孩要是被逗笑了,就会容易得病。

以上环节在周边的其他部落里也大致相同。海岸米瓦克人管它叫“魂灵礼(ghost initiation)”,同样不对部落里的女性开放。他们的魂灵被称作“walipo”,每隔一个晚上到专门修建的舞蹈屋里跳所谓“鬼舞(wale)”:他们同样手持吼板发出响声假装成鬼叫,也会把参加仪式的小孩抛过火堆;不过,米瓦克部落里通常有专业的小丑(hukinak)扮演者,扮相和北方波莫人的没有二致。但是,“躺着吞”典礼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普遍程序中加上了宗教教育的成分:





魂灵们会摇晃四次木音叉，然后轮流给孩子讲解世界的本质和诞生。在仪式的每个晚上都有该环节：孩子们晚上听课，白天就在舞蹈屋里睡觉。

类似的宗教教学存在于不少邻近部落中，但这个职责通常是交给酋长或其他长老的。具体的教学内容在每个部落里都不太一样，但一般都和神话故事相关。和其他大多数北美原住民一样，动物在遵循库科苏崇拜的加州人神话里扮演了中心角色，尤其是老鹰、郊狼和蜂鸟三者。所以，如果奥隆尼人的传统典礼的确和其他库科苏崇拜者相似，男孩们也许会从酋长口中听到这样的故事：

在创世完成之时，老鹰、蜂鸟和郊狼站在白山(Pico Blanco)顶上。海水逐渐升高到了他们的脚边，于是老鹰托着蜂鸟和郊狼飞去了加庇隆山(Sierra de Gabilan)，直到海水退去。然后，老鹰派郊狼下山看看世界干了没干。

“世界已经干了。”郊狼回来后报告说。

老鹰又说：“去河边看看那里有些什么。”

郊狼回报：“那儿有个漂亮姑娘。”

老鹰便说：“她将是你的妻子，这样人类就能再次繁衍了。”说罢便给了郊狼一根掘土棍和同样用来挖地的鲍鱼壳。

郊狼问道：“那么，我的孩子该怎么养呢？”但老鹰不愿回答——他想看看郊狼聪不聪明。郊狼又再次追问；见老鹰仍不回答，他只好自言自语地说：“好吧，那么我就让她养在膝盖里好了。”

但老鹰却回答说：“不，这不行。”

“那么就养在手肘里好了。”

“不，这不行。”

“养在眉毛里？”

“不，这不行。”

“脖子后头？”

“不，这也不行。你说的这些都不可以。”

这时，蜂鸟喊道：“老兄啊，这些确实不行。我知道哪里最好——养在肚子里。”

郊狼听了很是生气，突然暴起想杀掉蜂鸟。不过，老鹰抬起翅膀让蜂鸟藏进了自己的胳膊窝，让郊狼找不着他。这时，那姑娘走近问道：“我该怎么办呢？我要怎么才能养育自己的孩子？”

于是，老鹰又告诉郊狼：“去娶了她吧。她将是你的妻子。”

就这样，郊狼和那姑娘一块离开了。他对她说：“帮我抓抓虱子。”姑娘依言挠了挠，结果逮到了一只狗蜱(woodtick)，害怕地把它丢得远远的。可是郊狼却一把抓住了她：“快点，去把它找回来！快去！快点去吃了它！把那蜱虫吞掉！”

姑娘依言把蜱虫放进嘴里，又把它吞下了肚，就这么怀了孕。她见状慌了神，撒腿就往荆棘丛中跑去。郊狼赶忙追了上去，一边跑一边喊：“别往那丛子里去！”

于是，郊狼为那姑娘开了条通路，但她说：“我不喜欢这路”。于是他开了条两边满是鲜花的通路，但她还是不喜欢：“不，我不习惯从花丛中走。”郊狼无奈之下只好认输：“好吧，没有办法了，看来我是拦不下她的。”

那姑娘一路跑到了海边，趁郊狼不及纵身跳进海里变成了蝉蟹(sandflea)。郊狼跟着跳了下去，但只撞上了沙滩。他伤心地说道：“我多么想抱住我的爱人，但只能触到沙子。我的妻子消失不见了。”

这个故事来自克罗伯的神话目录，但并未记载其后续，读上去戛然而止。另一个版本的创世神话暗示说郊狼作为人类始祖有不只一位妻子：

郊狼的妻子替他生了一个孩子，便对他说：“我不想你再娶其他的女人。”但郊狼答道：“但我想要很多孩子，而光靠我们俩是不行的。让我多娶几个吧，这样世上就会有许多人和我们一起了。”妻子便允了，说：“好吧，那就去吧。”

于是郊狼生养了五个孩子。他们问自己的父亲：“我们该在哪儿搭房子？我们该去哪儿结婚生子？”

郊狼答道：“到世界各处去吧。”

于是，他们便四散建立了五处牧场，各讲一种语言——埃森语(Essen)、朗森语(Rumsien)、艾克雅语(Ekkheya)、卡孔塔语(Kakonta)和瓦查隆语(Wacharone)。

之后，郊狼又赠给人们捕鱼的网和猎兔的弓箭，又说：“你们可以吃松果泥，采松果做成松果面包吃。你们还可以下到海里采集海草搭配着吃——记着要在低潮时去，还可以同时捡鲍鱼和贻贝吃。你们也可以捕兔子吃。如果你们什么也找不到的话，就去采七叶树(buckeye)的果子吃。如果松果尝起来有苦味，就去洗洗；也记得要去搜集野燕麦做粉面，可以把它们装在背篓里。”

他又继续道：“记得要去找我刚才所说的种种物产。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种种好物，现在该离去了。你们已经学成了。我已经告诉了你们该怎么觅食，这样就算大雨下个不停人们也不会受饿而死。我已经老了，走不了了。哎呀！我去了。”

一些版本指出郊狼的第一个妻子就是前文中跳海的那位姑娘，但上述两个段落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似乎也不合逻辑。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指出这些文本都来自奥隆尼（科斯塔诺）民族最南边的部族，所以在内容上可能带有一些地方性特征。比方说，埃森和瓦查隆（有时也被拼写为Guacharron）都是蒙特雷湾附近的奥隆尼小村，而白山和加庇隆山也位于这片区域。北方奥隆尼族群的神话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一位19世纪中期的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从一位最受尊敬的探险先锋处口头听来的”奥隆尼创世神话，在一些重要的细节上和上述故事有所不同。他写道：

很久很久以前，在世上还没有人类的时候，一正一邪两个灵魂展开了对抗，最终前者取得了胜利。那时整个世界都淹没在水下，只有两座小岛露出水面，分别是迪亚波罗山(Mount Diablo)和里德峰(Reed Peak/Mt. Tamalpais)。

那时，里德峰上住着郊狼，他也是那儿唯一的活物。一天他看见水面上飘着根鸟羽；它漂啊漂，来到了岛上，突然变成了一只老鹰，展开双翅飞上了山顶。郊狼见自己有了陪伴，很是高兴，一鹰一狼便和平地住在了一起，有时还会去另一座岛上探险。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经过讨论，决定创造人类。这些最早的人类很快有了孩子，水也开始缓缓退去，给予了人们更多更广的土地。很快那些孩子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而水位还在继续下降。然后这些孩子又生养了更多孩子，如此这般。于是，随着人口增长水位逐渐下降，直到有水的地方都成了旱地…

另一个据称来自北方奥隆尼部落的创世神话则为我们提供了有些费解的额外信息：

在人类诞生之前，世界上住着的是一个类鸟种族。但是他们最终被郊狼所引发的大洪水彻底消灭了。

大神库科苏本尊不常直接出现在神话里，而更多的时候仅在祷词和圣歌中被提及。通过一些线索，学者们推断库科苏是原住民对月亮的神化形象：瓦伯人(Wappo)的神话暗示库科苏作为月亮教会了郊狼——人类之祖——说话、动作、行走和发笑的能力，再由他把这些礼物赠给了人类；北方波莫人说库科苏的父亲叫马吉拉(Makila)，意即“雷电之人(Thunder man)”，并且拥有更强大的法力；这一父神/子神的谱系也出现在了卡托人的信仰中，不过雷神之名变成了特克尼斯(Tcenes)，而库科苏的名字也变成了那伽希陀(Nagacito)，意为“伟大旅者(Great Traveler)”——对日月在天上运行轨迹的指代。在卡托人那儿，那伽希陀（库科苏）也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奥隆尼人信仰中郊狼的地位，成了大水退去之后第一批人类的先祖。类似的“旅者”意象并不罕见：玉奇人的主神泰克摩(Taikomol)意为“独行者”，怀拉基人(Wailaki)的主神神名则是更确凿的“夜之旅人”科塔那盖(Ketanagai)，不仅具备治病救人的权能，而且和传统的库科苏外形一模一样：

长着个满是羽毛的大头，手里拿着棍棒。

相比于程序比较简单，比较注重普通宗教教学的初级入社礼，库科苏崇拜体系下的高级秘社有着高的准入门槛。在大多数部落中这些秘社的成员都是巫医，根据其“行医资格”的来源被分为视梦医(maḍu)和衣钵医(q'ɔ'ɔbakiya'lxalɛ)。前者有时也被称为“吮肤医(sucking doctor)”，其资格来源于某种神启。一位调查者仍举了波莫人的例子，介绍说：

这种能使男女成为视梦医的神启经历一般发生在他们的中年，而且只有可能自然发生，且通常是毫无征兆地在生病期间出现。在神启中，他们总是看见一个陌生人操着受启者的语言教他（她）做事；它自称是马容达(Marumda)[波莫人神灵]的信使，告诉他们若不遵其命令便会遭遇死难，然后教给他们治病的歌曲。这样一个神启的梦境通常会发生两次，随后就再不会出现。醒来后，这新任的视梦医便会拿根长棍(maḍu'xai)按照梦中所得的朝圣路线四处巡游两到三天，一家家走过去寻找病人并收取贝珠串(wampum)作为回报。在朝圣结束后他会整个村庄宣讲自己的梦境，从而让这片地区的居民们确切地知晓他已经拥有了巫医身份。

另一份相关资料则来自我们的老朋友洛伊伯。他没有记载神启的具体内容，但对秘社的运作做了解释。显然，要成为视梦医并不是自称遇到神启就可以的，还要经过其他老资格巫医的检查。洛伊伯补充说，新的视梦医经常会在老视梦医的病人中出现，尤其是那些从外面回家后就开始生病的倒霉蛋们——巫医传统上认为这些人是在野外无意中看见了鬼魂怪物、异常生物或别的什么超自然产物而受惊的，因此是潜在的神启对象，或称“学生”：

为了治疗，一两名老视梦医会和潜在的新人一起舞蹈。这种舞蹈被称为maru ke，而整个[考察]典礼要持续四天；典礼期间新人不能吃鱼吃肉，而只可摄食松果面包和玉米粉，但是可以喝水。视梦医们晚上跳舞，白天睡觉。

就是这样的舞蹈决定了新人能否真的当上巫医。在舞蹈途中，学生会突然口鼻流血，而且在老巫医吸血时还会吮出“病痛”的某种具象。如果某学生在舞蹈时不吸血的，就没有当巫医的资格…老巫医吸出的“病痛”被称为“立身毒(k'o'o detul)”，几乎总是蠕虫这样的活物，而决不会只是一小片燧石。



Skin worn by Pomo Bear Impersonator
(Posed by Henry Ingraham,
Discretio Ind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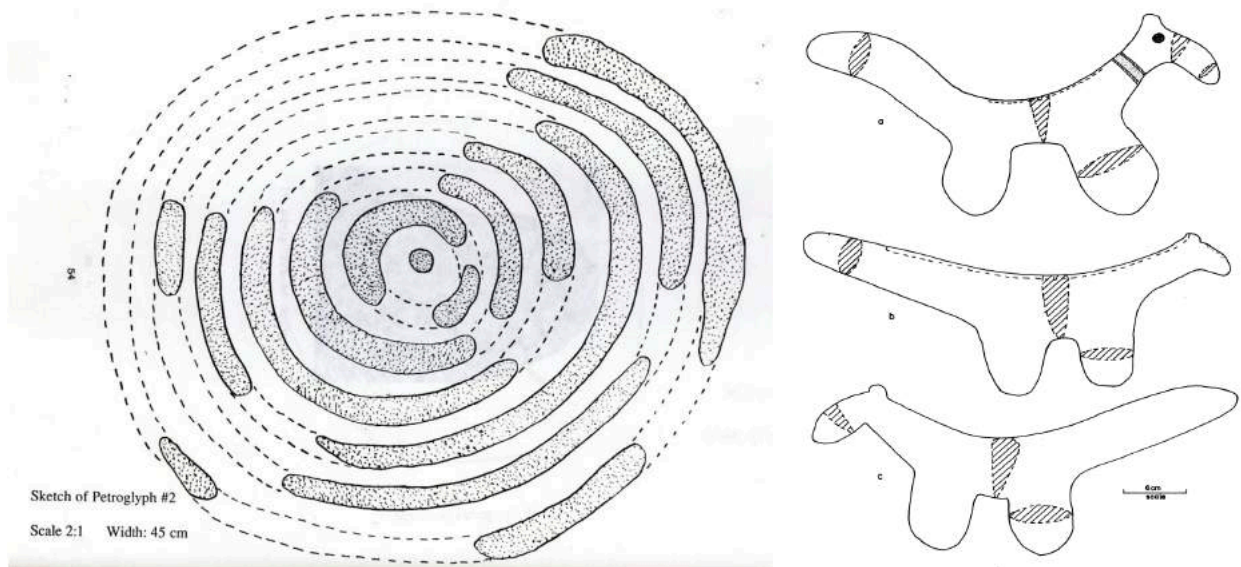
比起视梦医，衣钵医的“医疗手段”更复杂些。前者的治疗方法一般包括歌曲和吮吸病人皮肤，而且由于神启是一次性的学习机会，他们的秘密歌曲数量较少，也应对不了特别罕见的病症。衣钵医们则来自巫医世家，一般顺着父子或舅甥的脉络传承，利用包括歌曲、祷词、草药和仪式在内的各种手段帮助病人。比方说，如果有人受惊，衣钵医会首先确定导致惊吓的恶灵身份，然后把自己打扮成它的形象“以毒攻毒”；如果有人见到了特定类型的超自然现象（比如带条纹的鹿），巫医们则会扮成大头的库科苏本尊，通过一个麻烦的仪式性表演祛除诅咒。至于该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各种器具，譬如响铃(wayo'i)、黑曜石刀(q'j'oxaka)、颜料和羽毛头饰(biterk)，则统一放在被称作“衣钵(gula cuna)”的鹿皮袋子里代代相传。这些巫医自认其法力源自包括马容达在内的“六大秘社灵”，分别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以及天地，也会在制药或治病的那几天早上向它们祈祷献祭。海岸米瓦克人的部落里同样存在这两种巫医，但除了他们之外还有第三种秘社，通过宗教舞蹈替人治病。这些舞蹈通常包含众多神话角色和象征，比如“雷神礼(holiwal kaul)”、人熊(kule)或库科苏伊(Kuksui)。考虑到北方奥隆尼人和海岸米瓦克人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似性，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也拥有类似的巫医秘社、神话体系和神启概念。

除了神话学和文献学的考察，一些现代学者也尝试着从考古文物的角度去重建奥隆尼人的精神世界。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人类学硕士芭芭拉·琼斯(Barbara Lee Jones)总结了在三处奥隆尼遗址掘出的动物遗骨，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老鹰和郊狼的宗教重要性。首先，在西湾伍德赛德(Woodside)市一处大约有1000年历史的墓葬群(CA-SMA-125)里，人们根据陪葬品数量将墓主人的社会等级分

为三等，其中前两等墓葬拥有动物骨的概率为82%，远超第三等的22%——显然动物在当时的奥隆尼社会里是某种社会地位的标志。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由猛禽骨骼制成的仪式用哨子，大多来自秃鹫或信天翁，但在陪葬品最多、地位也最高的墓葬中才会偶尔发现老鹰骨哨。毫无疑问，在奥隆尼人的价值体系里，老鹰是鸟族中地位至高、和统治权有联系的唯一一种。在伍德赛德和附近的另一处遗址(CA-SCL-690)里也都发现了和人骨埋葬在一起的郊狼骨架，带有陪葬的特征。在后者还出土了一座动物墓葬，其中认真地摆放着一头疑似郊狼的完整骨骸。这些现象在南湾的“三狼遗址(Kaphan Umux, CA-SCL-732)”得到了重现：在这里出土了三座精心准备的动物墓葬，两座埋有灰狼，一座埋有鹿骨；看上去它们被以人类死者的礼仪下葬，尸身上摆放有贝壳、绿色燧石(chert)，甚至陪葬的其他动物。类似的犬科或老鹰墓葬在湾区其他地方也有发现，很好地对应了当地神话中对这两种重要动物的拟人化描写——毕竟，葬礼在某种程度上不就是对死者作为“人”的认可么？

这种拟人形象也出现在了鲍鱼壳饰品中。考古学家们注意到这些饰物（大多是吊坠）在公元1300年左右发生了形态学上的变化：在那之前动物形象的饰物比较常见，但在那之后快速被类人形象的挂坠所替代——大约也是奥隆尼人晚期文化开始成形的时期。在这些类人吊坠中最有争议的一类被称为“库科苏吊坠”，看上去有些像是短粗的勺子，通常和地位最崇高的墓葬联系在一起，因此数量稀少。不少研究者认为其形状代表了“大头”库科苏神的外貌，有着巨大的头颅以及更小的正常人躯干。如果这一理论成立的话，将会成为奥隆尼人信仰库科苏毫无疑问的证据，可惜的是我们缺乏民族志的旁证——换言之，人类学家从未在19和20世纪的实地考察过程中发现加州原住民使用或提及这种饰品，所以总不能100%地确认它们的意义。最后，加州西北部时常挖掘出的动物形象石器和南湾奇塔塔克-亚当斯(Chitactac-Adams)地方发现的一处神秘圆环岩画也可能代表了潜在的宗教含义，不过它们甚至比库科苏吊坠更有争议：前者可能作为礼仪性质、而非宗教性质的饰物，而后者则被称为奥隆尼文化体系中“最不受人注意”的一部分。





最后，另外一些奥隆尼神话故事还包括郊狼和蜂鸟之间的争斗：

郊狼自以为比其他一切生灵都更博学，但蜂鸟实际上懂得更多。于是郊狼起了杀心，逮住蜂鸟把他磨成了肉泥，便离开了。但蜂鸟死而复生，振翅飞起，嘲讽地叫道：“拉昆(Lakun)，死了！”于是郊狼又抓住了他，生起火把蜂鸟丢了进去，便和族人离开了。但他们没走多远就看见蜂鸟飞了过来，又“拉昆、拉昆”地叫着。“我该怎么才能杀掉他呢？”郊狼问道。人们答道：“只有你把他吃掉才行。”于是郊狼把他吞进肚中，但蜂鸟反而在他肚子里又抓又挠。郊狼便问：“现在怎么办？我觉得我必要死了。”人们又说：“你必须把他排泄出外。”郊狼便如此放出了他；蜂鸟再一次飞了起来，大叫道：“拉昆！”

郊狼和妻子出海：

玛科维克(Makewiks)是一种住在海里、时而浮到水面上的生物。一天，郊狼和妻子将要出海。为了安抚她，郊狼和她讲了海狮、贻贝、螃蟹和章鱼的故事，告诉她说这些生物都是他们的亲戚，因此当她见到它们的时候就不会怕了。但是他没有提到玛科维克，因此当它浮上水面时郊狼的妻子收到了极大惊吓，倒在地上死了。于是，郊狼把她扛在背上带了回去，生了堆火，又把尸体放在火边。接着他开始又唱又跳，很快他的妻子就开始有了复生的迹象。他连跳三次，她便活了。

郊狼欺骗自己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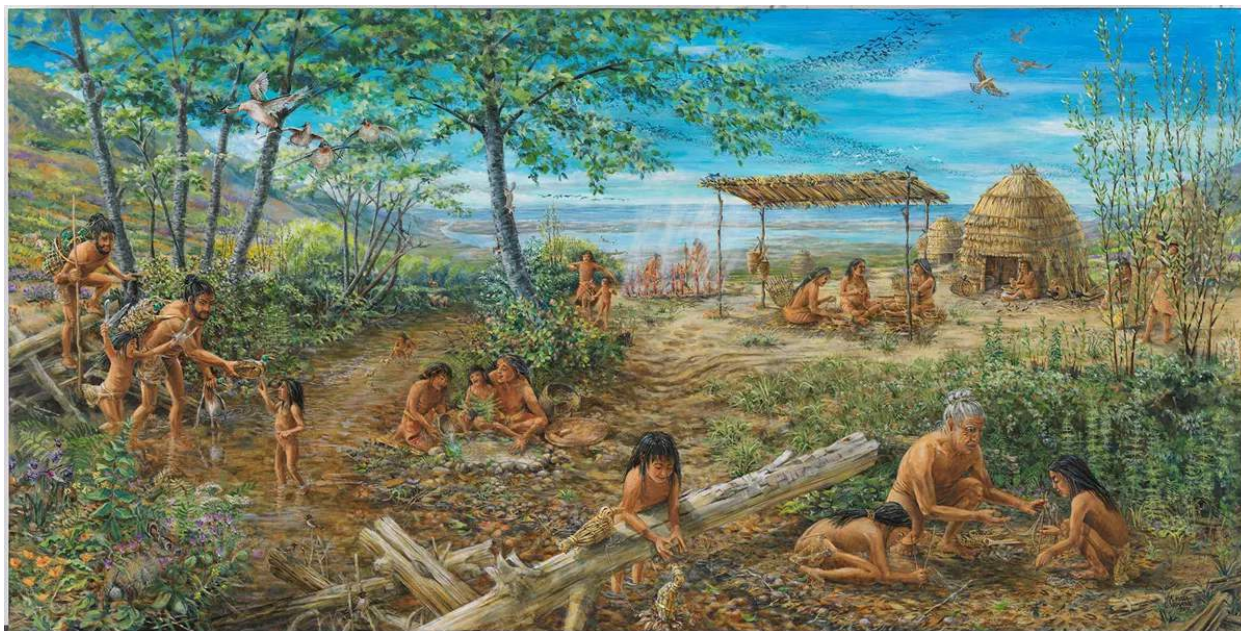
郊狼猎杀三文鱼后把鱼肉放在灰烬里炙烤。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们偷吃他的猎获，因此把鱼肉埋在灰里，每隔一段时间伸手进去吃一小块。他的孩子们见了，便说他竟然在吃火，必然会被烫到的。但是当他们也想要取些吃的时候，郊狼却阻止了他们，说：“你们会被烫到的。”

以及一个颇无厘头的片段：

郊狼请几位妇女从他的眼睛里拔根小刺出来；那是一根戳在他眼皮之间的小棍子。一开始她们不相信他，于是他找到了其中最漂亮的那位，唱道：“由你把它拔出来吧。”但是，当她试着用手指抓住小刺的时候郊狼又说：“不，用你的牙齿。”当她用嘴咬住小刺的时候郊狼一把抓住了这女人，便带着她跑走了。

1-7 奥隆尼人的生活方式：经济和日常活动

若要直观地了解奥隆尼社会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比情景重现更好的方法了。马戈林在他广受好评的《奥隆尼之道(*The Ohlone Way*)》里就做了类似的尝试，重建了1768年四月中旬，也就是欧洲殖民者主力抵达湾区一年前一座东湾村庄的生活细节。在这一小节里我们将回收利用他为我们设计好了的背景，不过要添加一些细节：我们知道佛利蒙的地界当时属于一个叫做图伊班(Tuibun)的奥隆尼子部落，其主要村庄坐落在郊狼丘边沼泽地里的林地附近，大约在海岸和平原之间的位置上，因此各项经济活动——从捕鱼、植物采集、狩猎再到地区贸易——应当都比较发达，会是一个良好的案例。远远看去，这座村子并不很起眼——由于几十代人在此居住繁衍，村庄原址积累起了一层又一层贝壳碎片、废弃石料和其他垃圾，看上去比四周的地面高出不少。在这个贝丘遗迹上建起了十几间茅草住屋，每一间里都住着一户家庭。



他们的家庭结构并不复杂：大多数部落成员都遵循一夫一妻制，只有酋长和少数杰出的武士或猎人才有资格娶多个妻子。这对夫妻和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共同组成了一个核心家庭，但双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在家庭的日常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一个正常的奥隆尼“家族”通常有10到15口人。其中，夫妻双方未嫁娶的兄弟姐妹一般是和核心家庭关系最紧密的：在北加州的部落中，丈夫和妻子的单身姐妹搞婚外情似乎是被默许的，而寡妇一般会在丈夫去世的两年后嫁给丈夫的单身兄弟；鳏夫则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在北湾的卡托人聚落里，他必须得娶亡妻的姐妹，如果她

们碰巧都嫁人了，那他就得娶她们的表姐妹，否则会被视为对女方家族的冒犯，时有性命之忧。相比之下，岳父岳母们和儿媳或女婿之间的关系比较疏离：女婿和丈母娘之间几乎从不说话，后者甚至会在前者面前戴上鹿皮面罩以避免眼神接触；公公和儿媳之间的“男女大防”相对没有那么严格，但后者通常也会带上类似的面罩遮住半边面庞。丈夫和岳父以及舅子之间则几乎没有社交禁忌，开开玩笑、打打闹闹似乎是很常有的事。

至于婚姻本身，可以说是重要却不隆重的。女孩们一般在十二三岁的时候结婚，男孩的婚期应当差不多。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恋爱似乎是存在的，但男方的亲戚仍然拥有决定性的权力。他们也必须遵守一系列婚嫁禁忌——家族内部的通婚（除了寡妇和鳏夫之外）自然是不被允许的；同一胞族(moiety)或氏族(clan)内的通婚也被视为禁忌行为，因此来自小村庄的少年少女经常要靠地区性集市或宗教仪式来认识可供选择的心上人。婚前男女之间的接触似乎也不频繁，更多地停留在互唱情歌的地步。如果男方家庭确定了心仪的对象，就会先由男方母亲出马向对方家庭赠送包括芦苇篮子、贝壳珠子、弓箭和毛皮在内的大量礼品。如果对方不反对的，新郎便会在双方家长的陪同下去到新娘家中，在他们的注视下爬上爱人的床铺，婚礼就算完成了。在那之后女方家庭会给男方回礼——在数量和质量上至少要和先前收到的礼物持平，也算是彩礼的一种，而新郎则会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暂住于女方家里，为的是通过帮忙干活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在“考核期”结束后他会带着自己的妻子回到父母家住，直到他们生下孩子后在村庄里建起自己的草屋。

妇女怀孕和新生儿的降生是村庄里难得的两件大事，也受一系列行为规范限制。比方说，为了避免新生儿长得太大、太难分娩，孕妇通常是不能吃鱼吃肉，甚至摄入食盐的；她的丈夫也得遵循类似的饮食习惯，并且一般不会在妻子的孕期内外出狩猎，以免触怒自然界的神灵魂魄以降祸自己未出生的孩子。在临近分娩的那几天里，村庄上下都笼罩着有些紧张和期待的气氛——有生产经验的妇女和接生婆时刻准备着协助产妇，在必要的情况下巫医也会介入；丈夫会提前在草屋的地上摆好烧暖的煤块，然后在上面盖一层厚厚的草甸当作产床。新生儿一落地，接生婆就会用燧石刀切断脐带、把胎盘赶快埋到地里，然后用温水擦洗婴儿全身，再把它放进用兔子毛皮制成，饰有羽毛和小珠子的摇篮里，涂上动物油脂以祛病。不幸的是，如果新生儿碰巧有某种身体畸形或者是双胞胎，那么便会被当场杀死埋葬，以免带来厄运。类似的传统在世界各地的原始社会中都存在着，在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神话学(Mythologiques)》中有精彩的相关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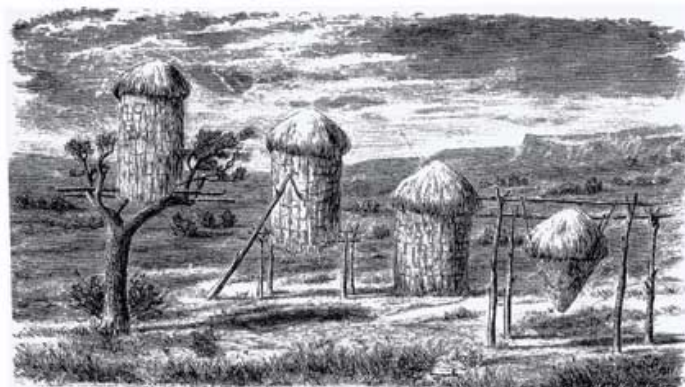
在现代，大部分准父母在孩子出生前就想好了他或她的名字，但在很多古代社会里取名都得等到新生儿几个月大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为了避免孩子夭折。在许多北加州部落中，父母在孩子满两岁时才会给他们起名；这是因为这些族群的名字是“一次性”的——在某人死后，他的名字不仅不能再用，甚至都不可以被提起，而只能在少数情况下通过某种仪式转移给后代使用；因此，考虑到当时婴幼儿的死亡率，给每个刚出生的孩子起名可以说是潜在可用名字浪费。更何况，这些“潜在可用名字”本来也不太充足：在加州中部和南部的丘马什(Chumash)人之间，大部分名字都是简单的形容词或自然事物——譬如“白云(Alow)”、“木匠(Mateqai)”、“满是鸟儿的(Shuluwish)”甚至“女人(Leqte)”——因此只有贵族或巫师家族的新生儿才能拥有名字，其他人只能有非正式的译名或外号；卡托人和其他湾区部落似乎没有这么严格，但正式名和译名间的分别仍然不很明确。我们不妨通过洛伊伯的记录摘取一些样本：男孩可以叫做“又胖又大(kacuñ)”、“在膝盖上磨白松果(gicañ got besite)”或“黑手(latcin)”；女孩则可以叫做“三叶草(tolic)”或“雷眼(tcenes naç)”。

总之，当一个奥隆尼男孩或女孩拥有自己名字的时候，他就成为了部落和社会的一份子。到了五、六岁时，他们便开始担负一些基本的经济任务，比如采集莓果、搬运猎获等。七、八岁时他们开始按照性别分工进入各自的角色：男孩们要跟着男性长辈们学习打猎、捕鱼和制作工具的技巧，女孩们则跟着女性长辈们一同外出采食、学习手工制篮并接受纹身。男孩的成长在十二三岁的“入社礼”或“成人礼”时画上了句号，而女孩的短暂青春则在她第一次来月经时宣告结束。在奥隆尼等加州部落里，女性的初潮是很重要的仪式性时刻：她们得在用热石熏过的鹿皮毯子上躺满六天，和成人礼期间的男孩一样靠松果汤和水活命，每天晚上还要观看家里人在她周围又唱又跳。在那之后她还要经历长达六个月的戒度期(abstemious period)，期间不能出远门、吃肉、过量喝水或做工，也不能说太多话。戒度期的结束以一场盛宴为标志；在那之后，她就可以和男青年谈情说爱，也得担负起作为奥隆尼女性的一切职责了。

每天清晨她从兔皮铺子上醒来，也许会高兴地意识到自己还不用立刻开始一天的劳动。湾区的原住民大多是很注重个人卫生的；在一些部落里，不论男女都会在起床后先跑去附近的小溪里拿磨碎的皂根洗个澡，用椒叶和鹿皮擦干全身、拿水漱漱口、嚼几枚清新口气的椒果(pepperwood nut)再把它们抹在脸上，据说能抹掉皮肤里的脏污并增加头发的光泽。在这之后，妇女们裹上鹿皮围裙、披上鹿皮披风，再把长发用鸢尾花的花茎和骨棒固定住，才进入一个采集者的角色。在出发前，她发现存在草屋角落的苇草篮子有些不够用了，便决定先做些缝补工作。和其他经验丰富的奥隆尼妇女一样，她的家里储存着在无数次采集之旅中收集来的藁草(*Carex*)和水葱(*Schoenoplectus acutus*)；于是，她拿起几根，在水罐里浸湿后开始认真地补起篮子上的漏洞。光是编一个中等大小的奥隆尼草篮就要25000次手上动作，但只是补些破洞的话一个上午也就够了。吃过午餐——很可能是松果面包和烤鸭肉——后她抱着自己的杰作和其他几名妇女一起向林地进发，在夜幕降临前返回营地的時候篮子里已经装上了不少食材和其他有用的植物：松果、七叶树的果实、树莓、野洋葱、皂根、香蒲的根茎、胡萝卜、蘑菇和甘蔗。



© Courtes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National Anthropological Archives (Inv. 01515100), by José Cuatrecasas, 1791



差不多同一时候，她的丈夫和兄弟也回来了，还给部落带来了充足的肉食。运气够好的话猎物不仅包括鹿、水獭、浣熊、野鹅和野鸭，甚至还会有满是油脂的灰熊和十几种水禽。和他们的妻子姐妹一样，男性猎手们也会在外出时采集松果：作为奥隆尼人卡路里的主要来源，它们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为过。许多部落还建有专门的松果谷仓，为冬天储备充足的主粮。



天彻底黑了下来，村庄里的人们聚在一起生起火堆，一边烤肉一边煮松果面糊。村庄的栅栏边有青壮轮班守卫，而其他人们则可以在一天的劳作后放松下来了。父亲也许会对儿子讲起一天在外的经历，不免吹嘘一番自己杰出的狩猎本领——在一些部落里，这些技术高超的猎人甚至拥有独特的头衔，例如卡托人中的杰出猎鹿人(culwe)和杰出渔夫(coget)。他也许还会向他们传授自己的狩猎技巧：一些猎人会把鹿皮披在身上伪装成鹿群的一员，从而靠近警觉的猎物；不同样式的箭头在不同距离和不同猎物上有不同的功用。晚餐时间也是部落成员间加强了解、促进关系的好机会：在奥隆尼社会里集体的作用是重大的，而无论是成功的围猎还是出海打渔都需要熟练的团队合作。一个他们常玩的游戏叫做“图戏(Tussi)”：一人双手握拳，另一人则要猜出哪只手里藏着根小棍；另一个难度高得多的游戏其实更像是标枪比赛：在一根圆木上钻出孔洞，再把它滚出一段距离；在圆木滚动时人们轮流向它投掷标枪，正好穿过孔洞的就能得分。

晚餐后他们也还闲不下来——一天的猎获正等着人们清点、分类和储存，而奥隆尼人在动物的利用方面是绝对的专家。在佛尔蒙郊狼丘博物馆里的一块展板上，研究者们用黑尾鹿(*Odocoileus hemionus columbianus*)的例子把他们的这个特点描绘得淋漓尽致。“原住民们很少浪费鹿身上的任何一个部分，”展板告诉我们，“在加州的部落里，从鹿蹄到鹿肉，再到肌腱和鹿脑都有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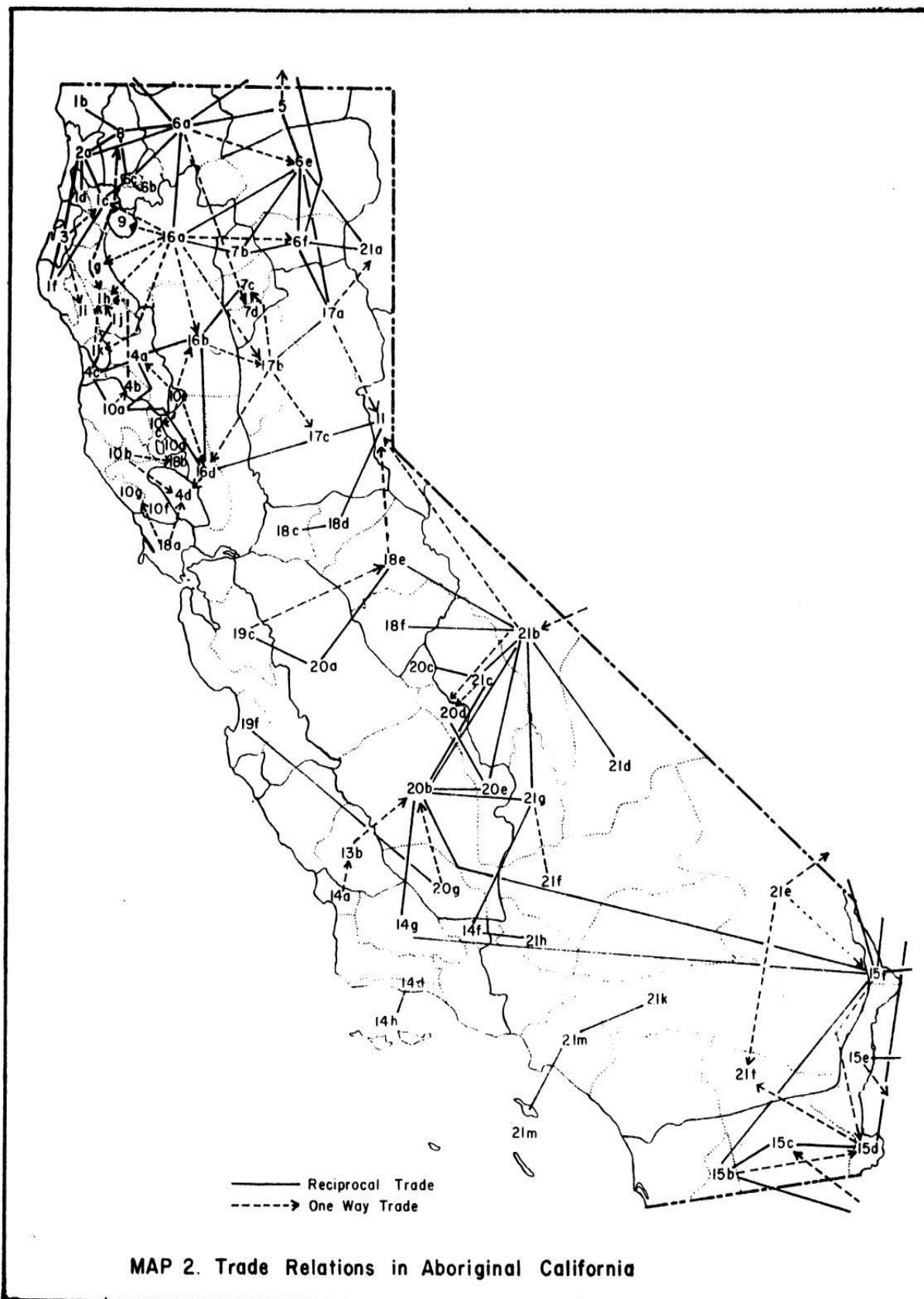
- 鹿皮——用于制作毛毯、斗篷、妇女穿的裙子和其他衣物。
- 鹿筋——筋和肌腱会被仔细地分成单独的根根纤维，然后揉成弓弦和绳子。
- 鹿肉——常见的肉食之一，也常被熏干或风干用作长期保存
- 鹿角——一般用作工具；较粗壮的部分可以当作劈木柴的楔子，鹿角的分叉可以作为扳手扳直弯曲的箭柄，鹿角的碎片则可以当作鱼叉的尖头。
- 鹿头——如上所述，有经验的猎人会把鹿头掏空顶在自己的脑袋上作伪装。
- 鹿蹄——蹄子常被切成两半，每一半都连在绳子上作为响铃，据说一摇就响。
- 鹿骨——鹿的肩胛骨可以做成锋利的镰刀，常用于切割芦苇和莎草；腿骨根据长短有不同的作用：短小的被用作游戏的棋子，较长的则被制成骨哨。
- 鹿脑——煮过的鹿脑被用于制作皮革；据说鹿皮在其中浸泡后会变软。

除了集体狩猎、集体娱乐和集体工作外，奥隆尼人的集体精神也体现在他们分享食物的习惯上。我们之前提到部落酋长的一大美德就是慷慨：他要大方地对待其他部落的友人，也要把赠送给他的食物和工具分配给聚落里的其他人；这一社会期待在更小的层面上同样适用。打猎归来的男子总是将肉食和亲朋好友们分享，心灵手巧的妇女们也毫不介意把手制的篮子或磨好的松果面粉赠送给邻居家的女主人。许多研究者相信，由于湾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比起填饱肚子，“以分享维持部落成员间的友谊和他人的尊敬”反而是更迫切的需求。这一乐于分享的社会风气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安全网(safety net)——如果一户人家的男女主人不幸早逝，他们生前的慷慨会很好地保障部落成员对其后代的持续照顾。

虽然奥隆尼人的经济活动几乎完全依赖自给自足的狩猎与采集，他们的村庄决非经济孤岛。跨村庄和跨地区的贸易是很常见的，一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第一种是私人贸易网络：通过复杂的婚姻关系，不少人都在邻近村庄中有熟识的姻亲；其中一些人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建立起了被称作“特殊伙伴(special friendships)”的私人贸易关系。他们日常在聚落间穿行，向不同部落出售食物、烟草、工具和“珍奇品”，比如工艺精湛的贝珠、动物石像和只在特定地方出产的矿物。一些作者将这些贸易网络比喻为“加州最早的高速公路”——至少在距离上，这个比较是很合适的：北加州的玉罗克(Yurok)人和温哥华岛之间有着稳定的商业交易，产自湾区的蛤贝珠最远流传到了阿拉斯加，而奥隆尼人常用的朱砂颜料也主要来自华盛顿州的瓦拉瓦拉(Walla Walla)地区。在更近一些的范围內，奥隆尼人也是海产品的大宗卖家：他们向约库特人提供鲍鱼、贻贝和海盐，并为山区米瓦克人供应橄榄贝，以此交换这些部落在森林里采集的松子。

如果说这些“特殊伙伴”贸易关系代表了原住民商业体系中较精英、排外的一面，那么部落之间的集市就代表了其面向普罗大众的另一面。奥隆尼人的集市没有在历史记录中留下印记，但从不远处的卡托人、玉奇人和波莫人部落处我们得知，当一方决定好集市的开市日期后，其酋长便会派专门的信使(cuñ natsis)带着一把木棍去到另一方的酋长那儿，把木棍交送给他以作为倒计时的工具：自那天以后对方酋长每天从中丢弃一根木棍，而木棍消耗殆尽的那天就是集市的日子。举个例子：如果集市在十天后开始的，信使手中就会有十根木棍。同样的计时方法也用于诸如庆典和游戏在内的其他跨村庄活动。在开市前一天，提出交易计划的一方便会集体前往对方村庄，只留下几个中年男子看家。有时候一方酋长还会取下自己的贝珠串赠给对方酋长，但这么做的意义不很明确。除此之外，集市上的交易都是以物易物的形式，很少用到贝珠等“货币”等价物。

这样的集市通常要持续五天，不仅仅促进了经济的交流，也是村庄和部落间适龄男女互相认识、成员间构筑友谊、娱乐放松的难得机会。正因如此，加州原住民的集市总带有一些仪式性和程序性的意味：比方说，在卡托人和玉奇人之间，双方碰面的第一晚是不举行实际交易的，而是被用作“开市典礼”。双方的集市参与者在一片空地上面对面地坐着，而作为集市举办地主人的玉奇人酋长则第一个开口说：“先交易，再玩乐”，随后还会叮嘱其部落注意表现，不要赌博、骚扰女人或做其他什么出格的事；然后，远道而来的卡托人酋长则回答说：“这正是我们来的目的，是很好的。”最后由玉奇酋长做总结性的祝福：“明天多多交易。”这一来一往似乎都是有固定规范的。在之后的五天里，交易也只占去了较少的时间，大多数时候都花在了诸如跑步、掷枪、射箭、摔跤和游泳、水下憋气等体育竞赛上。可以想像，在其他人为部落健儿喝彩欢呼的时候，青年男女们也得以找到机会温存一阵子。湾区部落间新一代的跨村庄联姻和“特殊伙伴”联系就这样诞生了。





最后，我们也许该谈谈可能是奥隆尼人手工技艺的顶点——莎草舟(tule boat)，很多时候也以西班牙语中的“筏子”一词被称作“巴尔沙(balsa)”。这样的小舟一般足以承载两到三人，外加几个篮子，是足以应对日常捕鱼或跨海湾贸易需求的。其制作一般只要用到两种材料：莎草和绳子，而且绳子很多时候也直接采用莎草编成。奥隆尼人所选用的莎草是北美特有的物种，学名叫做短尖水葱(*Schoenoplectus acutus*)，其茎秆能长到3米多高。正因如此，只要把大约1000根草茎用绳子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两头尖、中间鼓的纺锤形莎草筒，再把四五根这样的草筒绑在一起，就形成了一艘长度足够、浮力充分的小舟。由于受到了短尖水葱自然生长的限制，巴尔沙的平均长度大约是3.22米，最宽处也只有80厘米上下，但是吃水很浅，所使用的材料也唾手可得，对于没有远洋航行需求，工具也相对原始的奥隆尼人而言是最合适的水上交通工具。



不过，这一实用产物似乎并不受早期欧洲人的待见。英国的温哥华上校(George Vancouver)管它叫“最粗糙可悲的工具”，而俄国探险家科策布(Otto von Kotzebue)则表示奥隆尼人乘坐巴尔沙出海时“水一直浸到他们的屁股”。于是，一方面为了实验调查，一方面也是顺应原住民文化复兴的需求，东湾地区公园的研究人员和志愿者们在1979、1981和1984年三次按古法制作了巴尔沙，又划着它们在旧金山湾里多次游弋，终于得出结论说这些莎草舟“在

恶劣天气下也能保持平稳，浮力也很充分，足以在装载货物的情况下仍保持6英寸（约合15厘米）的吃水”，正可以在湾区的无数浅滩、沼泽和河道中穿行。它们唯一的问题似乎在于长期浸水后会结构松散，容易进水，因此需要定期挪到岸上曝晒。但是，另一位爱动手的原住民文化学者琳达·雅玛内(Linda Yamane)告诉我们，巴尔沙浸水后的重量会达到750磅——也就是340公斤，相当于一头小牛犊的体重。因此，它们的移动、修补和晾晒必然也是一项集体活动，就和现代的赛艇一样。时至今日，虽然莎草舟已经丧失了一切实用价值，它们的集体性却在原住民后代中保留了下来：科斯塔诺（奥隆尼）人朗森族下的卡梅尔部落(Costanoan Rumsen Carmel Tribe)在2018年召集部落里的青年们制作了若干艘巴尔沙以纪念他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祖先；2019年时一批奥隆尼人又在佛利蒙的自家车库里做了艘巴尔沙划去了阿尔卡特拉兹(Alcatraz)岛。如果你在今天去到蒙特雷著名的水族馆，也能在其露台上中国舢板的旁侧找到一艘标准样式的巴尔沙，距离雾蒙蒙的蒙特雷湾仅咫尺之遥。

就是在这片灰色的海域上，在1542年9月末的一天，几名划舟出海的奥隆尼人渔夫透过淡白色的晨雾第一次看见了西班牙人的盖伦帆船。这些巨大的阴影没有靠岸，只是安静地向北驶去。两百多年后的1775年8月，当西班牙人的船只第一次开进金门时，船上的水手们也看见了奥隆尼人的莎草舟——他们口中的“巴尔沙”——其中一艘小舟逐渐靠近了西班牙大船，舟里的胡奇恩(Huchiu)子部落奥隆尼人登上船舷，带着“芦苇制作的容器”向西班牙人分发了“许多小小的松果糕”。做记录的随船牧师文森特·马利亚(Vincente Santa María)搞不懂他们这么做的含义，但很可能是对交易对象好意的表示——就好比集市上的一方酋长把自己的贝珠送给对方首领一般。恐怕无论马利亚还是巴尔沙上的头人都会不会想到，湾区的小小世界会在之后的五十年里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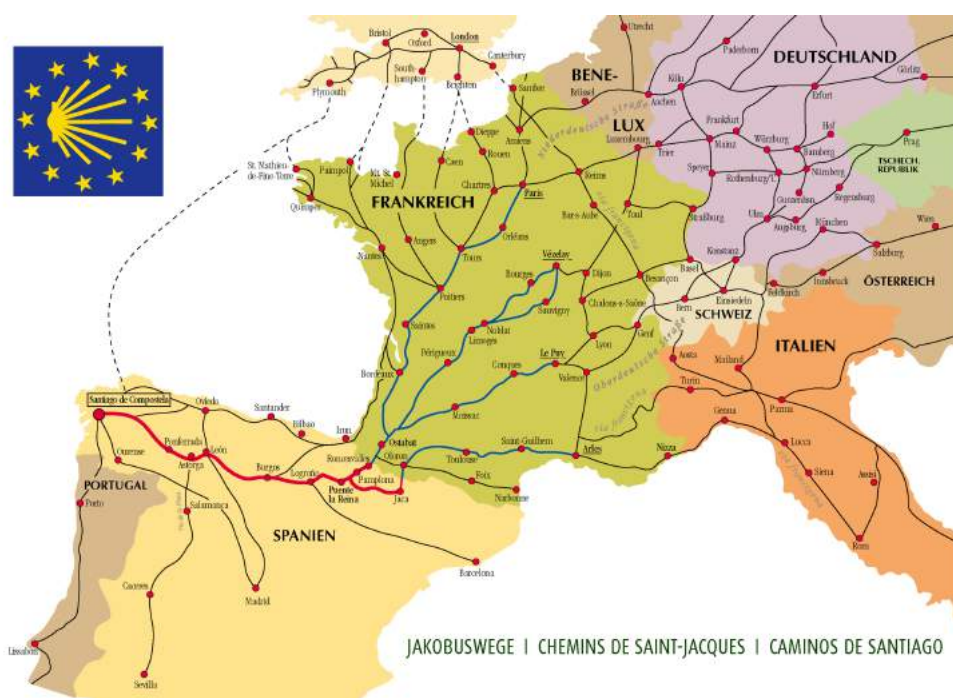


二、西班牙传教和军事殖民活动

2-1 西班牙人殖民新世界

西班牙是欧洲最早开始探索并殖民美洲的国家，但它在旧金山湾区的活动总共也不过持续了不到50年；就算我们把蒙特雷湾包括进去也只能把这个跨度拉长到200年——其中前100年更是只见证了零星的海上探索。这一方面是由于地理的限制——加利福尼亚位于美洲大陆的西海岸，而西班牙则与大陆东岸隔大西洋相对；在巴拿马运河于1914年竣工之前，这两个地方间的海上交通只能绕道南美洲最南端的麦哲伦海峡(Strait of Magellan)，危险且麻烦；陆上交通由于距离遥远、道路缺乏等因素也不太现实——另一方面也是西班牙重商贸、军事、开矿而轻移民、农业的殖民政策所决定的。和所有老掉牙的殖民史一样，这个故事也要追溯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óbal Colón)，一个凭着画错的地图和近乎固执的性情让子孙后代至今独享“世界洋海军上将(Almirante de la Mar Océana)”、一个公爵(维拉古亚 Veragua)和一个侯爵(牙买加)头衔的热那亚人。

哥伦布出生于公元1451年。在他十五岁的时候，伊比利亚半岛上两个最强大天主教王国的统治者——卡斯蒂利亚(Castile)的伊莎贝尔(Isabel)和阿拉贡王国(Aragon)的费尔南多(Fernando)——结了婚，将各自的领地联合成了统一的西班牙王国，即是所谓“天主教双王”时期。1492年时哥伦布四十二岁，首次带领船队航向美洲；同一年西班牙击败了半岛上最后的穆斯林割据政权——格拉纳达酋长国(Emirato de Granada)，踏上了积极对外扩张与干涉的道路。与此同时，其国内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自11世纪起，伊比利亚半岛上就出现了一系列较活跃的商路，将半岛西北海岸上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城和法国、意大利及英格兰等国联络了起来；这条“圣雅各之路(Camino de Santiago)”最初是全欧天主教徒来圣地亚哥城内的圣雅各之墓朝圣用的，但很快在13世纪成为了卡斯蒂利亚(和后来的西班牙)控制下西欧贸易的命脉。



然后，1348年黑死病袭击了伊比利亚半岛，在各个地区消灭了25%到40%不等的人口。这个数据虽然可怖，但大致和英法两国持平，低于意大利锡耶纳(Siena)的50%或德意志诸邦内汉堡和不来梅(Bremen)等地的60%。不过，和英法等国相比，西班牙各地所遭受的经济打击尤为严重；这很可能是因为其经济模式有些超前了。比方说，当时英格兰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农业：85%的英格兰人是村庄里的小农，因此疫情的肆虐或交通的瘫痪并不会直接影响其生计——外界交流的断绝并不会导致人们种不了地，而他们的剩余收成总也能在不远的村集上出卖——但是，在商业发达、十分之一人口居住在万人以上城镇的卡斯蒂尔，“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相对较少”，而人们的收入更加依靠跨地区乃至跨国贸易，自然在瘟疫面前更为脆弱。同理，西班牙各地的经济形势在黑死病过去后恢复得也更慢。在英国，黑死病的传播在1349年年末基本停止了，而农牧业生产力在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就有了显著的反弹：奶牛产奶量上升了12%、绵羊产毛量增长了22%；小麦和大麦等主粮作物的平均亩产也只比世纪初低10%到15%。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到劳动力的减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经济史学家朱迪斯·盖尔曼(Judith R. Gelman)在她的开拓性研究里总结说“英格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后瘟疫时代过得反而更好了。”

类似的景象在西班牙要等到1390年代才会出现，而且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仍然遵循了和之前差不多的模式。农业的进展极为缓慢，以至于连续几任君主都出台政策免去农民用农具或耕牛抵债的义务，甚至下诏禁止在每年的七月到十二月份间关押欠债农民，希望能以此促进农业投入，但鲜有效果。与此同时，人们却将大片草场用于养羊，再将羊毛制品出口到欧洲其他国家；说到底，黑死病之后的西班牙又回到了偏重商业的老路。这条路在短期内拉高了国民收入，也让许多市镇重现繁荣，但这样一个重商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十分巨大。除此之外，野心勃勃的西班牙王室梦想着在控制地中海的同时挑战法国，而这样大规模的对外用兵也是极昂贵的。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之下，西班牙统治者被迫采取了一种“攫取型(extractive)”的经济政策，意图通过一切可能手段快速积累可以“变现”的财富。这一政策在本土化身成了宗教审判(Inquisition)和1492年对全体犹太人的驱逐——这样一来，宗教异端和犹太教徒的大部分财富都得以收归西班牙所有——而在海外，它则体现在了西班牙殖民体系的方方面面。

1492年10月13日，在20多万犹太人拖家带口逃离西班牙的两个半月后，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登上了加勒比海中的巴哈马群岛(Bahamas; Lucayas)，踏出了美洲殖民的第一步。西班牙攫取型殖民政策的特征从那一刻起便展露无遗。在当天的日志里哥伦布记录了他和原住民的第一次接触：

我特别注意着他们是否拥有黄金，然后发现一些人的鼻子上有穿孔，孔里挂着一个小块金子；通过手势比划我了解到往南边去的地方……一位国王拥有许多金器。

于是，哥伦布向西南方向航行，发现了古巴(Cuba)和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两座主要岛屿。在前者他一无所获，但在后者的北岸他发现了一条沙里多碎金的河流，乐观地在地图上把它标注为“金河(Río del Oro)”，相信岛上的内陆地区必然存在储量惊人的金矿。于是，在1492年年底，他在金河河口附近建立了西班牙在新世界的首个据点“圣诞堡(La Navidad)”，留下二十余人驻扎后返回了西班牙向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多汇报了探险途中的发现，有些夸张地表示：

在伊斯帕尼奥拉(Española)有着最上等的金矿……开采后必有大利润且利好商贸。



就这样受着金银的驱动，西班牙殖民者很快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建立了永久殖民地，又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完全占领了波多黎各(Puerto Rico)、牙买加和古巴。在1501年和1503年间他们试图在南美大陆的海岸上建立长期据点，但直到1510年才成功在哥伦比亚建立了圣玛丽亚镇(Santa Mariá la Antigua del Darién)。1513年时西班牙探险家巴尔沃亚(Vasco Núñez de Balboa)穿过狭窄的巴拿马地峡，第一次看见了太平洋；两年后一批天主教修士在委内瑞拉的海岸上建立了新托雷多(Nueva Toledo)；在1519年，巴尔沃亚的岳父阿维拉(Pedro Arias de Avila)建立了巴拿马城，而威名远扬——或者说臭名昭著——的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也在同一年带着600名欧洲水手和士兵踏上了墨西哥的土地，一边建设维拉克鲁斯(Veracruz)城一边向大陆腹地挺进，最终在1521年击溃了地区强权阿兹特克帝国(Aztec Empire)。1532年，与科尔特斯齐名的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率领小股部队在卡哈马卡战役(Battle of Cajamarca)中击败印加帝国(Inca Empire)并俘虏其皇帝，几乎控制了整个秘鲁。到了1542年年底的时候，西班牙的大部分美洲领地都已经牢固地掌握在了两个副王区下——新西班牙副王区(Viceroyalty of New Spain)控制着墨西哥和加勒比海诸岛；秘鲁副王区(Viceroyalty of Peru)则控制着所有南美殖民地。

和伊斯帕尼奥拉岛相似，这些殖民地的首要目的就是开采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在1540年代以前，西班牙殖民者获得黄金的方式仅限于从原住民手中购买金器和黄金饰品——在美洲原住民眼中漂亮的金子并没有实际价值，因此“一盎司黄金换铃铛”或者“谷物换黄金”一类故事在欧洲人的记录中层出不穷。在攻打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途中，西班牙人也对两国黄金展开了大规模抢劫——遭俘虏的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Atahualpa)被威胁着给皮萨罗送去了满坑满谷的金制品，但还是遭到了处决。据记载，这笔“赎金”花了九台炉子四个月才融铸完成，经过清点足有1.3万磅(6.71吨)黄金和2.6万磅(13吨)白银。考虑到16世纪一份黄金大约能换十倍重量的白银，西班牙人在这一笔款子里就获得了大约80吨等价白银——超过当时全欧洲贵金属总量的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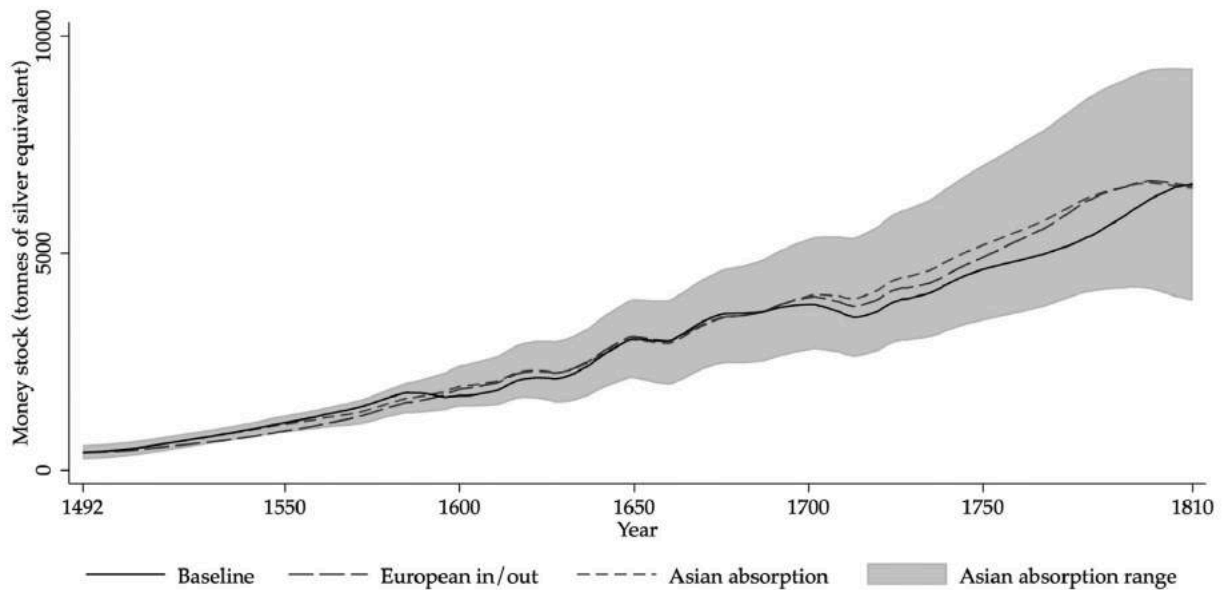


Fig. B.1. Money stock measures (11-year moving averages).

就这样，在1540年前原住民手里的黄金已经或买或抢得差不多了，殖民者们也把目光转向了长期的矿山开采。在1535年和1545年之间，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了八座大型金银矿，其中五座位于墨西哥：塔斯科(Taxco)、萨卡特卡斯(Zacatecas)、瓜纳华托(Guanajuato)、帕楚卡(Pachuca)和圣路易斯波托西(San Luis Potosi)；另外三座则位于秘鲁副王区的统治下：考卡(Cauca)山谷、卡斯特罗维雷纳(Castrovirreyna)和波托西(Potosi)。截止1650年，这两个辖区总共为本土供应了约181吨黄金和16000吨白银。这些贵金属里大约一半辗转到了亚洲——为的是从中国和东南亚购买走俏的瓷器、丝绸和香料，一部分流通到了其他欧洲国家，还有一部分在海运过程中遭到了损耗（光在1502年到1605年之间就有717吨等价白银随海难葬身大西洋底），但余下的部分仍然将西班牙国内的货币总量翻了四五番。在整个16世纪，西班牙都是欧洲最富裕强盛的国家；委内瑞拉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也是西班牙皇家学院的首位拉丁美洲裔会员——拉斐尔·巴拉特(Rafael María Baralt)在提起那个年代时不免也有些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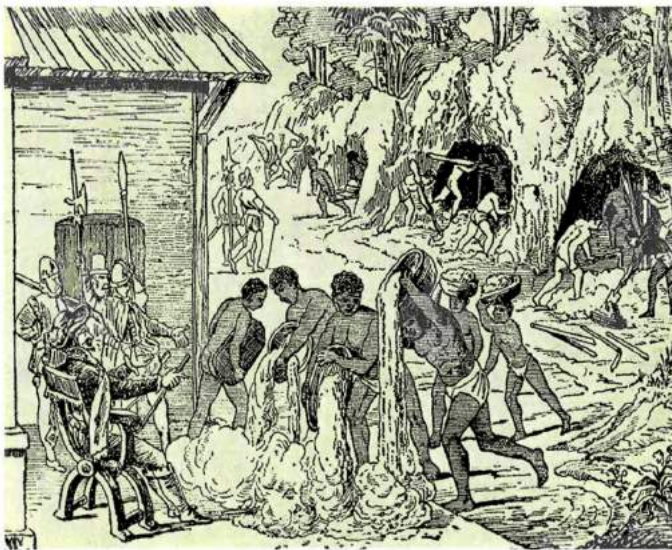
塞维利亚(Seville)，对美洲贸易的中心，有着不少于一万六千家手工作坊和十三万羊毛和丝绸业的纺织工人；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千多艘商船航行在已知世界的每一片海域，比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舰队都更庞大；而梅迪纳德尔坎波(Medina del Campo)、布尔戈斯(Burgos)和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的知名市集则吸引了各个国家追寻财富和珍宝的商人。

和人一样，钱来得太快也会让一个国家有些忘形。矿业的巨额利润将殖民地的其他产业推到了一边，导致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从未发展出一个可持续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在新西班牙和秘鲁，矿业和农业都被囊括在一个名为“监护征赋(encomienda)”的经济制度下。在该体系内，大约四分之一的西班牙殖民者被副王们赋予了对一部分原住民人口的“监护权”。这些“监护者(encomendero)”被允许向其治下的人口要求进贡并征徭役，但并不拥有这些原住民居住的土地；如果他们希望获

得土地所有权的，还要专门向西班牙王室申请封土(mercedes)。因此，许多监护者并没有动力去耕种或改进土地，而是选择将劳动力投入到利润立竿见影的矿业中去。西班牙的重商历史也起了作用——在本土赚了大钱的贵族和绅士们几乎都是经商或从军的，而农业无可避免地被和下层阶级联系在一起。在1504年，当一位政府官员询问埃尔南·科尔特斯是否想要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大片土地时，这名没什么钱的小贵族也以典型的西班牙风格回信拒绝道：

我是来寻黄金的，不是像个农民一样种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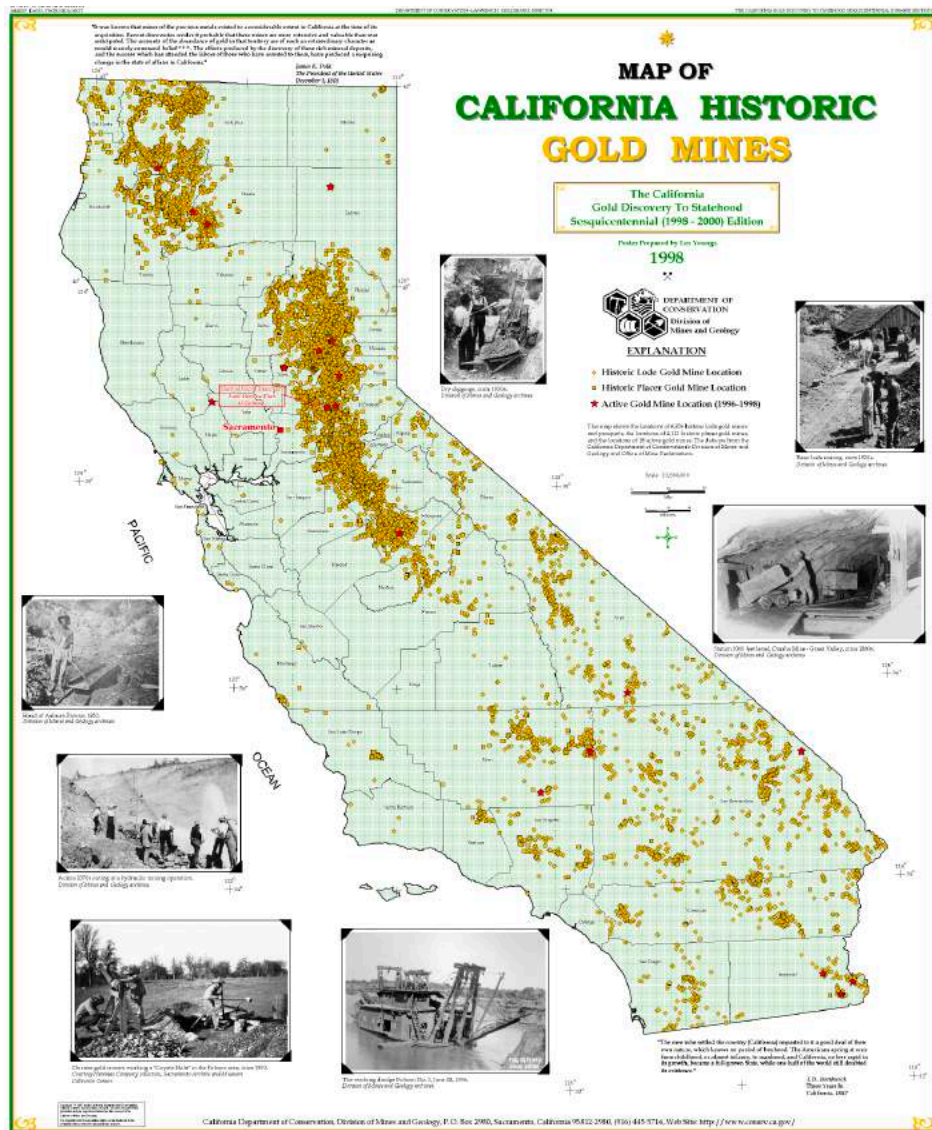
不过，随着原住民逐渐沦为西班牙人的“全职”奴工，以及当地驻军和殖民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基础农业终于还是在16世纪下半叶形成了一定规模。可是，由于王室和副王垄断了土地分封，西属美洲的耕地几乎完全掌握在一小批有关系的“庄园主(haciendas)”手中，没有多少小地主或自耕农的容身之地。再者，这些农场主大多仍采用欧洲的耕种方式，导致美洲气候下的农业产量异常低下。最后，落后的交通网络和副王们随心所欲的政策也对跨地区农产交易很不友好。总的说来，西班牙殖民地的农业不仅是寡头制的，也是发展极缓慢、对本土全无补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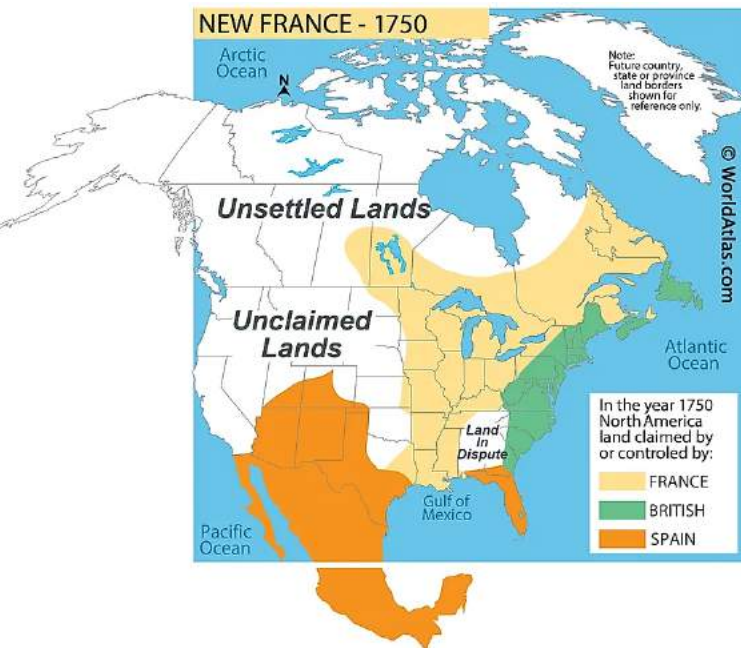
El Secreto de la mina de Potosí. Se descubre á Villareal, y la cantidad de plata, que se sacava en los primeros tiempos

因此，殖民地对西班牙王室的利益主要有二：矿产的开采和输送，以及真金白银带来的商业活动。正因如此，对于一切没有矿产或商业潜力的地方，其殖民欲望是不大的。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和民间的殖民活动可以互为补充：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就是很好的例子；可是西班牙政府对殖民地的控制极其严密，一心防着可能的财富外泄。比方说，每个副王区内仅能开放一处港口作为矿物集散中心，而且只能由西班牙商人控制的西班牙船只运往指定的西班牙港口。这一短视的政策看上去加强了王室对金银的监控——也让收税方便了不少，但实际上只导致了愈发猖獗的走私活动。一条更为僵化的规定更禁止了殖民地间的直接贸易，一切出口只能去往本土，进口也只能来自本土。这个被经济学家诟病至今的政策一直延续到1774年，虽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在经济领域的权力，却毁灭性地打击了商人寻找商机、开拓商路的积极性。正因如此，西班牙人对美洲的绝大多数探险都是由政府直接组织的，其目的也纯粹是为了给王室寻找更多进账机会。

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加利福尼亚海岸实在不像是有钱可赚的地方。虽然加州的地下埋藏着不少珍贵矿藏，其中绝大多数都位于内陆的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若不深入探索绝无可能发现。而且加州的原住民并不像阿兹特克或印加人那样有对外展示黄金制品的习惯——一来他们不具备金属冶炼的技术，因此获得黄金的唯一渠道来自河沙里偶尔携带的小金块；二来其社会组织比较简单，对黄金的地位象征不了解也不重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是：殖民者的黄金对于原住民，就好比原住民的贝壳对于殖民者一样无用。当地分散零落的原住民聚落支撑不了大规模贸易，也不能被有效纳入劳动密度较高的“监护征赋”制度。最后，旧金山湾以南的加州海岸缺乏适合殖民时代海船停泊的良港，反而有着由北向南的洋流，极大阻碍了从墨西哥出发的北向航行。因此，虽然西班牙人在1530和1540年代派了几支船队沿加州海岸北上，其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寻找传说中的西北航道——一条直接从北大西洋联通亚洲海岸的水路。当人们意识到这条商业捷径并不存在后，对加州的探索就陷入了两个世纪的沉寂。直到1769年，西班牙人在北美西海岸上最北边的永久殖民点仍然只位于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Baja California)半岛。



不过，在这两百年间，美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班牙仍然控制着南美洲除了巴西和圭亚那(Guana)之外的绝大多数土地，以及墨西哥和大部分加勒比岛屿。除此之外，西班牙探险家阿维利斯(Pedro Menéndez de Avilés)在1565年将佛罗里达纳入了帝国的版图。与此同时，为了消除西班牙对美洲领土的垄断，英国和法国也启动了各自的殖民计划：前者在1607年于弗吉尼亚建立了詹姆斯敦(Jamestown)要塞；后者则在次年建立了加拿大的魁北克(Quebéc)城。到了18世纪中期，西班牙发现自己已不可能忽视它们带来的地缘挑战了。



2-2 加州传教所体系的建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班牙在加州的殖民活动就是对这些挑战的回应。尽管它仍然控制着最广袤的领土，这些土地的经济潜力却开始逐渐落后于其竞争者。1750年时，英属美洲（不计从法国手中夺取的纽芬兰和新斯科舍两座大岛）的面积约为43万平方英里，其人口约在120万左右；因此其治下的人口密度差不多在每平方英里3人上下。同年，西属美洲的总面积超过了520万平方英里，但这一高出前者12倍的领土却只支撑了8倍多的居民——约950万人；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减去在英属美洲本就不多的原住民，整个西属美洲的欧裔和混血人口——维持殖民地政治、社会和经济向心力的主体——应当不会超过700万（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是500万），即每平方英里1人出头。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和英属美洲相比，西属美洲的人口分布是极不平均的，因此实际上的影响力投射范围非常有限。加利福尼亚就是其中一处未被触及之地。

而到了18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在全世界的力量投射体系在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 1756-1763)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十年里，西班牙和英国已经在美洲扳过了几次手腕，争夺的焦点便是西属佛罗里达：1702年，英属卡罗来纳(Carolinas)的殖民者在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e)上校的指挥下南下攻入佛罗里达，烧毁了西班牙在该处的最大城镇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但没能打下城里的要塞；1704年英国人又一度冲进北佛罗里达烧杀抢掠。法国人也来凑热闹，在1719年占领了佛罗里达西北海岸上的彭萨科拉(Pensacola)。1739年，英西两国间的积怨终于在所谓“詹金斯的耳朵战争(War of Jenkins' Ear)”中彻底爆发——尽管表面上的起因是一名据称违反西班牙贸易规章的英国船长被西班牙人登船割了耳朵。已经重建的圣奥古斯丁仍然是必争之地，但这次英国人没能打下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任何一座主要据点，最终于1748年停战。

佛罗里达的重要性既是地理战略上的，也是象征意义上的。一方面，它隔佛罗里达海峡(Straits of Florida)与古巴相望，控制着联结墨西哥和西班牙本土的重要航道，也是满载白银船队的必经之

路。另一方面，佛罗里达在北部直接和乔治亚(Georgia)殖民地接壤，有效阻止了英国在墨西哥湾海岸上建立据点。西班牙人也利用这一陆上边界体现了自己的政治优越性——自1687年10月第一批黑奴从乔治亚和卡罗来那逃往圣奥古斯丁以来，西班牙官员总是自动授予逃奴自由民身份，为其寻找工作，哪怕在英国方面派员前来交涉时也坚持不遣返他们。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s II)在1693年11月7日的皇家谕令(cédula)里明确指出了这一政策的目的；他表示，殖民地官员应当

授予逃奴，不论男女，以自由，从而树立起激励其他人效仿的榜样。

在英国人眼中这也许算是无解的阳谋。其美洲殖民地的种植园经济严重依赖黑奴劳力，因此不可能放松人身管理制度以防止外逃；与此同时，在卡罗来纳与乔治亚等地黑奴人口显著多于统治他们的白人，因此奴隶起义时有发生，更让英国殖民者日益怀疑这些暴动背后有佛罗里达西班牙人的支持。对于西班牙而言这一政策则有百利而无一害：逃亡的黑奴不仅补充了佛罗里达本就不充裕的劳动力、带来了潜在的天主教信徒、削弱了英国殖民地的士气和经济潜力，还为西班牙提供了一支忠心耿耿、勇猛善战的军队。在1728年、1740年和之后的几次英军袭击中都出现了黑人士兵协防佛罗里达的事迹，而佛罗里达当局也一度设想以黑人部队北上进攻英属美洲的计划，给英国人带来了极大困扰。更糟糕的是，自1700年费利佩五世(Felipe V)继承西班牙王位以后，西班牙和法国王室同属波旁家族，在外交和军务上也颇为配合，更威胁着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利益。

于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美洲问题，英国在1754年派遣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当时还是英属弗吉尼亚(Virginia)殖民地一个兢兢业业的中校军官——带着大约150名民兵进入了有争议的俄亥俄河谷(Ohio Valley)地带，草草搭了座被命名为“必需堡(Fort Necessity)”的要塞后就被闻讯赶来的法军击败，退了回去。俄亥俄河谷之于法国，其重要性不下佛罗里达之于西班牙：该河流域大致和南北向的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 Mountains)平行，将英国控制的北美东海岸和法国控制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分割开来，阻挡了英属殖民地向西扩张，也拦阻了它们介入北美西部利润丰厚的毛皮贸易——法国和西班牙的贸易公司可以在对方的控制区内设立交易点，但一致将英国人排除在外。1720年，南卡罗来纳的总督约翰逊(Robert Johnson)在给伦敦的信中就抱怨道：

毫无疑问，法国人在[密西西比河流域]有着很强的力量。各种消息都显示他们至少有着五六千名兵士，还有更多军人源源不断从法国本土赶来…法国人在当地定居不能不在[英属]美洲大陆上造成紧张和担忧，尤其是离他们最近的南卡罗来纳…一旦战事爆发，该地必首当其冲落入其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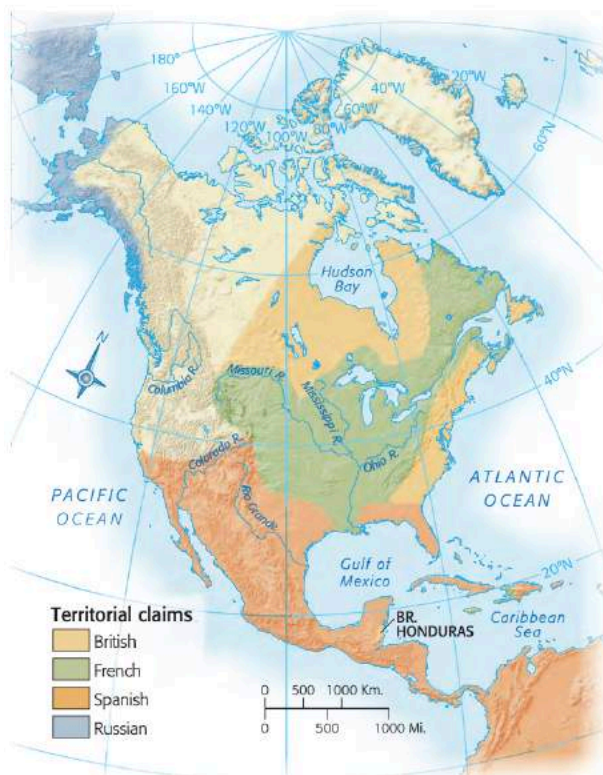
这样的情绪在接下来几十年里不断加深着。1750年时一位马萨诸塞殖民地的英国牧师颇具偏见地在了一本小册子里提出“我们英国人最多不过是以战争保卫自家，而法国人的战争则是为了进攻”。在战争前夕的1754年，另一位波士顿牧师更是不祥地表示：

这片大陆之宽不足同时容纳英法。

既然如此，北美大陆自然也不可能同时容纳英国和西班牙了，毕竟早在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军官查尔斯·卢卡斯爵士(Sir Charles Lucas)就如此比较法国和西班牙对英国的威胁：

尽管法国在实质上更强大危险，西班牙却带来了更持久频繁的骚扰与冲突。

因此，在七年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的时候，眼见战事胶着，西班牙终于站在法国一方加入了战局。英国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对西班牙在地球两端的殖民地展开了突袭，在1762年下旬接连攻占西属西印度的首府哈瓦那(Havana)和西属东印度的首府马尼拉(Manila)。随着法西联军在欧洲大陆也一再失利，三国于1763年2月签订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顺带一提，这是史上第十三个叫这个名字的和约——而其中条款对英国极为有利：元气大伤的法国把密西西比河以东以及加拿大境内的全部领土转让给了英国；西班牙也被迫交出佛罗里达和地中海上气候宜人的梅诺卡岛(Menorca)以换回哈瓦那和马尼拉。法国意识到自身已经无力维持庞大的美洲帝国，同时为了补偿盟友的损失，便通过一纸秘密协定将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大土地赠给了西班牙，仅保留名义上的主权。从地图上瞧这笔交易不算糟糕——这块地比佛罗里达大得多，还包括人口五六千人的商港新奥尔良(New Orleans)——但实际上很不划算。新奥尔良坐落于密西西比河口，其繁荣很大程度上来自上游的商品运输——法国人曾经控制着直抵加拿大的整个流域，但如今强势的英国人垄断了加拿大和俄亥俄河的一切经济活动，下游的新奥尔良自然也丧失了很大一部分重要性。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四十年内其人口几乎没有怎么增长，在1803年被美国人购下时也只堪堪达到了7000人。与之相对，英国人不仅移除了一个近在咫尺的威胁，获得了面对墨西哥湾的漫长海岸线，而且迅速规划起了开发佛罗里达的计划。一个有意思的比较是：法裔居民似乎并不反对英国人统治——光在莫比尔(Mobile)一处就有112人宣誓效忠英国；但在西班牙接收新奥尔良的秘密协定曝光后，他们不仅不太愿意迁居，反而还有若干次推翻西班牙人统治的尝试。



Map 6.7 North America Before 1754



North America After 1763 (after French los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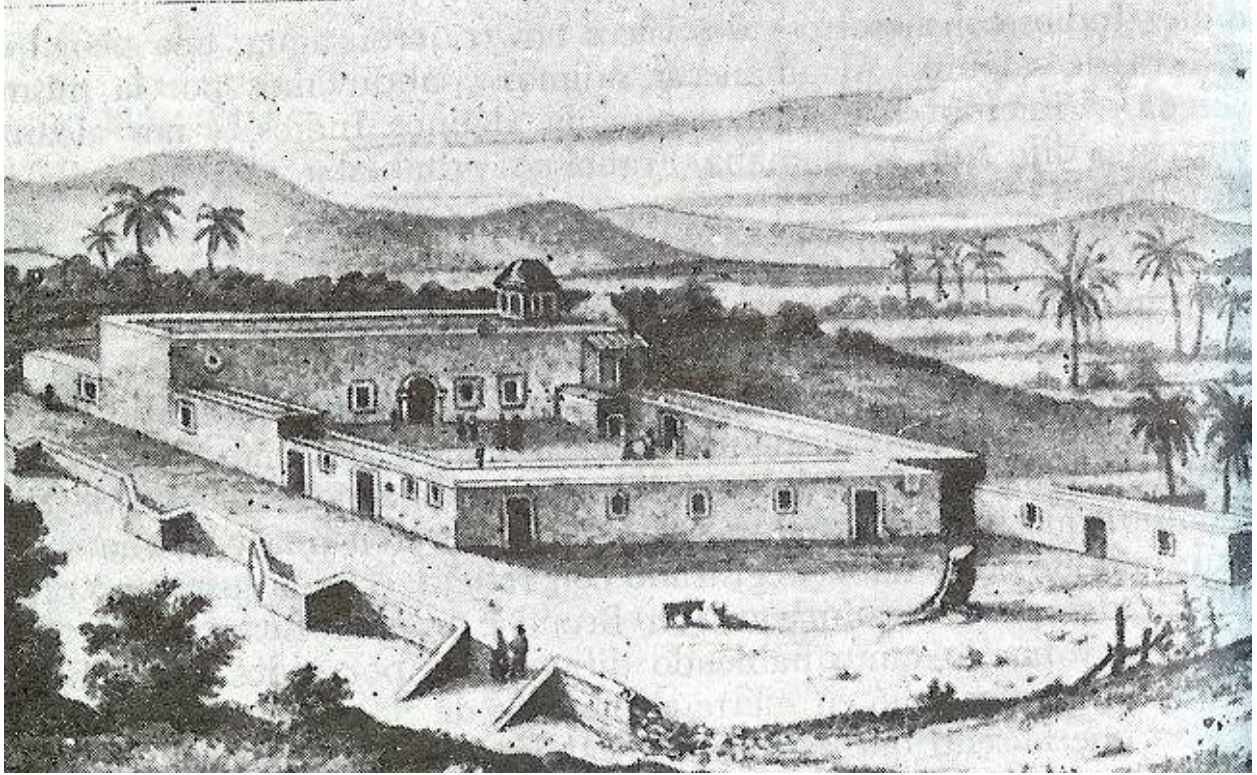
总之，战后的西班牙人正确地意识到，如果他们不能进一步发展墨西哥以北的闲置领土，终会在和英国人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而在这些领土中，加利福尼亚又是最具潜力的——虽然前面我说加州既没有（为人所知的）重要矿产，也缺乏庞大的本土劳动人口，但比起内陆难以涉足的荒漠和远方的草原，它至少有着肥沃的海岸平原，而且也许可以作为美洲殖民地连接西属菲律宾和太平洋地区的商港。更何况，随着英国人向加拿大西海岸推进和俄国人殖民阿拉斯加，北美西海岸哪怕没有经济价值，从国防角度来看也是亟待控制的。于是，在1769年1月9日，西班牙驻美洲殖民地的最高监察官何塞·加尔韦兹(José de Gálvez)派出了由加斯珀·德·波托拉(Gaspur de Portolá)率领的探险队首次对加利福尼亚内陆进行了陆路考察，从墨西哥境内出发骑着骡子一路到了湾区——在那年11月1日，欧洲人第一次见到了旧金山湾的全貌。



在波托拉一行出发前，我们不难想象在新西班牙的殖民首府必然有过热烈的讨论：西班牙很难从本土移民去充实加利福尼亚，而且商业的发展也不会一蹴而就；所以，短期说来，加州的新土地该怎么组织管理才最有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暂时不去关注波托拉的目的地，而将视线转移到他的出发地——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Baja California)”半岛，地图上看来像是伸出加州下方长长的裙摆。这个名字本身也有一段有趣的历史：一般说来，地名总带有一些实际意义，不论是描述性的“马萨诸塞（在原住民语言里意为‘靠近山脉’）”、纪念重要人物的“华盛顿州”，或者带有美好寓意的“费城（其名取自代表‘亲爱’和‘兄弟’的两个希腊语词根）”，但“加利福尼亚”的名字则是捏造的——在1510年出版的骑士小说《埃斯帕拉丁历险记(Las sergas de Esplandián)》中，其作者也许是希望蹭蹭地理大发现的热点，借其中一个角色之口说道：

请让我告诉你吧，在印度群岛的右手边有座叫加利福尼亚的岛屿，其所处在地上天堂的近旁，其地为黑种女人居住，其中不见一个男人，因她们都过着亚马孙女战士(Amazons)的生活，身强体壮、悍勇无匹。该岛地形实属世上最险，为峭壁和礁石围绕。岛民利用黄金做的武器，驾驭驯化了的猛兽，因为全岛不产除了黄金之外的矿石…

这显然是胡说八道。那时候欧洲人连太平洋的存在都不知道，更遑论“印度群岛右手边”的地理了；事实上，就连“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这个挺顺口的名字似乎也不是作者的原创，而是对11世纪史诗《罗兰之歌(Song of Roland)》里出现的“卡利福内(Califerne)”一词的转写，而“卡利福内”又被认为是“哈里发(Caliph)”的变体。尽管如此，西班牙人很快爱上了埃斯帕拉丁的故事，又在发现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时候自动给它套上了这个名字，以为真正的加利福尼亚岛还在更远的地方。到头来，这座岛屿的存在不攻自破，但“下加利福尼亚”和“上加利福尼亚(Alta California)”——也就是加州本体与后来的美国西南部分——却作为地理和政治的名词一直保留了下来。



说了那么多，还是让我们回到半岛本身。在这片干燥荒芜的土地上，西班牙人建立了一套以传教所(mission)为主，要塞(presidio)与集镇(pueblo)为辅的殖民体系，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半岛上的原住民和加州的同胞一样分成规模较小、语言文化各不相同的无数小型聚落，因此一个个传教所不仅可以“将‘异教’土著教化成信仰天主的‘正教’教徒”，也起到了将分散各处的部落和族群集中到某几个地点的作用。为了让这些习惯定期迁徙的人们能在周边安定下来，传教所的教士同样向当地人传授农业知识，把信教的原住民组织成了农垦团。西班牙人管这个叫“缩减加集中(reducción y congregación)”政策，的确是颇巧妙的——一方面当时的西班牙最不缺信仰坚定的教士；另一方面，这一政策有效克服了北美原住民人口密度低、经济活动缺乏效率的问题。很快这些传教所就成为了自给自足的大农场，保障了西班牙对殖民地边境区域的控制。一篇论文清楚地指出：

西班牙王室很乐意资助传教士的活动，因为…传教所一方面控制了潜在的敌对原住民群体，另一方面也把他们驯化成了从事生产的、付税的西班牙社会一员。

最早一批进入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传教士来自著名的耶稣会(Jesuits)。该修会成立于1540年，其创始人伊纳爵·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是来自西班牙东北部巴斯克(Basque)地方的小贵族兼牧师。其成员必须遵循“守贞、甘贫、服从”的誓言，视传教为己任，因此是各大天主教修会中最积极参与殖民活动与海外探险的——在中国颇有名望的利玛窦、汤若望和郎世宁都是其成员。在1697年到1768年间的所谓“耶稣会和平期(Pax Jesuítica)”，他们在半岛上建立了21座传教所和巡回教堂(visitas)——也就是没有神父永久驻扎的圣所——但终于和当地的西裔土地贵族(hidalgos)发生了冲突。这些贵族家庭同样需要耕地与本土劳力以维持体面生计，便指控耶稣会士积攒私财、窃取劳工、在地方上无法无天云云。这些地方性事件，加上耶稣会在西班牙全境积极扩张影响力的举

动，终于导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Carlos III)在1767年2月下诏驱逐国内全部耶稣会传教士，以避免教廷通过修会对他本人的权力造成威胁。

那时，前文提到的何塞·加尔韦兹已经在新西班牙当了三年的最高监察官。他来自一个所谓“最古老、血统最纯正的西班牙家族”，其谱系据称上溯至公元834年的克拉维霍战役(Battle of Clavijo)——在西班牙传说里，耶稣门徒之一的雅各伯(James the Great)在战场上显圣，率领阿斯图里亚(Asturias)王国的基督教军队击败了强大的穆斯林科尔多瓦(Córdoba)酋长。在1492年，何塞的七世祖安东(Antón de Gálvez)又率军击败了格拉纳达(Granada)酋长国，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的穆斯林国家，统一了之后将成为西班牙的土地，为家族挣来了“老基督徒(Old Christians)”的荣衔。到了何塞这一代，加尔韦兹家族虽然受人敬重但已经没什么钱了；于是，他从小一边放羊一边在村庄小学里读书，终于被主教相中进了神学院，之后又在马德里学习法律，因其卓越的论辩水平和大胆的性格平步青云。一则流传颇广的故事告诉我们，当卡洛斯三世质问他为何敢在一起官司中代表外国商会与西班牙政府对抗时，何塞答道：“陛下，法律高于王权”，以此得到了国王的青睐，先被任命为马德里市法官，又在三个月后继任位高权重的新西班牙最高监察官。



所谓“最高监察官(*visitador del virreinato*)”，实际上就是国王在殖民地的全权巡回代表，从职级和权力上都比总督和副王高出一等。加尔韦兹的主要任务是改革殖民地财政，也在税务、矿政和烟草专卖等领域做了些事，但没有一项比驱逐耶稣会士更困难——事实上，为了防止国王的谕令败露，整个新西班牙只有三个人知道这件事：加尔韦兹、时任新西班牙副王克罗(Carlos Francisco de Croix)和克罗的侄子特奥多罗(Teodoro de Croix)。这是因为耶稣会的影响深入殖民地各界：1750年的记录显示仅在墨西哥一地就有622名会士和23座会堂(*colegios*)；这些会堂一般位于墨西哥城这样的大型城镇，主要目的是提供和欧洲学校相仿的教育课程，包括拉丁语、修辞、神学、语法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这些会堂显然是专门面向殖民地地上层人士的，但耶稣会同样维持着许多面向普罗大众、低级官僚和驻军的神训院(*casa de ejercicios*)，传授伊纳爵·罗耀拉本人的训导。怪不得克罗在给他兄弟的信里说：

[新西班牙的]全体居民大约都是该组织忠实的学生和狂热的追随者…因此我们必须极小心地行事，在执行王令的时候不可相信任何人。

所以，加尔韦兹秘密向新西班牙的各个省份派出了自己的亲属作为地区代表，又特别指派亲信军官以组织地方民兵的名义控制了各地驻军。在1767年6月25日的早上，他们在同一时间打开了克



和加尔韦兹的密信，迅速组织逮捕了新西班牙境内的每一个耶稣会教士，将他们好吃好喝地押送到韦拉克鲁斯港，送上船开去了教皇国，成功避免了潜在的抵抗或暴乱。在下加利福尼亚，负责这一行动的正是加斯珀·波托拉，时任该省总督；驱逐耶稣会士后，他一度指派手下的军官接管各传教所，但他们的传教能力不好恭维。于是，加尔韦兹请来了相对独立的方济各会(Franciscans)继续管理殖民地的传教体系；因此，在1769年的加利福尼亚探险中，和波托拉同行的除了士兵和水手，还有胡尼佩罗·塞拉(Junípero Serra)领导的一批方济各会修士。和加尔韦兹不同，塞拉来自西班牙一个普通农家，在取得神学博士学位后作为传教士来到了墨西哥，且迅速崭露头角：他不仅自学了原住民所讲的奥托米语(Otomi)，首次为墨西哥中部的阔山(Sierra Gorda)地区带去了家养牛羊，据说还数次向西班牙地主争取原住民权益。总之，他在阔山传教所和墨西哥城方济各会学院(College of San Fernando)任上得到了波托拉等人的认可，因此在1767年被推荐担任了下加利福尼亚传教所系统的主管，又自告奋勇参与了两年后的探险。

有了加尔韦兹和塞拉神父这样的专家参与，上加利福尼亚地区的传教所建立颇为顺利。离墨西哥最近的圣迭戈·德·阿尔卡拉传教所(Mission San Diego de Alcalá)在探险途中成立于1769年7月16日，后来发展成了今天的大都市圣迭戈(San Diego)；1770年6月，探险队又在蒙特雷湾附近建立了卡梅尔传教所(Mission San Carlos Borromeo de Carmelo)——该所由于设施完善、地理位置良好等原因在1771年到1815年间一直是加州传教活动的总部。和它们同时建立的还有圣迭戈(El Presidio Real de San Diego)与蒙特雷(El Presidio Real de San Carlos de Monterey)两座驻军要塞，一南一北保障了西班牙殖民活动的进行。在塞拉神父于1784年去世前，加州已经拥有了9座传教所和4座要塞（另外两座分别位于旧金山和圣巴巴拉），颇具完整殖民体系的雏形。他的继任者拉苏恩(Fermin de Lasuén)神父则继续添砖加瓦，终于在1797年6月11日建立了圣何塞传教所(Mission San José)——它位于今天佛利蒙市东部米申丘陵(Mission Hills)的山脚下，是加州传教所里的第十四座。

2-3 圣何塞传教所的奠基和早期发展

当然，这么一座传教所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两年前的1795年，拉苏恩就从旧金山要塞派了一支队伍去东湾寻找潜在的传教所地点。领队的中尉军官萨尔(Hermenegildo Sal)与丹提(Antonio Danti)神父一眼就相中了后来的佛利蒙：两条小溪在山脚下交汇，带来了适合耕种的土壤和延伸至海湾的平原；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眼热泉，是附近原住民常来疗养的地方。再者，西班牙人和东湾山谷里的米瓦克人关系并不好，因此佛利蒙的传教所一方面可以受到丘陵的保护，一方面也可以被视作殖民者在东湾的前哨基地。在丹提笔下，佛利蒙唯一的问题在于木材的缺乏——最近的大森林在北边40公里一个被西班牙人称作“恩希纳(Encinar)”的地方。这个词翻译过来意思就是“橡树林”，后来被美国人忠实地转译成了英文，也就是今天的奥克兰(Oakland)。



当然，这么个好地方自然不会一个人都没有。奥隆尼人管佛利蒙的所在地叫“欧罗伊森(Oroysom)”，是他们在东湾的几座村庄之一；这座村庄的具体位置目前还不太确定，但应当是在传教所周围不远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邻近的磨坊溪(Mill Creek)边发掘出过相关的考古材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拉苏恩神父一向喜欢把传教所放得离原住民聚落中心特别近，所以圣何塞传教所应当也不例外。出乎意料的是，这批奥隆尼人和西班牙人之间似乎并无多少冲突：最早踏足佛利蒙的欧洲人、后来在波托拉手下当了副总督的佩德罗·法戈斯(Pedro Fages)就对本地原住民印象颇佳。在他的书中，法戈斯说自己在1770年的探险中来到了佛利蒙平原，遇上了一群

友善、好脾气的印第安人；我们向他们赠送了几串珠子，他们则以羽毛和塞满草叶的肥鹅回礼……

不过，西班牙人和奥隆尼人间的良好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也决非不疏不漏的，而这也体现了美洲殖民过程中一个少有人关注的方面——不同原住民族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殖民者的政策和行为；换言之，殖民活动并非“强大”欧洲对“弱小”土著的单方面控制，而是一个动态的、双向的、有来有回的过程；而这样的复杂性在西班牙殖民力量薄弱的加州有着尤其充分的体现。在圣何塞传教所的建设被提上日程之前，湾区已有了三座传教所（旧金山、斯塔克拉拉和斯塔克鲁兹）、一座军事要塞（旧金山）和一个殖民聚落（圣何塞——这里也许该多说一句：“圣何塞”的名头来自基督教传统中的圣人约瑟 Saint Joseph，且在湾区有两处叫这个名字的地方：一个是东湾佛利蒙的圣何塞传教所，另一个是南湾的圣何塞镇，也就是现在的同名大都市），已经和原住民打了快三十年交道，积累起了无数或友好、或敌对的关系。

这些关系大多集中在1776年6月建立的旧金山多洛雷斯传教所(Mission Dolores)。该传教所坐落在旧金山半岛上耶拉姆(Yelamu)部落的核心区域；耶拉姆部落是奥隆尼人的一个分支，实力弱小，因此对西班牙人很是有礼。初来乍到的西班牙人也希望以此打开传教局面，所以在最初两个月里双方频繁交换礼物、互相串门，颇为和平。但在8月12日的清晨，西班牙人第一次受到了本土政治的侵扰——同为奥隆尼人分支的扫森部落(Ssalsons)袭击了耶拉姆部，烧毁了多座村庄，导致大部分耶拉姆人“害怕地爬上芦苇筏子”，划去东湾投奔和他们通婚的胡奇恩部落了。在之后的几个月里，耶拉姆难民们陆陆续续地回到半岛，但这一遭遇似乎摧毁了他们曾经的生活方式——西班牙传教士提到说耶拉姆人开始偶有偷窃行为，时而挑衅西班牙岗哨，甚至“意图强吻一名士兵的妻子”，终于导致了双方的第一次暴力冲突。必须承认的是，西班牙殖民者当时仍保持了一定的克制：除一名耶拉姆人在混乱中遭枪击身亡外，剩下的原住民并未遭到追究，而领头的两人也只是被一顿鞭打了事。

在那之后，西班牙人决定更积极地参与到土著政治中去，而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解决耶拉姆和扫森两个部落间的敌意。耶拉姆部落的年轻人是最早皈依天主教的——可能是因为依赖西班牙人的武装和经济实力，也可能是出于纯粹的好奇；截止1777年年底，多洛雷斯传教所成功给32名奥隆尼人施了洗礼。这些新入教者被称作“生徒(neophyte)”，一个在希腊语里意为“新植之树”的形象比喻。在1780年，传教士们更不无自豪地表示“大部分年纪在二十岁以下的耶拉姆人都已经加入了传教所社区”，起了新的西班牙语名字，并且在信仰和生活上服从欧洲人的指示。接下来，他们沿着半岛逐渐南下，沿途将一个又一个村庄纳入天主教领地，再将村民们迁至传教所定居，而这些村民中也包括不少扫森人。在西班牙人的组织下，这两个部落的成员共同居住、劳动，终于在1781年底产生了第一对跨部落夫妇。在12月19日，传教士主持了耶拉姆少女玛丽亚·弗朗希斯卡(María Francisca)和扫森男子马里亚诺(Mariano)的婚礼；一星期后，马里亚诺的同族姐妹玛丽亚·瑞梅迪斯(María de los Remedios)又嫁给了一个叫杰科姆(Jacome de la Marca)的耶拉姆头人。兴奋的牧师们在发回墨西哥城的总结里汇报说：

[在这之后]两族间持续不断的战事止息了，他们看上去也都对此很满意。

不幸的是，西班牙传教所毕竟还是殖民工具的一种，因此不可避免带有强制性的管理模式。大部分原住民劳工都不能随便离开传教所区，一般也不被允许开展传统的舞蹈等集体活动。因此，尽

管大多数小型部落宁可寄人篱下，在1791年冬传教所还是爆发了反叛——一名叫查昆(Charquin)的新生徒显然不适应西班牙管治下严格的生活，在接受洗礼后没几天就逃去了南湾的山里，还召集了一群类似的前生徒拒绝返回传教所，甚至导致西班牙人撤回了一处离南湾太近的前哨教堂。一场更大规模的抗争发生在1795年——那时多洛雷斯传教所的原住民人口已经达到了917人，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东湾。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驱使着东湾各村奥隆尼人成规模地渡过海湾来投奔西班牙人，但很有可能也是某起部落间争战的缘故。总之，这暴增的人口不仅促成了传教士们在东湾新建圣何塞传教所以分担压力，也给多洛雷斯传教所的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在农业劳动和拥挤居所的双重作用下，传教所居民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更在当年三月爆发了瘟疫。可能正因如此，当一批来自萨克兰(Saclan)部落的米瓦克人生徒被允许“暂时”回乡探亲时，他们一去不返。



有趣的是，传教所派去交涉的武装队伍由14名原住民组成，而无西班牙军士同行。不论这些原住民是随传教士一同来到加州的墨西哥土著还是新归化的奥隆尼人，他们显然代表了忠于欧洲人的一方。一番搜索后他们在北湾的纳帕(Napa)——如今著名的葡萄酒产地——发现了这批“逃犯”，但寡不敌众，损失七人后狼狈地回到了传教所。也许是这场失败让西班牙人在原住民心里的强势形象不再稳固，因为在那个夏天多洛雷斯的东湾原住民几乎跑了个干净；而西班牙驻军自认人手不够，在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里都毫无建树，导致湾区的传教活动几乎陷于停滞。

就在这样有些前途未卜的大气候下，加州传教体系的总负责人——前文提及的拉苏恩神父——带着一队西班牙卫兵和武装原住民在1797年6月9日离开了旧金山要塞，经由南湾的圣塔克拉拉传教所（毕竟当时还不存在跨湾大桥）抵达了东湾的欧罗伊森，建立了一个临时营地。第二天他们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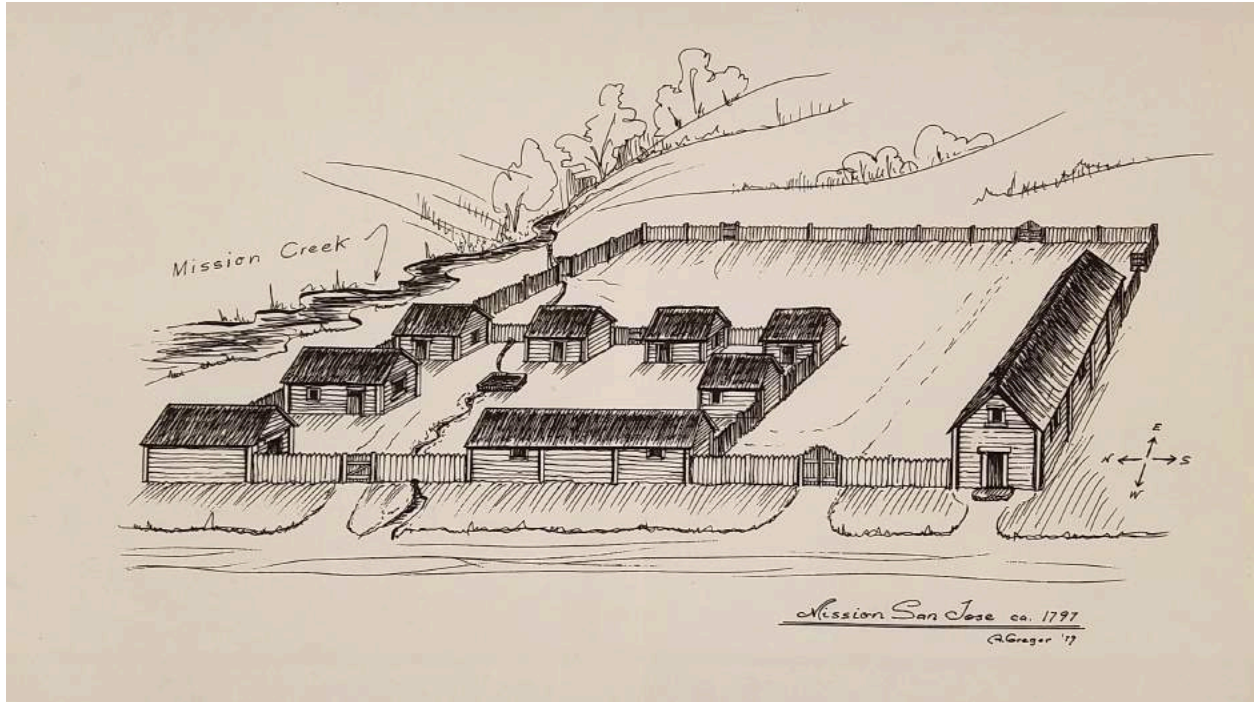
附近的山谷里猎到了一头灰熊，又为营地增添了许多宗教设施，包括一个带顶棚的木头祭坛和许多新鲜采集的花环。又过了一晚便到了6月11日星期天，也是圣何塞传教所奠基的日子。佛利蒙本地史的权威专家菲利普·霍姆斯(Philip Holmes)在书中这么描述了那一天的场景：

在清晨时分神父、西班牙士兵和原住民信徒便聚在了露天祭亭处。那是一个忙碌的早上，营地不断传来铃铛的脆响和试发的火枪声，而摇曳的弥撒蜡烛、牧师缤纷的祭衣和其他新奇玩意也引来了不少本地印第安人。就连那些早已熟悉西班牙骏马、武器和服装的原住民也不免惊奇于奠基仪式的庄严。

…于是，随着原住民信徒们挤在一旁，西班牙士兵们换上了他们最隆重的军装在不远处列队站好，肃穆地等待仪式开始…拉苏恩神父上台将该处教堂奉献给了上帝，士兵们则上前竖起巨大的木制十字架，又将一面旗帜升至树梢以宣誓西班牙主权。随后，他们向旗帜敬礼，再由六名军士按传统鸣枪六响。接下来，拉苏恩神父带领大家做了弥撒…又作了番激情澎湃的演讲。最后，来自下加利福尼亚、且受过拉丁语训练的印第安人唱诗班合唱圣歌，结束了奠基仪式。



拉苏恩神父明显是个大忙人：他在当天下午便带着卫队回到了圣塔克拉拉，又从那里开始了对加州其他传教所的巡查。不过，他在离开前指派了另外两名方济各会修士——伊西多洛·巴塞尼拉(Isidoro Barcenilla)和奥古斯丁·梅里诺(Augustin Merino)神父——负责管理圣何塞，又命令湾区的另外几座传教所各自派一批有建筑或种地经验的生徒去东湾给他们打打下手。巴塞尼拉和梅里诺接到指令，在6月28日抵达了传教所的临时营地，指挥原住民工人在三周时间里搭起了若干木头住屋、一座茅草顶的木教堂和由一圈木栅栏保护的围场。但是，两年前逃离多洛雷斯传教所的原住民仍然是西班牙人的心头大患：他们集中在新传教所以北几十公里的地方，时刻威胁着圣何塞的牧师和当地部落，而且还在六月底击败了西班牙人派去的又一支原住民部队——这次带队的是来自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雷蒙多·莫兰特(Raymundo Morante)，应当是熟悉西班牙战术，也深得殖民者信任的。于是，那年七月西班牙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击败了盘踞在旧金山湾东北方向的萨克兰-米瓦克人和胡奇恩-奥隆尼人“逃犯”，把他们带回了多洛雷斯传教所。到了1800年，东湾的原住民抵抗势力几乎已经不复存在，而圣何塞传教所的受洗人数也达到了129人。



诸如此类的军事活动、人员流动和物资运输给东湾带来了前所未见的交通需求。我们在之前提到过奥隆尼人本身的跨地区贸易，但这些本土商人所走的小道(trail)显然不适合马队或车队通行。于是，西班牙人很快开始着手建设所谓的“王家驿道(El Camino Real)”以连接各传教所、驻军要塞和其他重要设施。和传教所一样，王家驿道最早也在墨西哥得到了推行——下加利福尼亚最早的路段建设于1697年，很快成为了半岛居民不可或缺的交通要道。“玉米、干豆、骡马、黄油、肉食、皮带、鞋袜、帽子、梳子、蔗糖、巧克力、宗教画和祭坛”，还有其他各种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墨西哥更发达的地方涌来，支持了西班牙持续的向北扩张。2015年，一队考古学家甚至在半岛中部的卡拉马爵传教所(Mission Calamajué)旧址上发掘出了来自同时期中国的青花瓷器，应当就是通过王家驿道从邻近港口运送而来的。类似的驿道也出现在了西班牙控制下的新墨西哥和德克萨斯，深刻影响了美国西南各州的早期历史。

在上加利福尼亚，该驿道的路线基本遵循了波托拉远征的脚步，且在1770年后开始了正式建设，先连接起了圣迭戈和蒙特雷。截至1820年代，驿道的最远处终于延伸到了旧金山湾以北的索诺玛(Sonoma)，还有多条支线连接不在干道上的小村落或巡回教堂。这条道路直到19世纪末期仍是加州最主要的交通要道，并且成为了如今多条现代高速公路的雏形；我们之后还会再提到它。不过，这一“王家驿道”的具体功能和设计仍然颇具争议；如果你随便在网上做些搜索，几乎必然会看到类似的说法：

[驿道沿线]传教所之间的距离大概都在30英里左右，差不多是骑马一天的脚程。

听上去很合逻辑，不是吗？可谓是西班牙人早期殖民设想的典范：军人和神父们可以一早出发，又在晚上抵达下一处传教所睡在有屋顶和床铺的地方；一些研究者更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此设计的原因是为了方便出差的修士们在正牌教堂内作晨祷(matin)和晚祷(vesper)。如此合理的设想自从

提出以来就颇受支持，甚至没人想到去查查传教所之间的真正距离到底是多少，除了一个叫詹姆斯·圭恩(James Miller Guinn)的洛杉矶历史学家。作为社区名人，他受邀在1906年4月的南加州历史协会(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作演讲，很是有力度地提出了几点相左的看法。他先引用了几位“30英里”论支持者的报告，然后不太留情面地告诉参会者：

诸位只消看一眼传教所间的距离表就能发现该理论之荒谬绝伦。从圣迭戈传教所经老城区去到圣路易斯雷(San Luis Rey)的距离是48英里；从圣路易斯雷去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San Juan Capistrano)正好是30英里；从那儿再到圣加布里埃尔(San Gabriel)却足有60英里；圣加布里埃尔到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27英里；圣费尔南多到文图拉(San Buenaventura)，70英里；文图拉到圣巴巴拉，20英里。中部海岸各传教所间的距离从18到50英里不等。从圣塔克拉拉到圣何塞传教所只有12英里路程，但从那儿去旧金山却要走69英里。从旧金山去圣拉斐尔(San Rafael)虽然要先坐船再走路，却也不过17英里。

与此同时，他也对“El Camino Real”一词的英文翻译提出了异议。他指责说“王家大道(Royal Road)”或“国王公路(King's Highway)”的译名暗示着整条道路的设计、建设和管理都处在西班牙政府的密切注意与安排之下，而实际上这样的统筹和规划是不存在的。在很多地方（譬如圣何塞），传教所先于道路出现，而许多驿道的支线更不过是传教士或原住民在长期行旅中踏出的便道；哪怕在这些道路的运作中有政府投入，最多也不过是加利福尼亚本地殖民当局而已，和远在欧洲的“王家”没有什么瓜葛。换言之，决定大多数加州传教所位置的是当地的农业潜力、原住民数量和族群关系，而这些传教所的位置又决定了永久道路的所在，而不是相反。至于“早期传教所建在波托拉远征路线上”，也是真事，但只不过因为其远征所经过的海岸平原与山谷恰好也是加州原住民密度最高、自然条件最好的地区罢了——无论殖民者还是印第安人，总归都是受类似环境吸引的。最后，圭恩告诉我们，更权威的翻译应当是简单明了的“大路(High-road)”、“公道(the public road)”或“干道(main road)”；不过，考虑到中文语境和通俗作品中沿用的惯例，本书仍将其译成“王家驿道”。



这条驿道和传教所本体共同组成了佛利蒙最早的现代定居点，也是西班牙人在东湾的管理中心。该定居点的所有设施几乎都集中在王家驿道、传教所溪(Mission Creek)和磨坊溪的交界处，包括一条沿着磨坊溪挖掘的小水渠、几条连接周边原住民村庄和海岸的小径，以及——猜得不错，一座磨坊。沿着驿道往南走十几英里是圣塔克拉拉传教所和相邻的圣何塞镇：该镇在1800年左右的人口不会超过500，由一位市长兼法官(*alcalde*)和一个议事会(*ayuntamiento*)管理，算得上湾区除多洛雷斯传教所外最大的人口中心。但如果从圣何塞传教所往北走的话则找不到任何欧洲人的据点，只有数量不断缩减的原住民村庄和偶尔出现的小股西班牙部队。到1802年年底的时候，整个东湾的原住民群体几乎全被集中到了多洛雷斯或圣何塞传教所，使得后者迅速发展起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据说，在1799年底传教所的小麦收成达到了惊人的1800蒲式耳(*bushel*)——这个重量单位实在不太精确，但我们确实知道传教所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不用种地也能喂饱所有人。

可是，尽管不愁饿肚子，传教所的生活仍然是辛苦又一成不变的。先不提整日做工的原住民，传教士们也过着压力重重的日子：总的说来，这些勤勤恳恳的方济各会士应该不是坏人——当然，他们囿于殖民时代的狭隘观念强行剥夺了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但也绝非同时期美国东部和南部种植园里的奴隶主。从我们手头的资料来看，他们和原住民间的关系更类似中世纪的师傅和学徒：平日里传教士们监督他们的劳动，又在休息时间教他们用拉丁语唱圣歌或背诵宗教知识；他们在生徒患病时尽力给予治疗、为弥留之际的病人做祈祷、并且负责主持天主教风格的婚礼和葬礼。一些逃离传教所的前生徒在命不久矣时竟然派人来请传教士为他们作最后的祷告。驻扎在传教所的西班牙士兵家庭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军人们常常和信教的原住民并肩作战，而且也作为许多人的教父母(godparents)见证了他们的洗礼。不管怎么说，西班牙人半个多世纪的统治肯定不是原住民最受压迫和摧残的时期。

如此繁重的工作很快压垮了年纪比较小的梅里诺神父——也许照料12头公牛、12匹骡子、39匹马、60头猪和240只羊实在是太麻烦的任务——导致他在1799年告病返回了墨西哥城。取代他的是时年30岁的乌利亚(Antonio de Uria)神父，一个“头脑清楚、信仰坚定”的好修士。在接下来两年里他和更年长的巴塞尼拉神父合作得很愉快；当后者由于健康原因必须在1802年春季离开岗位时，圣何塞传教所已经颇具规模：其仓库里储有7000蒲式耳小麦，围场里住着457名生徒，而在围场外则是一片又一片肥沃的农田。巴塞尼拉后来辗转于其他几座传教所担任管理职务，似乎逐渐患上了“不喜社交、对印第安人缺乏耐心，直至歇斯底里”的毛病，最终在1807年5月回西班牙老家去了。一名叫做塔伯达(Luis Gonzanga Gil y Taboada)的神父补上了他的空缺，而乌利亚自然而然地当上了传教所的负责人。塔伯达待了两年就转去了新的传教所，但其履历可圈可点：他似乎是一位手艺颇精湛的医生，还主刀了圣何塞传教所的第一例破腹产。

圣何塞传教所早期神父列表			
年份	负责神父	助理神父	
1797	巴塞尼拉	梅里诺	
1798			
1799		乌利亚	
1800			
1801	乌利亚	塔伯达	
1802			
1803		库埃瓦	
1804			
1805			
1806			

塔伯达的继任者叫库埃瓦(Pedro de la Cueva)，是个“快活、勇敢”的28岁青年神父。相比于他的几位前任，库埃瓦在传教所的日子可以说是颇具冒险气质的。作为助理神父，他的主要任务包括管理传教所的外围农场和聚落(rancheria)，所以也担负起了圣何塞传教所对外交流的职责。正因如此，当前文提及的逃亡生徒在1805年1月派人来请传教士作临终祈祷时，库埃瓦第一个接到了线报。该事件的起因有些模糊，在文献里也有两个版本：霍姆斯说这些生徒住在50英里外的圣华金谷，但在1980年走访了加州各传教所的摄影师布鲁斯·巴顿(Bruce W. Barton)却说他们来自15英里外的小村，且只字未提其“逃犯”身份。总之，库埃瓦神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带着三名西班牙士兵和几名原住民帮手出发了。这些士兵——阿尔维索(Ignacio Alviso)和希圭拉(Higuera)兄弟——的家族后来都在本地生根，其姓氏至今仍常在路名地名中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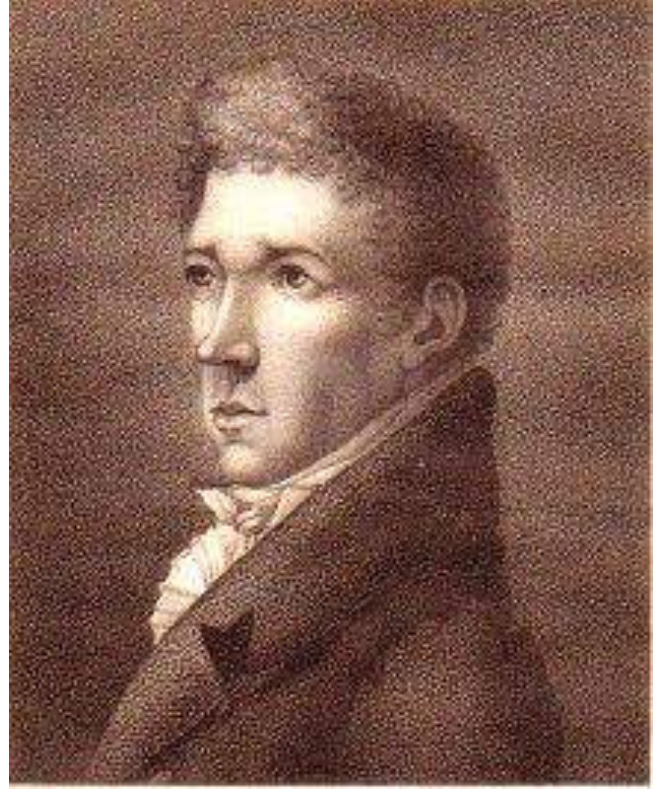
之后发生的事情更是扑朔迷离：在巴顿的版本里，这支小队一离开传教所驻军的保护范围就遭到了附近敌对原住民的袭击；但霍姆斯的故事细节更加充分：库埃瓦等人一开始并没有遇上什么麻烦，只是在快到达目的地时陷入了山谷中的迷雾失了方向。一名陪同的原住民向导想带他们到最近的村庄暂避，但不料村里的雷乌查(Leucha)部落见生人靠近，当即展开反击，杀死了库埃瓦队伍中三名分别叫维克多(Victor)、卢西亚诺(Luciano)和克劳狄乌(Claudio)的生徒，以及伊格纳修·希圭拉(Ignacio Higuera)。库埃瓦本人和伊格纳修的弟弟华金(Joaquin)也受了伤——前者脸颊上中了一箭——多亏阿尔维索回传教所搬来救兵才捡回一条命。这两个故事各有各的疑点——巴顿的版本显然过于简单，而且当时传教所周围应该不存在仍成组织的敌对原住民，但如果小队真的跑去了四五十英里外的地方，实在很难相信神父和华金能活到大部队到来。但该事件的梗概应该大差不差，因为传教所记录里确实提及了伊格纳修和三名原住民的高规格葬礼，而且有证据证明西班牙人对此展开了报复：旧金山要塞的驻军和圣何塞镇的居民组成了一支50人左右的远征队去到了袭击神父的村庄，在随后爆发的冲突中杀死了若干名抵抗的原住民，又把剩下的带回了圣何塞传教所。好笑的是，在这最后的小细节上作者们还是不能统一——霍姆斯告诉我们俘虏里包括25名妇女和儿童，巴顿则有些耸人听闻地写道：

在战斗中[西班牙人]杀死了11名敌人，又把剩下的捉作俘虏。在那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一整支队伍竟然全都由女性组成！

在一切尘埃落定后库埃瓦神父回到了传教所，继续他的职责。可能是这次冒险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的缘故，他很快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态度，因为在一年后的1806年4月，他又被赋予了和俄国人交涉的任务。在前文中我们提到俄国在阿拉斯加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班牙推进加利福尼亚；哪怕在传教所体系建成之后，俄国的殖民野心仍然没有停止，但两国间的关系大致还是友好的。不同于英国或西班牙的殖民政策，俄国的美洲事务几乎完全是由少数几家特许公司负责的，很少有政府或民间的直接参与。其中最早成立的是1783年的格利科夫-谢里科夫公司(Golikov-Shelikhov Company)，在第二年建立了阿拉斯加南部的三圣湾(Three Saints Harbor)据点，开始直接插手北太平洋地区的毛皮和酒类贸易，又在1798年得到了俄国皇室的特许状，改名成了更体面的俄国美洲公司(Russian-American Company)，或称“俄美公司(RAC)”。

一个在公司早期颇具影响的角色是娜塔莉亚·谢里科娃(Natalia Alekseevna Shelikhova)，公司合伙人格利戈里·谢里科夫(Grigorii Ivanovich Shelikhov)的妻子。格利戈里在1795年撒手人寰，留下33岁的娜塔莉亚一边照看六名儿女，一边面对丈夫的合作伙伴与商业对手。在那之前她已经体现出了杰出的管理才能，而且很有眼光地同首都圣彼得堡的权贵保持着良好的书信交往。因此，当她写信给凯瑟琳大帝(Katherine II)请求继承丈夫的部分遗产时，女皇不仅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更给她封了个难得的世袭贵族头衔，让娜塔莉亚得以在诸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先从亡夫的兄弟那儿买来了自己儿子继承的公司股份，又逐步控制了俄美公司的董事会——她写的一系列备忘录后来也成为了公司官方章程的一部分。在娜塔莉亚去世后，她的两个女婿继承了其理念和股份，继续发展着俄属美洲的经济潜力。





这两个年轻人里比较有名的一位叫做尼古拉·列扎诺夫(Nikolai Petrovich Rezanov)。他出生于一个备受尊敬的法官家庭，又在参议院的上诉办公室当了几年差，但始终对海外殖民与贸易抱有异常浓厚的兴趣。幸好，他在参议院工作期间积累起了很不错的名声，而和谢里科夫家族的姻亲关系更提供了参与海外工作的机会。在其岳父去世后，列扎诺夫成了娜塔莉亚的左右手，对公司的运作展开了一系列调查。在1803年，这一调查升级成了对北太平洋地区的官方考察，而他也被任命为了俄国第一任驻日本大使，希望能打开阿拉斯加和日本之间的直接贸易。在去日本之前，他先指挥着两艘单桅帆船——“希望号(Nadezhda)”和“涅瓦号(Neva)”——完成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着重观察了夏威夷群岛的情况（几年后俄国将试图把它收入囊中），最终才在1804年9月抵达了长崎(Nagasaki)。可惜孤立主义的江户幕府对俄国一点儿不感兴趣，把列扎诺夫和他的同伴们关了几个月后直接驱逐出境，坐船回到了西伯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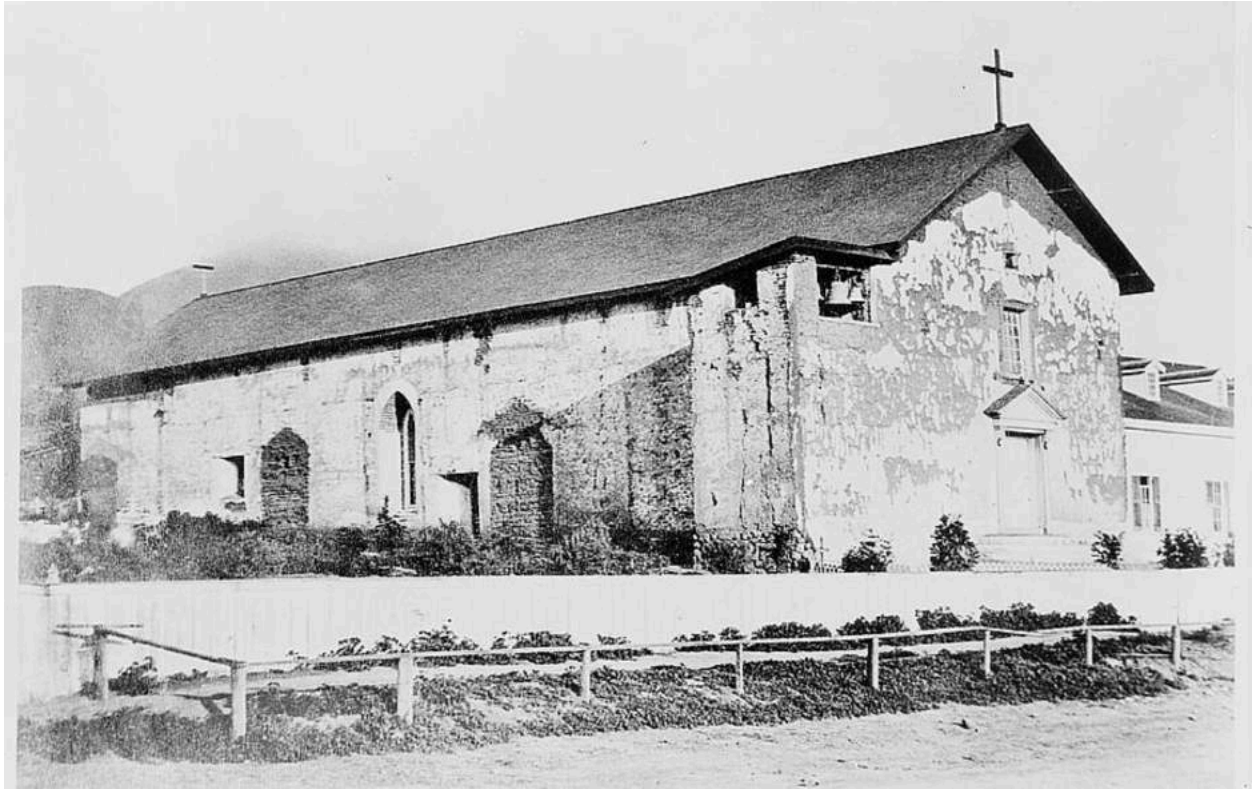
没怎么休整，列扎诺夫便带着这次探险的随船科学家乔治·冯·朗格多夫(Georg von Langsdorff)赶往阿拉斯加继续考察。在参加航行前朗格多夫曾担任葡萄牙陆军元帅的私人医生，在欧洲多座城市开过诊所，还是俄罗斯帝国科学院的通信院士，的确是很合适的人选。但是，当这两位见多识广的城市绅士抵达阿拉斯加的新阿尔汉格尔斯克(New Archangel)时，还是被当地的糟糕情况打了个措手不及。该镇虽然是俄属美洲的行政中心，但却频繁遭到当地特林吉特(Tlingit)部落的袭击，一切百废待兴，食物储备也快见底了。于是，在1805年9月列扎诺夫只好从一位经过此处的美国船长手里花大价钱买下了他的“朱诺号(Juno)”和船上运输的食品以供应定居者所需。可是，这些物资也维持不了多久——到了1806年2月底，绝望的列扎诺夫只好决定沿海岸南下找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人买吃的，而朗格多夫决定随行。

这次冒险的采购行动大获成功：回程的“朱诺号”载满了粮食，而新阿尔汉格尔斯克也慢慢发展成了一座颇繁荣的小镇。加州的西班牙殖民者也很欢迎他们的到来——孤悬北美西海岸的他们确实需要更多、更稳定的海上贸易机会。包括圣何塞在内的湾区各传教所愉快地用储存已久的小麦换来了毛皮，而库埃瓦神父则在4月初去了旧金山港口迎接朗格多夫，热情地请这位博物学家去传教所小住。朗格多夫挺高兴地去了，也因此为我们留下了对当时圣何塞传教所最详细、最可靠的描述。4月20日上午，他坐上小舟穿过旧金山湾抵达了佛利蒙的郊狼丘，登岸后赶在日落前来到了传教所的大门前。第二天库埃瓦神父给全体生徒放了一天假，又带着朗格多夫四处游览一番。在后来出版的游记里，朗格多夫如此写道：

[该传教所]虽然仅建立八年，却已经开发了不少土地。仓库里储存的粮谷数目远超过想象，大概包括超过两千法内加(fanega，约合一蒲式耳)小麦和同等储量的玉米、大麦、豌豆和大豆。厨用花园布置得极好，维护亦佳。传教所周边的土壤质量上乘，种植了一些还未长成但状态良好的果树。一条小小溪流过花园，灌溉了其中农产。在过去几年里传教所也建立了几处葡萄园，目前枝繁叶茂。其中所产的葡萄酒味甜，尝起来像是马拉加(Malaga，西班牙农业城市)的酒产。教堂本身所处的位置也很适宜，人人都说它能在几年时间里成为新加利福尼亚(Nueva California)最富裕发达的传教所之一。其唯一的缺憾在于周边全无森林。据说，这是因为过去的印第安人常常在夜里点起篝火，结果一不小心引发大火烧光树木的缘故。所以，建筑所用的木材总得从好几英里外的地方运来。好消息是，该处木材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被充分的粘土储备补充了：该处附近多有高质量的白垩丘陵(chalk-hills)，因此砖窑能源源不断提供造屋所需的土砖。……[我在的时候]印第安人的永久住房还未完全建成，所以仍有不少生徒和他们的家人一道住在周围的圆锥形稻草屋里。



接下来他又描写了奥隆尼人的形象装束，以及库埃瓦神父特别组织的原住民舞蹈。据他报告，和旧金山的多洛雷斯传教所一样，圣何塞也把几支敌对部落的成员比较和平地聚在了一起，但跨部落通婚似乎没有那么普遍。朗格多夫和列扎诺夫一起在5月10日返回了阿拉斯加，但这次短暂的“朱诺号”之行仍然标志了湾区最初的全球化迹象——列扎诺夫和上加利福尼亚总督何塞·阿圭罗(José Darío Argüello)在旧金山就两国间的美洲关系进行了一番长谈，而后者15岁的女儿康瑟希昂(Concepcion Marcela Argüello)和这位俄国探险家一见钟情，两人甚至在总督的见证下订了婚。于是，作为东正教徒的列扎诺夫决定回俄罗斯找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ander I)批准他和天主教徒康瑟希昂的婚姻，然后开启两人在圣彼得堡的新生活。不幸的是，他还未回到家中就一病不起，最终在西伯利亚与世长辞。康瑟希昂终身未婚，在北湾的一处修道院当了修女。朗格多夫的运气好些，当上了俄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最终退休回到了德国。



与此同时，圣何塞传教所的发展一直没有停止。事实上，在朗格多夫抵达湾区的一年前，乌利亚神父就有了扩建教堂的念头。在1805年年初该处已经居住了800多名原住民生徒，而且该数目还在不断增长，很快就要超出木头围场的承受范围。于是，他找来了在蒙特雷附近任职的库埃斯塔(Felipe de la Cuesta)神父设计了全新的土坯(adobe)教堂，以此作为圣何塞传教所的中心建筑。库埃斯塔更加出名的成就是对奥隆尼人语言的研究，不过新教堂设计得也不赖——就像朗格多夫所观察到的那样，加州不缺粘土，而这些粘土只需要加入一些稻草或苇秆，再经过简单的烧制就能成为坚固、防火、隔音且不易渗水的土坯砖。用这种砖头砌成的房屋隔热性能也挺不错，在加州的气候下更为重要。时过境迁，土坯在现在的加州和美国西南已经具备了很深刻的文化意义，代表着一种粗狂原始、实用主义的边陲气质。还未待新教堂建设完成，乌利亚和库埃瓦神父就在1806年夏天离开了传教所去其他地方任职，把圣何塞留给了接手的佛徒尼(Buenaventura Fortuni)和杜兰(Narciso Duran)神父。

2-4 传教所的政治与经济

纳西斯科·杜兰和大多数传教士一样出生在西班牙本土，在16岁时就加入了方济各会，经过八年的训练终于在1800年当上了神父，又在三年后坐船去到了墨西哥，很快被派到了加州的殖民前线。从1806年到1833年他一直在圣何塞传教所任职，一度担任加州传教所系统的总负责人；在那之后他搬去了南加州继续工作，直到在1846年辞世。他的性格似乎有些矛盾：在同时期人们的笔下，杜兰神父是“慷慨、和蔼又善良”的好人，深受生徒们的爱戴与崇拜，“其中一些更视他为灵魂上的父亲和好友”。和大多数西班牙传教士一样，他似乎视原住民为需要宗教指导和教育的孩童，但同样相信他们终将有能力脱离欧洲人自主生活，更公开反对西班牙军队和其他殖民官员对原住

民的虐待和屠杀。可是，不少研究者也提到了他强迫原住民皈依的手段；20世纪初一位名叫科拉·欧德(Cora Older)的女作者就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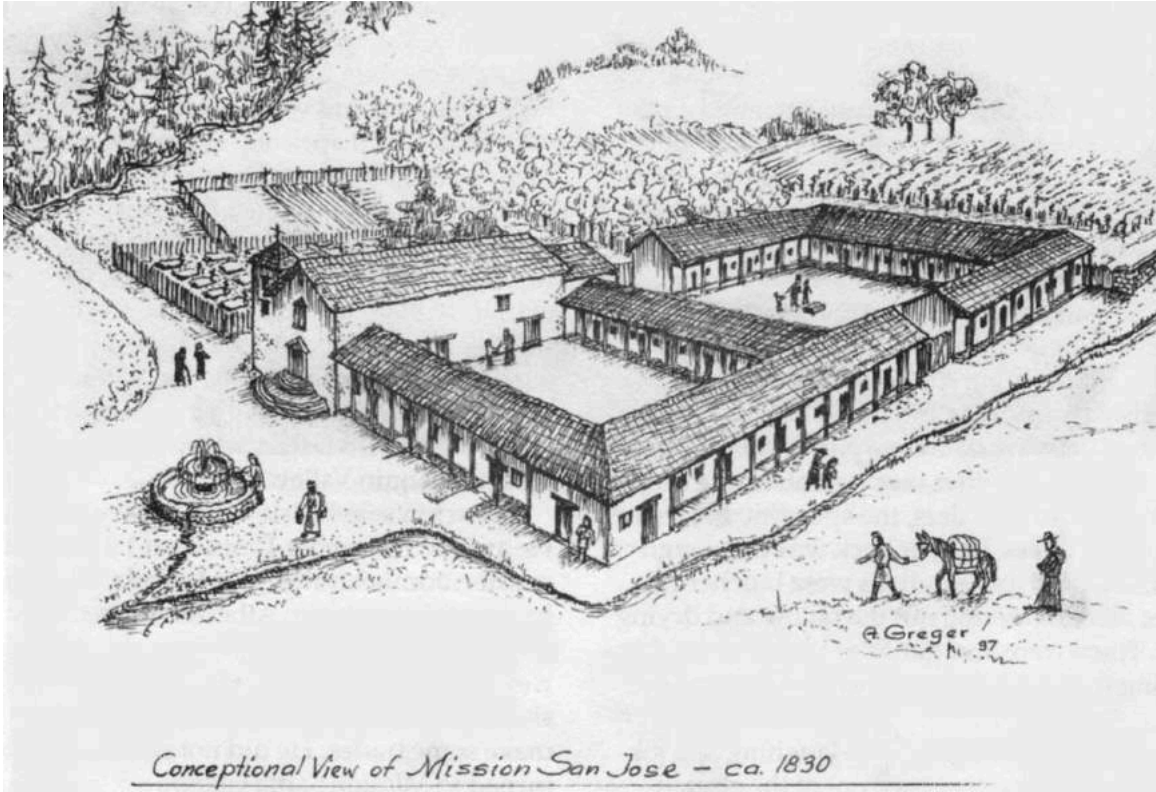
有人指责纳西斯科神父用暴力逼迫印第安人接受洗礼。当他们遭惩戒时，印第安人抗议道：“神父，我们疼！”而神父则答道：“当然，但地狱的痛苦更甚。”

无论态度如何，杜兰神父的宗教热情是不可否认的，而且全心全意地把这一热情投入到了传教所的各方面发展中。今天人们记得他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在宗教音乐上的造诣——他为生徒们写了专门的圣歌谱子，又训练了一批最杰出的原住民音乐家——但这些艺术、信仰和文化上的成就都必须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稳定，所以我们在这一节里先来谈谈这方面的情形。毕竟，当杜兰和佛徒尼在1806年7月来到东湾的时候，圣何塞传教所的快速发展正遭遇一个重大的阻碍。在乌利亚和库埃瓦神父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传教所内爆发了一场极严重的麻疹(measles)疫情；截止年底，圣何塞传教所损失了大约八分之一的人口。一个常被引用的数据指出，两位神父在4月的短短两天时间里就主持了26场生徒葬礼。因疾病导致的死亡，再加上出于恐惧而逃离传教所的人数，使得数年的经营功亏一篑——一直到1810年，圣何塞传教所的居民人数都再没有超过55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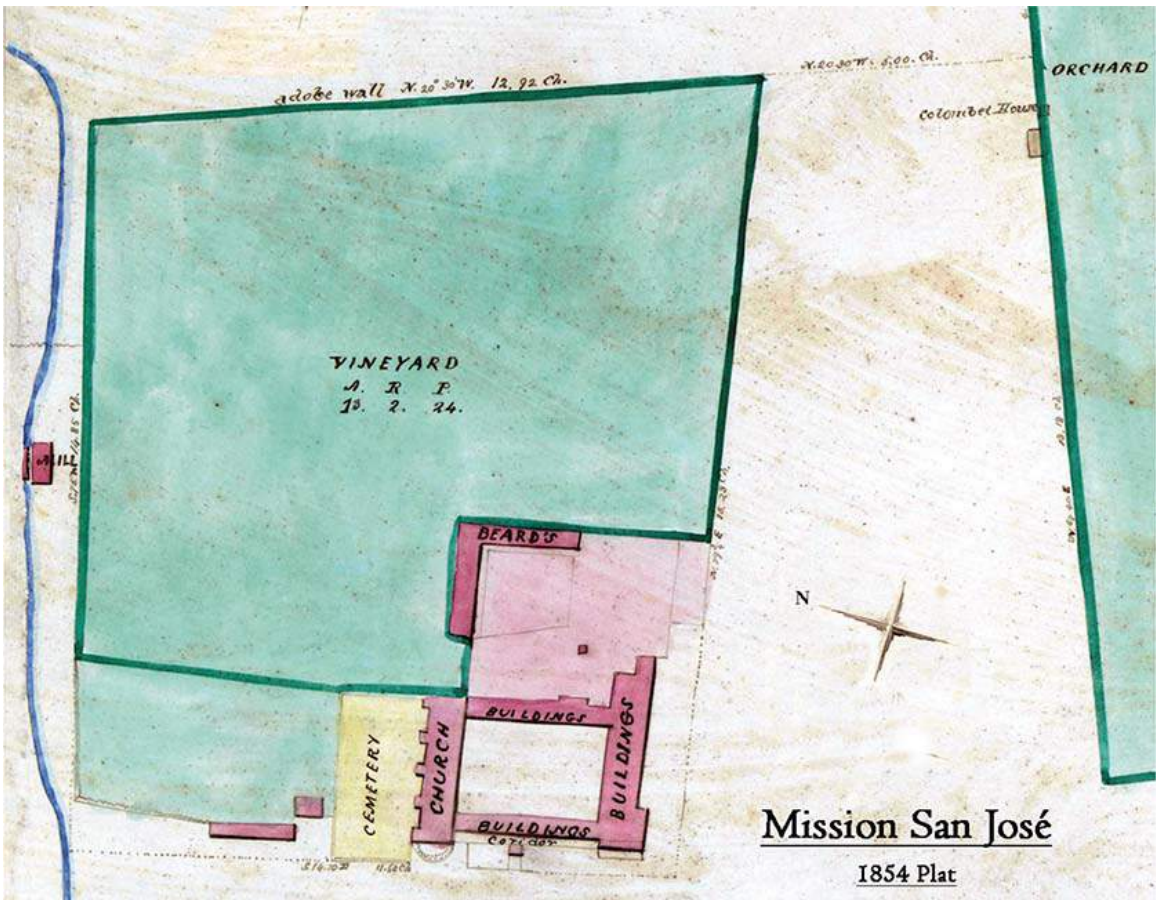
东湾的麻疹并非孤立事件：尽管这方面的研究仍较缺乏，但有证据证明其他加州传教所也在那段时间遭遇了疫病袭击：最早的麻疹病例出现在1806年3月的中部海岸，又在4月传到了旧金山（和圣何塞）。加州最南端的圣迭戈早在1805年12月就出现了异常密集的死亡事件，但没有麻疹记载——密苏里大学一位叫卡罗琳·奥班(Carolyn Marie Orbann)的博士生用电脑程序分析了这些死亡的分布密度和持续时间，认为它们不符合麻疹的规律。但不管是什么病原导致的疫情，这等规模的传染病在之前的原住民社会中从未发生过。随着西班牙人来到加利福尼亚的致病体在亚欧大陆上已经很常见了，但从未接触过它们的美洲原住民则完全没有抵抗力。传教所本身也是完美的传播途径——生徒们集体劳动、共同居住、一起参加宗教活动，不存在任何隔离的条件。

可能正因为这次疫情的影响，1805年就开始建设的土坯教堂一直到1809年才投入使用。在加州的传教所里它绝对不算多么精雕细琢，甚至可以说是其中看上去最平平无奇的一座；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它的体量与规格。新教堂的高度将近7.5米，每一面墙都有一米多厚；在它三角形的屋顶（学名叫做“山墙”）下躺着160根巨大的房梁，每根都来自奥克兰附近生长的红杉。在原本的设计中，教堂顶上还该建设一座高高的钟塔，但在1808年夏季的几次小地震后传教士们意识到了在加州造高楼的隐患，明智地取消了计划，转而在墙上凿了几个方洞作为钟架。这座白色教堂就成了东湾最早的永久建筑，至今位列美国国家史迹名录(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之中。





Conceptional View of Mission San Jose - ca. 1830



但是，土坯教堂仅仅是圣何塞传教所建筑体系的一部分。和几乎所有西班牙传教所一样，该建筑群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口”字：教堂构成了其中一边，而另外三条边则分别有着不同的功用。一般说来，其中包括神父宿舍、图书室、驻军宿舍、厨房、工具作坊、多处仓库和单身男女生徒分开的集体宿舍。已经成家的生徒有单独的住房——一般是新加的“口”字围场，但有时也被允许住在传教所墙外不远处自发形成的村庄中。在“口”字靠近土坯教堂的一侧设置有埋葬生徒的基督教墓地，再往外的地方则是农用土地：其中离传教所最近的一般是高价值的葡萄园和果园，而普通的农场和牧场则散布在更远的地方。除此之外，传教所附近的河边通常会建起水力磨坊；在一些规模最大的传教所边更出现了欧洲式的医疗所和为原住民儿童开设的基督教学堂。

在一切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土地的所有权(land tenure)当属最重要、最基础的。在加州，这个问题也是最复杂的——传教所、要塞和集镇各自有着不同的法律地位，而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土地所有权也有着很不同的看法。其中，集镇(pueblo)的法律地位是最清晰不过的——这些集镇（包括洛杉矶和南湾的圣何塞镇）坐落在西班牙殖民政府指定的位置，各自占据一块四平方里格（约合70平方公里）的方形土地。这四里格的开发也遵循固定的模式：集镇中心是政府建筑和大广场，四周分布着其它公共建筑；再往外依次是住房用地(solares)、集体耕地(ejidos)、私有农地(suertes)、牧场和林地，延伸到四里格边界为止。这些土地在法律上都归集体所有，但可以由其市长和议事会赠给愿意前来居住的殖民者家庭。在集镇之外，殖民政府偶尔也会通过赠地令(land grant)直接促进家庭农场(hacienda)的建立和发展；一些自然形成的农场和聚落后来也获得了私人土地的地位——根据西班牙法律，连续耕种开发无主土地满十年的，即可宣称私人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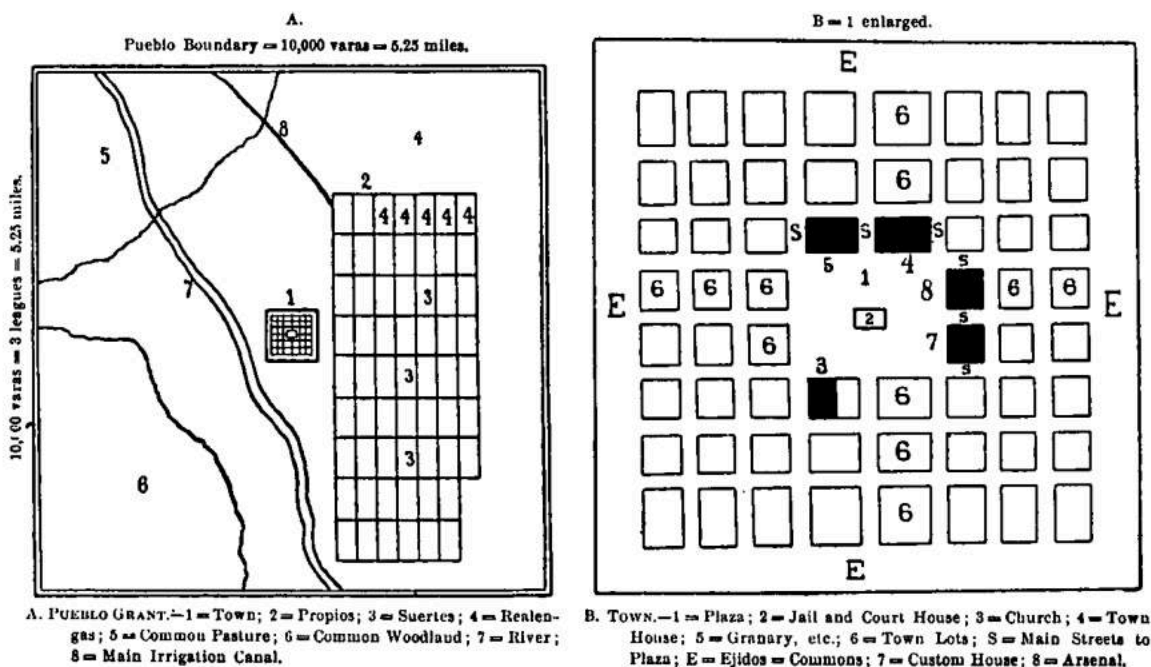


FIGURE 3. Spanish plan for the “ideal pueblo.”

F. BLACKMAR, SPANISH INSTITUTIONS OF THE SOUTHWEST 167 (18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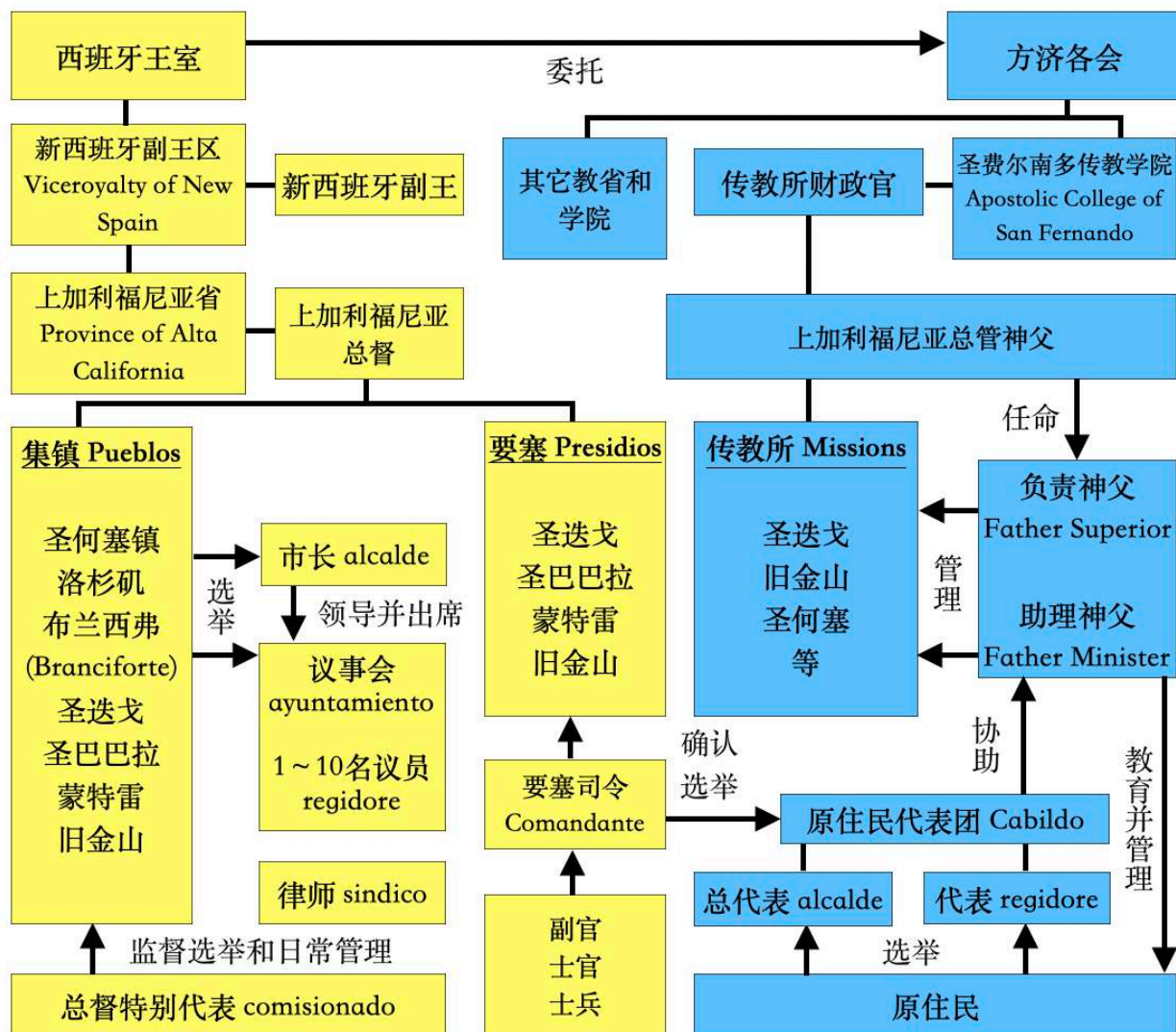
相比之下，传教所的土地所有权模式很是古怪。之前我们提到了传教士对原住民的看法，认为他们不过是需要教育和训练的、孩童般的民族而已。这一有些高高在上的观念也体现在了土地问题中：理论上传教所的一切土地都归当地原住民集体所有，只不过“暂时”由更发达的西班牙政府和传教士“代管”而已。同样从理论上来说，在代管期结束后——或者用术语来讲，在传教所“世俗化(secularization)”后——其公共财产会被分配给生徒们作为私产；他们将成为西班牙的付税公民，和欧洲人一起居住在集镇里从事传教所教会他们的工作；至于教堂本身则会脱离方济各会，直接纳入天主教会的管理系统，成为纯粹的宗教设施。这一“代管”的期限一开始说是十年，但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尽管西班牙治下原住民的自治权不断扩大着，完全的“世俗化”从未到来。

有意思的是，自治权问题一度让传教士和西班牙政府在意识形态上调换了位置。一直以来，殖民政府都是不太在乎原住民权益的一方：中南美洲的矿山、虚情假意的“监护征赋制”和耀武扬威的军事征服者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例子；反之，传教士们通常出于宗教立场或经济利益反对如此规模的暴力，也或多或少真心实意地希望教育出新一批的“上帝子民”。因此，很多读者也许会惊讶地发现，在1777年到1800年间，加州的殖民总督们曾几次三番试图加强原住民的自治权，却遭到了方济各会的强硬反对。为了避免传教士的权力过于膨胀，继而威胁到西班牙对加利福尼亚的控制，1775年到1782年在任的费利佩·内维(Felipe de Neve)就提出应当建立原住民的自治社区——这些社区和传教所有点儿像，但居民的自由活动不受限制，而且传教士的权威仅限于宗教领域，因此不能插手日常的经济管理事务。继任的波利卡(Diego de Borica)总督也很关注土地问题；在十年的代管期限来临之际，他在一封信里失望地抱怨道：

按法律来说传教所里的印第安人在十年的监护期结束后就能自由，而传教所也将被转作印第安村镇；但按现在的发展速度看来，新加利福尼亚的监护期恐怕要持续十个世纪；个中原因估计上帝是知道的，也许世人也知道些什么。

世人们当然知道些什么。一方面，和先前被驱逐的耶稣会一样，方济各会不可避免地对手中的权力产生了依赖；对原住民放权意味着自身利益的减少，他们自然是不愿意的。另一方面，包括杜兰在内的一批神父也辩称十年时间本就太少，远不够原住民“学会自立”。我们不好说他们的解释是否发自真心，但总之，随着传教所内生徒数量的增加和殖民政府的不断施压，原住民的政治地位确实得到了提高。我们知道，西班牙在加州有两个近乎平行的政治系统：待在蒙特雷的上加利福尼亚总督听令于新西班牙副王，而副王则直接向马德里的中央政府汇报；方济各会也具备独立的指挥体系——加州的所有传教所都由一位总管神父(father-president)负责，而总管神父则向墨西哥城的“传教所财政官(Procurator of the Missions)”报告；这样一个财政官似乎不是常设职位，但他貌似有权力直接与欧洲的方济各会总部沟通。

不过，这两个体系的基层管理能力很不平衡。总督麾下各个要塞的军官、各个集镇的市长和议事会，以及一些司法官员；但总管神父——尽管他所管理的人口数量和前者不相上下——却只能依靠每座传教所的负责神父和助理神父，实在不太有效。这一事实，加上前文所述的外部压力，让传教士们开始考虑任命原住民担任基层职位的可能。说到底，原住民任官制也许应当被视为一种政治工具以及双方势力达成的妥协，而非任何一方对原住民印象的真实表达：总督们希望这般自治可以巩固西班牙政府对加州的直接控制，而传教士们则觉得小退一步可以避免争端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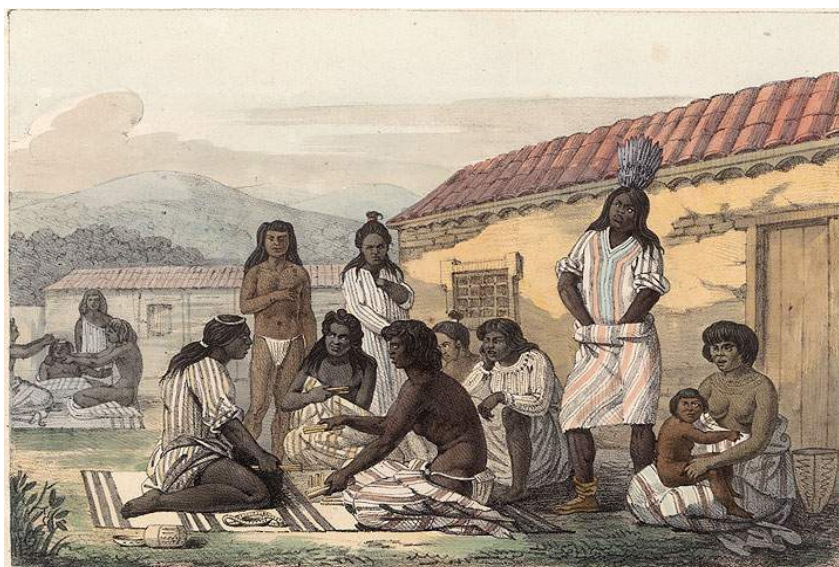


正因如此，和美洲其他地方相比，加利福尼亚的原住民参政规模要小得多，在一些时候甚至有名无实。比方说，在西班牙殖民已久、教会势力更弱、原住民人口更多的墨西哥，原住民们得到了一套极完善的、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体系：每个“印第安定居点”定期按人数多寡选出若干名议长 (alcalde) 和议员 (regidore)，共同组成一个由“定居点总督 (adelantado)”领导的“定居点议会 (cabildo)”，在级别上相当于其他城镇里的欧裔“市长”、“议员”和“议事会”——就连有些职位名称也一模一样。诚然，种族上的差异仍然根深蒂固——原住民或混血儿绝无可能当上殖民地的高级官员，也极少有机会在新建殖民城镇的议会中任职，不过至少在土著领地内其执政权是广泛且有保障的。一些最受信任的定居点总督不仅负责管理领地财政、监督土地使用并听审案件，甚至全权负责税务和地方军务。他们也有不那么光彩的一面——这些总督和欧裔贵族一样强征徭役、逼迫改教，逐渐成了拥有广袤地产的殖民地主——但至少其存在防止了原住民彻底丧失政治地位，也让西班牙人在侵犯原住民权利前必须三思——这些总督可是有权将他们告上高级法庭的。

这些总督在上加利福尼亚从未得到任命，就连原住民“议长”和“议员”也徒有其名。这两个职位仍然存在，但他们组成的“议会”并不具备独立办事的能力，而更像是传教士的副手和原住民的传声筒。正因如此，本书决定将加州的原住民“alcalde”译为“总代表”、“regidore”译为“代表”，“cabildo”译为“代表团”。根据法律，每个成立满五年的传教所都应当允许其原住民生徒选出一到两名总代表和同等数目的代表，但这些选举应当在“教区牧师(curas)”的监管下进行。方济各会抓住了这个法律细节，坚称他们的身份和教区牧师本质相同，并成功以此掌握了选举的控制权。他们可以指定参选人、避免地方驻军直接和代表们接触，而且可以在代表犯罪时撤除其职务。这些代表本身也缺乏法律上的权力和保护：他们不能向西班牙法官提起诉讼，在遭体罚时也不得豁免。除此之外，墨西哥的原住民领袖好歹可以从历史上吸取某种传统权威——在西班牙人来到之前他们已经具备了原始国家的雏形，因此有一些独立自治的记忆；加州的原住民则直接从部落时代进入了近现代国家的领域，对一切都毫无经验。哪怕是希望推进自治的法戈斯(Pedro Fages)总督也承认：

尽管原住民官员被赋予了若干权威，他们仍然依赖于传教士的指导；一旦离了他们，原住民们决无能力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

但是，加州的原住民代表也不是花瓶，不过他们的责任更多体现在经济和日常生活领域；这里先谈谈前者。在传教所体系内，所有“身强体壮”的原住民都被要求工作——时长大致在每天5~8小时，每周5~6天。具体的工作内容根据实际需求而定：男性也许会被要求制作泥砖、皮革、木工、石工或铁器，当然还有粗重的农活；女性通常待在传教所的工坊内磨谷、制衣、洗衣或做其他家务活；除此之外，一小批地位较高的生徒也作为秘书、仆役或教堂管理员(sacristan)直接为传教士服务，而所有人——不论男女——在收获季都得下地割麦收仓。随着原住民和西班牙人接触加深，他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专业：到了1810年左右，加州的传教所已经可以出产从皮鞋到肥皂、火枪到面包的一切所需，不仅自给自足，而且还支撑起了当地的驻军人口。可是，这些工作大多不是自愿的——考虑到原住民们既无自由也无工资，这并不奇怪——所以原住民代表的一大职责就在于组织劳力并监督同胞们做工。



每天清晨当传教所内的钟声响起时，代表们就要把生徒叫醒，集中起来进行晨祷。祷告结束后他们按照前一天得到的指令把工作分配下去并监督其完成。下午或傍晚，他们则聚在传教士的房间里听他布置第二天的任务，再用土语传达给原住民劳工。随着传教所不断开发更远处的农牧土地，越来越多的生徒出于方便搬去了传教所的围墙之外，建立了远离传教士的小型村庄。驻扎在这些聚落的代表对西班牙人而言

更加不可或缺——要是没有他们，分身乏术的传教士几乎不可能保证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一些代表显然是很“称职”的监工——旧金山传教所的总代表瓦勒里亚诺(Valeriano)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多名生徒抱怨他逼病人干活或者拿棒子打人的行径。与之相反，一些驻扎在外的代表利用了“天高皇帝远”的优势“经常在传达指令时拖延一天，带着工人们娱乐玩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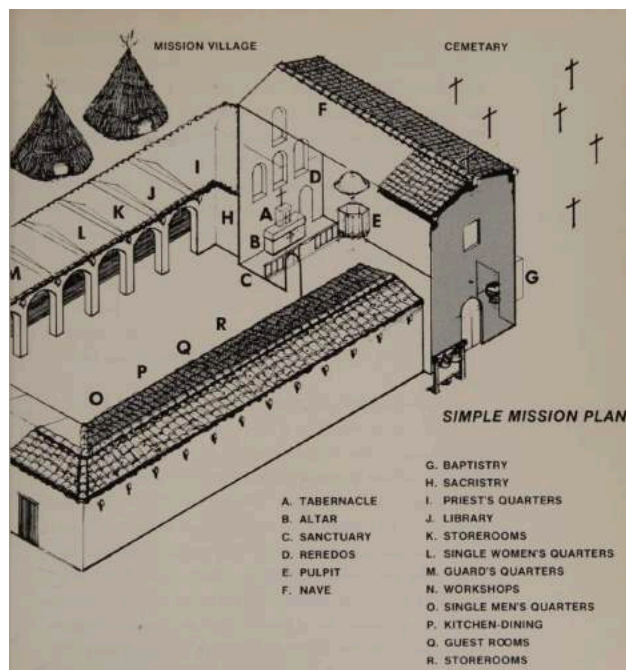
没有资料能告诉我们圣何塞传教所的代表和监工们有多严格，但估计是中规中矩的。一方面，和其他传教所相比圣何塞的原住民逃亡情况好上不少，似乎整体劳动条件还算足以忍受；另一方面，在佛徒尼和杜兰神父治下，传教所的经济情况大有提高，其背后当然少不了原住民劳工的血汗投入。在1810年年底，尽管1806年麻疹流行所造成的影响还未完全过去，传教所的小麦收成已经达到了4000蒲式耳，而1797年的12头公牛、12匹骡子、39匹马、60头猪和240只羊则繁殖成了漫山遍野的牧群，包括7109头牛、1190匹马和7002只“更小些的动物”。建筑房屋的脚步也没有放缓——1811年的时候传教所边多出了84座供生徒家庭居住的土坯小屋；1814年新建了仓库和岗哨；1819年更见证了专业肥皂工场的诞生。到了1820年的时候，小麦年产量已经蹿升至13000蒲式耳，传教所治下的生徒数量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754人。

一个更直观的经济印象来自传教所对外交易的商品名录。尽管西班牙中央政府仍不允许加州的殖民者和外国通商，但传教士大多数时候对此置若罔闻——加州本身的人口无力消化传教所的经济产出，而墨西哥自1810年起就出现了武装独立运动，也没什么心思和加州搞贸易。与之相反，俄国人从未放弃对加利福尼亚的谋划：列扎诺夫和朗格多夫离开湾区的五年后，俄美公司于1811年在旧金山以北110公里的加州海岸上建设了罗斯要塞(Fort Ross)作为前哨。该地大约有25名俄国职员和40多名原住民职守，但地势崎岖、不适耕种，比起殖民地更接近军事据点或交易站。于是，粮食丰收的传教所和正好缺粮的罗斯要塞一拍即合，由前者用食物和手工制品同后者交换矿石、蜡烛和在阿拉斯加制造的大中型船只。仅在1816年的一次交易中，圣何塞传教所就拿出了：

皮革、牛羊油(tallow)、海狸皮、橄榄油、动物脂肪(grease)、小麦、大麦、大豆、蜂蜜、枣干、羊毛、棉花、糖、香料、葡萄干、糖蜜、各式工具、碗盘、锡器、餐具、各式衣料、皮靴皮鞋、印花布、棉布、绉布、绸布和家具。



2-5 杜兰神父和传教所的宗教活动



这样一个较发达的经济基础让杜兰神父得以开展各种宗教活动，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教堂的内部装潢。和其它基督教教派相比，方济各会所属的天主教会对于宗教场所的美观极为重视，因此希望教堂内充满宗教符号、艺术作品和其它饰物。哪怕最简易的传教所也必然包括一个特别设计的祭坛(altar)和一处于其中的“会幕(tabernacle)”——这个词来自旧约中希伯来人的圣所，在天主教堂里则一般用于保存圣餐面包；由于这些面包被认为是耶稣肉体的化身，保管它们的“会幕”通常也打造得极为精致。祭坛和会幕周围的区域被视为“圣所(sanctuary)”，由漂亮的栏杆围绕；祭坛背后的墙上则开有壁龛(reredo)，其中展示着各异的宗教雕塑。规模大些的教堂有时还装备了占据一整面墙的管风琴和其它宗教乐器，全是为了在信众心中营造出庄严宏大、神圣华丽的气氛。

正如前文所述，当杜兰神父在1806年中旬抵达圣何塞传教所时土坯教堂还未完工，而麻疹的爆发让经济活动一度瘫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他凭一己之力完成宗教装饰自然不可能；于是，杜兰一边重振农牧业，一边组织劳动力推进教堂主体建设，一边展开了激进的“外交攻势”。上任没几天他就急忙写信给墨西哥城的财政官维瑙斯(José Viñals)神父寻求帮助，希望他能快快送一批物资过来。为了确保维瑙斯认真对待此事，一向务实冷静的神父竟然也用上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语言很难描述该传教所糟糕且遭忽视的情形；看上去仿佛曾遭一整群异教徒洗劫似的，而且[建筑]各处都是这般。我们打算能修多少算多少…

到了11月底还是没有物资的踪影，杜兰只好再给墨西哥城去一封信。在恳求维瑙斯“若有可用于弥撒的余料，请一定麻烦知悉”之前，他先花了一整个段落祝贺对方再次当选传教所财政官一职，读上去甚至有些溜须拍马：

得知尊敬的阁下[再次]被尊贵的[圣费尔南多]学院理事会选为诸传教所之总财政官，上加利福尼亚的所有神父无疑都欣喜之至，因我本人也从几乎所有同僚处得到了类似的消息。我们总希望担任这个职务的该是位既解人意、对传教事务全心全意，又愿意为全体同仁服务的个人，而阁下您正具备这一切品质，因而您连任的消息让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快意。

这两封信的效果说不上好。尽管维瑙斯神父在回信中称“圣何塞传教所值得特殊的关注与对待”，杜兰在第二年1月31日的信里仍在抱怨装饰品的“极端缺乏，甚至到了不太光彩的地步”。因此，传教所的经济一见起色，杜兰立刻就将盈余投入到了宗教品的购买中去。他在2月27日的信里写道：



随信附上一封300比索的汇票。我相信蒙特雷要塞也很快会送来另一封200比索的票子。它们自该由阁下保管，希望可以积累起来购置一座和圣克拉拉[传教所]类似的主祭坛。至于两处副祭坛，我相信它们应当模拟卡梅尔[传教所]的样式。与此同时，也许您能好心地为我们调查一下特皮克(Tepic)镇一位塔马利兹(Tamariz)先生欠本传教所三四百比索的问题，因为传言说他的产业有破产之忧。

五百比索实在不是小钱——在19世纪初期，一枚西班牙比索的含银量接近24.3克，和同时代的一美元银币几乎相等，而五百美元在当时的马萨诸塞州等于一位普通劳工近两年的工资——但还是不够添置一座漂亮的天主教祭坛。不过，这只是杜兰的第一笔大宗装饰品开支；在那之后，随着农业和手工生产逐渐回到正轨，他在信件中订购宗教物件的次数慢慢多了起来。当年3月底他要了一枚祭坛石(altar stone)和两把念珠；1808年1月（也许是终于攒够了钱）订了三座靠墙的柜形祭坛(canvas altar)；四个月后又改了念头，要求把祭坛换成桌形的，因为他“听说柜形祭坛又贵又没用”；1809年初他花170比索从墨西哥买了件“合适的白色教袍”又添置了宗教画；1810年8月底他多订了三套白袍，又在两个月后追加了其他颜色。考虑到在天主教会中不同的仪式要求牧师穿着不同颜色的袍子，这表示圣何塞传教所的宗教活动开始变得更多样了。

在诸多装饰问题里，杜兰无疑对祭坛最是上心。哪怕是在和维瑙斯神父的通信中，只要一提到祭坛的具体规格、形状和设计，一贯轻声细语、恭恭敬敬的杜兰马上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读起来独断专行，甚至有些不容置疑的粗鲁。比方说，在1808年1月16日的长信里，他的语气仿佛是个在教小学生做数学题的老师：

[圣何塞传教所的]教堂顶高十一瓦拉(varas)，因此主祭坛必须也这般高。祭坛从八瓦拉高的地方就该逐渐收窄，逐渐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尖顶并保证顶篷看上去呈八角形。以此尊贵的阁下应能推断出主祭坛所应有的具体高宽。至于另两座副祭坛的尺寸，尊贵的阁下自可视整体合理搭配决定。

但我们不应忘记，全部三座祭坛都应当拥有相配的两层台阶，而主祭坛更该配有会幕。除此之外，主祭坛应有两处壁龛，其中一个位置更显要的用于展示本堂已有的童贞圣女(Most Holy Virgin)像，其高度约一瓦拉半；另一处则展示今年晚些时候该送到的我主圣约瑟夫(Our Lord Saint Joseph)像。也提请注意在祭坛的一面上要面向圣所开启的门扉。

至于副祭坛也该各自带有可展示两座圣像的壁龛。它们也应当配备数量正确的烛台，以便在重大典礼上使用。以上便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但除此之外尊贵的阁下可视情况对祭坛设计做适当添加或削减，我们定全意支持。

与此同时，他也联络了西属美洲各地的同僚好友以及虔诚的富裕教徒，从他们那儿筹集了许多零碎宗教物件，包括小雕像、祭坛桌布、圣爵（酒杯）、弥撒书、小铃铛、宗教画作、小十字架、灯具、烛台、炬火和手工缝制的蕾丝花布；某位格外慷慨的捐赠者还送来了一整座石头做的领洗池——这种池子看上去像是雕花的小喷泉或水缸，里面装的水用来给婴儿做洗礼。这一切内饰终于在1810年年底前布置完毕，而杜兰神父对此很是满意；用他的话来说，他的教堂在那时才真正“一只脚站了起来”，“虽不算太豪华，但足够体面了”。对于传教所的原住民生徒而言，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建筑将在接下来二十多年里见证他们人生中最重要几个时刻：出生、受洗、婚嫁与死亡。其中，受洗标志着一个人正式成为信徒的时刻，是最受传教士重视的，也被他们认真地记在了一本本《洗礼书(Book of Baptisms)》中。在圣迭戈的《洗礼书》毁于1775年的原住民进攻后，传教士们甚至凭记忆默写出了过去六年中的330个受洗者姓名，可见其重要程度。

这些记录告诉我们大约8.4万名原住民曾在加州各传教所内受洗，其中圣何塞接纳了7261人，仅次于圣塔克拉拉。不过，它们并不能揭示受洗者的所想——对他们来说，洗礼是否和西班牙人眼中一般重要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对原住民而言“洗礼”是一个极陌生的概念，很难被他们的世界观所接纳，因此其宗教含义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传达。从理论上讲，受洗之后生徒们就当遵守“十诫”教导并服从一系列行为规范，但许多人还是按部落传统行事。在一份1814年的官方报告中，佛徒尼和杜兰神父无奈地承认“在上帝的神圣律法之中，印第安人最难以遵守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条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对谋杀、行淫、偷盗和撒谎的禁止。其中，杀人多是血亲复仇的遗留，偷盗多见于疫病或灾荒时期，撒谎在所难免，但“不检点”的男女关系——诸如婚前性行为、婚外情或多妻制——一般被认为是可以改正并避免的，因此得到了传教士们的特别关注。

这一关注体现在了各个方面。在传教所设计上，单身男女生徒各自有着分开的宿舍，而且通常位于“口”字形围场相对的两端；在日常管理上，原住民代表的主要任务也包括对男女交往的检查，有时甚至会选出专管女生徒的女性总代表。一些代表干得挺卖力，但如此男女大防终究是和人性与传统相违的——常常有代表因为放纵生徒苟合而遭撤职；在1821年的圣胡安巴蒂斯塔传教所，一名叫莫德斯托(Modesto)的总代表甚至“乘着教士卧病在床，将全体单身女徒送去了男生徒处”。莫德斯托在事情败露后立刻丢了职位，但如此夸张的行动显然是对一种极压迫气氛的反应。

当然，完全的物理隔绝是不可能的：许多男女生徒在白天共用传教所的工坊或农田，再加上睁只眼闭只眼的代表，总有互相认识的机会。本来奥隆尼人也不是多么自由恋爱的民族，一来二去就到了结婚的时候。在1785年和1810年间，北加利福尼亚的传教所共记录了大约5000起初婚和一万起再婚（考虑到疾病等原因导致的高死亡率，这并不稀奇），还有2300对通过传统形式结合的夫妇在加入传教所后又举行了天主教风格典礼。在这种情形下，传教士就有了阻止一夫多妻制延续下去的机会：在1791年的圣彼得和保罗传教所(Mission San Pedro y San Pablo)——该教堂位于加州和亚利桑那州的边界上，仅存在了不到半年就遭放弃——当奥雍(Oljon)部落的头人“拉齐(Lachi)”带着他的家族一起入教时，传教士们虽然允许他和他的四个妻子一同受洗，却只同意为其中一位举行天主教典礼。拉齐最终选择了他最喜欢的“苏韩(Ssujan)”，接受了作为一名天主教徒的生活。

不过，原住民传统的婚嫁习惯并未在传教所内绝迹。传教士们注意到许多生徒家庭仍然以互换礼物的方式为子女安排婚事，有时甚至保留了男方同时迎娶姐妹几人的风俗。哪怕是在“拉齐”这样的“成功”案例中，许多没有得到教会认可的“次妻(co-wives)”也没有再婚：虽然从天主教法的角度来说她们之前的婚姻是无效的，这些女子仍然自认丈夫的合法配偶。除此之外，原住民比较随性的离婚制度和天主教理念不符：在传统奥隆尼社会中，离婚只不过互道再见那么简单，而且不对之后的再婚构成任何阻碍。可是，传教士们虽然不反对生徒离婚，却不能接受快速的再婚——根据天主教规范，一方若要再婚的，必须等到前配偶去世，若有违反则一律视为通奸。总之，传教所内的男女之俗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强制推行的宗教框架下，尽管原住民接受了天主教婚恋关系的外在形式，他们在思维和认知上仍保留了传统的影子。与此同时，在不断的交锋和冲突之下，双方似乎逐渐开始了互相的理解。哪怕是严格的杜兰神父最终也承认“尽管有不少反例，但原住民男子大多总是真心爱着他们的妻子儿女的。”

类似冲突和妥协共存的局面可见于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一般说来，天主教徒的新生儿很快就该受洗，但许多生徒却宁可去外面生孩子。事实上，在旧金山传教所施洗礼的全体原住民中，大约5%虽然有着生徒父母却降生在传统村庄，说明其父母要么特意找神父申请了路条，要么干脆选择了逃亡。有趣的是，决大多数夫妇后来主动带着婴儿回到了传教所受洗；这表示他们并不反对后代加入教会，而只是希望其诞生能按传统程序进行。比方说，奥隆尼男子不该在妻子怀胎时外出做工，孕妇也不该摄入肉食或盐，但安排工作和发放口粮的传教士几乎不可能考虑到这些。



和出生与婚嫁一样，死亡也是原住民社会里重大的一部分。奥隆尼人会在亲人去世后举行哭丧典礼、毁去死者的草屋并掩埋他们生前所用过的种种用具，目的是为了杜绝灵魂返家的念想，以此避免死者侵扰活人。如果死者有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在世的，她们还要剪去长发，再用烧火的余烬涂黑脸庞以示悲戚。传教士们自然不喜欢这种“异教”的表达方式，力图在传教所内禁止一切除了标准天主教葬礼外的丧仪，有时甚至采取了鞭打等体罚手段。不过，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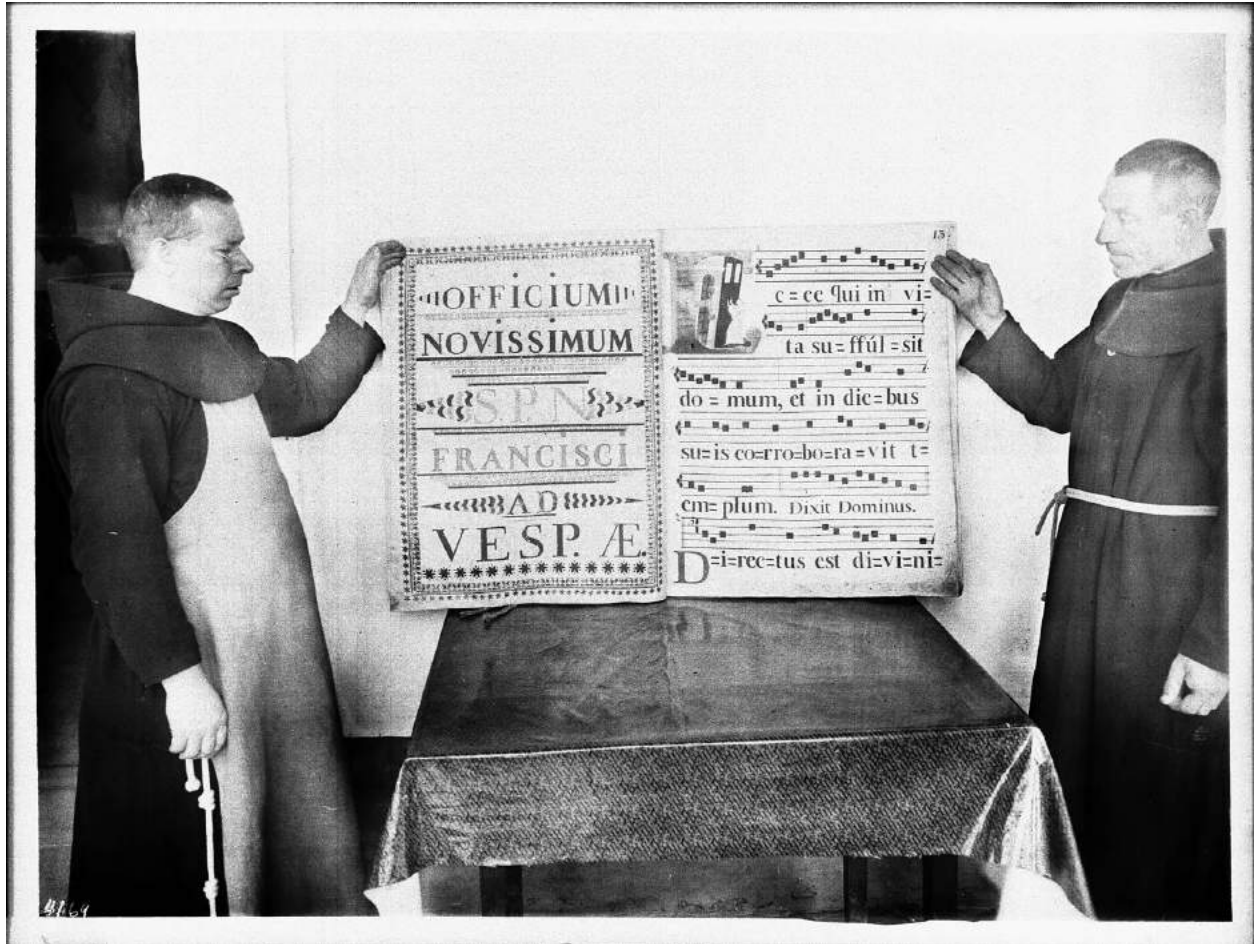
策”，一些生徒仍然秘密地遵循传统风俗——他们在神父们注意不到的地方”把脸涂黑、剪短头发，组织哭丧仪式，有时也会像临盆的产妇一样暂时离开传教所以便行事。与此同时，葬礼也为传教士提供了教化生者的机会；三名在1814年死于旧金山传教所的原住民生徒——吉尔(Geél)、弗洛依兰(Froylan)和惠塔纳克(Huitanac)——被允许穿着传教士的法衣(santo hábito)下葬，一种前无古人，之后也鲜有来者的荣誉，宣告了他们在生前对天主教信仰的忠诚。从传教所保留的死亡记录中来看，获此（有些空洞的）殊荣者通常也担任与宗教相关的日常职务：1820年死于文图拉传教所的皮欧(Pio)曾是教堂的领祷人，“因为声音嘹亮清澈干得很棒”；同年下葬的玛丽亚·伊莎贝尔(María Ysabel)不仅“在去世前整晚诵念《童贞圣母念珠经(Rosary of the Most Holy Virgin)》”，而且长期负责照料教堂保管的法衣和其他宗教器物，“其虔诚认真令人钦佩”。

很少有生徒能像上述五人这般无怨无悔地过完美基督徒的日子，但不少人确实参与到了教会的日常运作中去。他们最常干的是教堂维护、见证洗礼、组织祈祷和翻译宗教材料之类的活计，但杜兰神父很快发现了原住民的音乐才能，并在任上建立了加州最负盛名，可能也最有影响力的传教所乐团。显然，杜兰本人就对音乐很感兴趣；他没接受过什么成体系的音乐教育，但自学了几种乐器，也对当时的音乐理论颇有了解。在上任后写的第二封信里，他先拍了财政官的马屁，提了嘴圣何塞传教所糟糕的情况，又求他送些物资来。接着他话锋一转：

除此之外，若您能别忘了将拜尔斯(Bails)的古钢琴(pianoforte)和小键琴(clavichord)讲义送来，我会无限感激，因我需要它们来度过孤单颓废的时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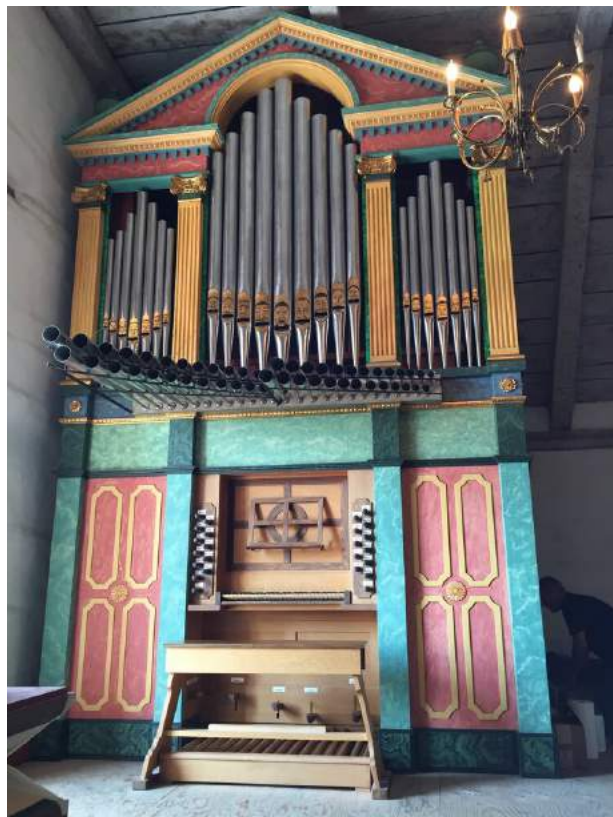


可惜的是，刚刚度过麻疹流行的圣何塞实在没几个余钱可以拿来购置乐器，所以杜兰神父手下的宗教乐团一开始不过是个人声合唱团。好在奥隆尼人本来就擅长声乐：他们的传统注重集体歌唱和舞蹈，所以在协调和配合上很是出色；一位曾到过加州传教所的法国医生更对其和声印象深刻，认为“欧洲的农民就算经过好几年的训练也定比不上他们”。为了更好地开发合唱团的潜力，杜兰神父专门写了一系列经过特别设计的谱子；这些谱子几乎只包括最基础的低音谱号(bass clef)，而且画得特别大，站得远了也看得清。他还为不同声部设计了不同样式和颜色的标志——红框白底的是旋律声部(first voice)、黑框白底的是女低音、黑色方块是男低音，大红方块则代表男高音，简单却有效。至于圣歌的歌词则全由拉丁语写成，因此生徒们大多只能模拟发音，而不完全理解其意义。但这并没有减少其艺术价值——据1826年到访的英国军官比奇(Frederick W. Beechey)所言，“生徒会众们听歌听得很认真，看起来非常享受”。



当然，比奇所见的乐团和最开始的合唱队已经大有不同。随着经济形势逐渐向好，杜兰神父得以一点点添置新的乐器。截止1812年年底，他的合唱团已经拥有了15把小提琴和3把大提琴，其中大多数都和宗教品一样来自墨西哥。有了这些基础乐器的帮助，杜兰在1813年写成了《传教所音乐入门(The Prologo)》一书，不仅录下了大量已有的圣歌乐谱，还简单介绍了他在训练原住民生徒方面的心得。在他看来，如此音乐教育有三个要点：一是要训练数量足够的歌手和乐手以应对各种典礼和不时之需；二是每位乐团成员都得同时学习声乐和乐器；三是团队协作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杜兰神父还创作了一系列后来在加州传教所广泛唱诵的圣歌，如《加泰罗尼亚弥撒曲(Misa de Cataluña)》、《巴斯克弥撒曲(Misa Viscaína)》、《我们的父(Padre Nuestro)》和《神救玛利亚(Dios Te Salve Maria)》等等。到了1820年代，圣何塞传教所的乐团已经拓展成了有30件各种乐器的队伍，包括小号、大号和大小不一的鼓。

不过杜兰神父仍不满足。对传教士们而言，宗教音乐的“圣杯”并非一支装备完善、训练充分的乐团或唱诗班，而是一座教堂管风琴：这种乐器最早在10世纪成规模应用于欧洲教堂，又在本笃会(Benedictine Order)——和方济各会齐名的大修会之一——僧侣的推广下变得越来越精巧庞大，逐渐得到了“乐器之王”的美誉。其功能也不断拓展着：最开始管风琴不过是召唤信众前往教堂参加活动的号角，但后来则成了演奏宗教音乐不可或缺的工具。到了17和18世纪的巴洛克(Baroque)时代，为了顺应该时期华丽精致的贵族主义艺术风格，管风琴的建造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它们开始有了愈发广阔的音域和更加响亮的音色，而演奏者甚至可以通过按键控制歌唱小鸟和跳舞小人一类的简单机械。天主教会一向注重外在形式，而洪亮的管风琴就和繁复的建筑装饰一样，可以在普通信徒的心里唤起崇拜和敬畏的情绪。



当然，这样的大管风琴一点儿不便宜，也不是普通传教所负担得起的；正因如此，除了圣何塞传教所的杜兰神父之外，没有任何一位加州传教士甚至想象过能拥有一台。就连杜兰本人也有些迟疑：早在1819年左右他就写信给墨西哥询问了购置管风琴的可能，但过了好几个月又不太好意思地反悔了。用他的话来讲，“考虑到管风琴规格的复杂性，以及财政官阁下您获得一台的困难程度…我希望您能推迟与其相关的计划，直到我们等到更好的时机”。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似乎确实放弃了购买管风琴的念头，转而要求添置一些开销更小、更容易搞到手的乐器，包括一把“声调优美”的低音大提琴和四把普通小提琴。幸运的是，神父所期待的“好时机”很快来临了：在1820年6月中旬的一封信中，接替维瑙斯担任传教所总财政官的胡安·科特斯(Juan Cortés)对杜兰表示支持，还告诉他自己也许能找到所需的乐器工人。于是，在次年年初的回信里，杜兰神父颇有仪式感地写道：

既然如此，以至圣三位一体(Most Holy Trinity)、耶稣、玛丽和本传教所主保圣人圣约瑟夫之名，我坚决地做出最后决策，让工匠们按以下指示开始管风琴建设…

接下来神父花四个段落描述了自己觉得最合适的管风琴技术规格，从长度高度到旋钮的数量无一不包。他也关照到了原住民合唱团与管风琴的配合，认为琴的音高应当比主流管风琴低上一度，因为“大多数原住民不能很好地维持高音”。他同样考虑到了传教所的有限经费，要求去掉一些不常用的音乐功能，“以此节约一百比索，并确保全部开支不超过七百”。可惜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方济各会的上层最终否决了杜兰神父的提议，而他心心念念的管风琴终究没有抵达。到了1825年4月，神父仍然会在信里提起这件事，语气里说不上是失望还是希望更多些：

管风琴的念想仍不时在我脑中重现，但之前既然已讨论过，我们只要耐心等待。

这一等就是170年。西班牙人的统治早就结束了，墨西哥人来了又走，加利福尼亚也成了美国的一部分。在1985年，负责重修圣何塞传教所的市民委员会——我们会在之后的章节里提到它——决定按杜兰神父的愿望在复原后的教堂内设置一座符合当时风貌的大管风琴，并选中了位于洛杉矶的罗莎利斯公司(Rosales Organ Builders, Inc.)来建设它。在传教所保管员凯利·奎德(Kerry Quaid)、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罗莎利斯公司终于在1989年将完工的“作品第十四号(Opus 14)”——该琴沿用至今的代号——送到了佛尔蒙，安装在了传教所两楼的小小平台上。时至今日，“作品第十四号”偶尔还会在婚礼、葬礼或举办特别活动时响起，就好像杜兰神父一直所盼望的那般。

2-6 传教所外的世界

说了那么多关于圣何塞传教所的事，好像当时的佛尔蒙区域没有其它东西似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话不能算错：那时候的东湾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城镇，而传教所也确实那片地区最大、也最主要的人口中心。但它并不是唯一的聚落——除了几座原住民村庄和从属于圣何塞传教所的边境农场以外，一些西班牙殖民者也通过政府赠地建立了独立的家庭牧场(rancho)。

享有如此特权的殖民者通常都是退役的驻军士兵，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路易斯·佩拉塔(Luis Peralta)。路易斯于1759年出生于新西班牙的一座军营，又在他22岁那年随同家人一起搬家去了蒙特雷，成了上加利福尼亚最早的欧洲家庭之一。和他的父亲一样，路易斯年纪一到就参了军，辗转于蒙特雷和旧金山两座要塞之间，还作为拉苏恩神父的随员之一在1797年见证了圣何塞传教所的奠基。他于1807年从军中退役，立刻被任命为了圣何塞镇的总督特别代表，全权负责几个牧牛人家庭间的土地争端。他在任上没有什么太大成就，但在空余时间里打理的果园倒是收获了不错的名声。这座果园最终没能保留下来，但佩拉塔家族在圣何塞市内的旧居——一栋和传教所材质相仿的白色单层土坯小屋——至今仍然可以看到。



路易斯·佩拉塔活了92岁，比他十七个子女中的八人活得更久。眼见自己的家庭规模不断增长，路易斯决定向加利福尼亚政府申领一块私人土地；他的申请在1820年8月3日得到了批准，而他也在两周后正式获得了圣安东尼奥牧场(Rancho San Antonio)的所有权。“牧场”这个词实际上不太准确——虽然这片土地确实大多用于放牧牛羊，其规模实在和我们印象中的圈场不太一样：圣安东尼奥牧场的面积足有70平方英里（约合181平方公里），相当于大半个新加坡，囊括了几乎整个东湾北部。他的家庭庄园(hacienda)就坐落在今天的奥克兰市内，包括两座标准的土坯住房和二十间客房，甚至还有一座可供货船停靠的码头。这座庄园的出现也给佛利蒙带来了变化——随着东湾北部经济活动的发展，王家驿道的尽头开始一点点向北挪动，圣何塞传教所也不再只是道路的终端，而成为了从圣何塞镇去到佩拉塔庄园路上重要的补给点和休息站。

在路易斯·佩拉塔获得圣安东尼奥牧场的第二年，另一名西班牙士兵也得到了自己的牧场。还记得1805年库埃瓦神父带队去圣华金谷给人作临终祈祷，结果半路误入原住民村庄的事吗？那次和他一同前去的还有三名卫兵，包括一对姓希圭拉的弟兄；其中的弟弟华金得以幸存，但哥哥伊格纳修(Ignacio Higuera)却丢了性命。伊格纳修的儿子何塞(Jose)也当了兵，在1821年从加利福尼亚总督手里要来了一座名为“芦苇地(Rancho Los Tularcitos)”的牧场，位置就在今天佛利蒙市以南的米尔皮塔斯。何塞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叫福尔良修(Fulgencio)，女儿叫玛丽-约瑟法(Marie Josefa)；福尔良修最后在佛利蒙地界内拥有了自己的牧场，以当地著名的热泉命名为“温水牧场(Rancho del Agua Caliente)”，离圣何塞传教所开车要不了十分钟。玛丽-约瑟法则嫁给了一个叫罗伯特·利弗莫尔(Robert Livermore)的英裔移民，搬到后者位于东湾山谷里的另一座牧场度过了余生。温水牧场的旧址上如今仍有一座白色的土坯小屋，时而举办些历史教学活动；利弗莫尔的牧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如今繁华的利弗莫尔市，而他死后则葬在了圣何塞传教所的教堂内，其白色大理石墓碑离前文提到的管风琴不过几步之遥。



像利弗莫尔这样的外国移民在那时的加利福尼亚是极为少见的（因此他为了久居湾区还得找总督办特殊手续），但他们代表了佛利蒙和东湾历史里一个新的阶段——随着西班牙人对美洲殖民地的控制开始松动，1820年代起加利福尼亚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英国、美国、墨西哥等势力各自展开了渗透，而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变化更是十分惊人的。不过，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早在十几年前就初现端倪——杜兰神父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观察。在1807年3月30日的信里他就不无警惕地汇报说：

目前我等正提高戒备以随机应变。近日两艘英美战舰正泊于旧金山港，每艘都配有15到20艘可用于争夺湾区海獭皮货的小艇。不过，我们更担心它们会袭击我国的补给船…以至于雁过拔毛，使我等困顿潦倒。

他的描述可能有些夸大了——这些船只尽管装备火炮，但本质上是私人所有的武装商船，并不意味着英国或美国的军事入侵。但是，杜兰神父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因为这些商业行为背后的尽管不是国家意志，却也是一个足令人恐惧的民间势力；如今被我们称作“扬基商人(Yankee traders)”。“扬基”这个词现在常被用来指代全体美国人，但在18、19世纪一般仅包括新英格兰地方的居民，也就是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等州擅长航海和商业的人们。这些地方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易于防守的良港和大片大片的树林，早在英国殖民时期就开发出了很有竞争力的造船业。与此同时，北美最早的大中城镇——比如波士顿、纽约和罗德岛的纽波特(Newport)——都位于这个区域的范围内，因此也成为了各种外国商品交易的中心和北美东海岸的船运枢纽。比方说，在1768年到1772年间，足有210万加仑糖蜜(molasse)从加勒比海种植园运往了马萨诸塞殖民地；其中将近130万加仑经转手出口到了大洋彼岸的欧洲和非洲，剩下的则支撑起了发达的本地酿（朗姆）酒业。





对于在1780年代彻底脱离英国独立的美国而言，对外贸易更是不可或缺的财政来源。新英格兰庞大的渔船和捕鲸船队不仅需要在全世界海域寻找渔场和鲸群，也需要把鲸油和腌鱼销往海外市场；南方各州有着无数庞大的种植园，其生产的烟草和槐蓝(indigo)植物也一直是出口的大宗。除了出口，进口也一样重要——新生的美国缺乏本土工业，因此不得不依靠欧洲提供从纸张到玻璃、布匹到铁器的各种消费品。一项研究估计，1774年美国的进口商品总价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0%——哪怕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这一数据也不过在15%左右。一个更直观的例子来自1807年底：杰斐逊总统下令中止一切外国贸易，目的是为了向正在交战的英法两国展现美国保持中立的决心。禁令生效后的一两个月里工业产品的价格增长了三分之一，而积压在国内的农产品则被迫降价三分之二，贸易对人民生活之重要可见一斑。

杰斐逊的禁运政策不仅在经济上不讨好，在政治上同样没有达到目的。没有进口意味着没有关税收入，没有关税收入则意味着政府预算的缩减；在财政部长等人的坚持下，总统终于在1809年年年初解除了禁令，但贸易并没有完全恢复。英法间的战事仍在持续，两国也各自展开了对另一方的海上封锁，意图阻止对方从海外获得商品或补给。于是，做两头买卖的美国商船不仅成为了双方海军的打击目标，就连船上的水手也常常被英国海军强行逮捕，被迫在战舰上服苦役。这种行为被称作“强压征召(impressment)”，直接导致愤怒的美国国会在1812年向英国宣战，拉开了1812年战争(War of 1812)的序幕。

这场战争的主要对手自然是英国和美国，但西班牙也短暂地加入了英国的阵营。我们之前提到法国在1763年把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领土交给了西班牙，但后者在1801年的《阿兰胡埃斯条约(Treaty of Aranjuez)》中又把这片土地还了回去，用它从拿破仑手里换到了六艘风帆战列舰和意大利北部富裕的托斯卡尼(Tuscany)地区。这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事，但拿破仑很快意识到遥远的北美大陆经营起来极为困难，而且英国组织的第三次反法同盟成立在即，使得他急需现款整军备战。杰斐逊抓住了这个机会，在1803年以15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3.42亿美元）的“跳楼价”买下了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开始在新奥尔良驻军。这一决定直接违反了《阿兰胡埃斯条约》中的条款，导致西班牙和美国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关系十分紧张，也促成了双方在1814年的军事冲突。这场战争最终在1815年落下帷幕——英属加拿大军队在美国北部长驱直入，一度攻占首都华盛顿，但英军在美国南部海岸的登陆作战极不成功，结果只好保持了战前边界。不幸的西班牙没有英国的军事实力，只好割让佛罗里达西部的重要港口莫比尔(Mobile)，又失去了北美殖民地的一小部分。

1812年战争不仅再次揭露了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虚弱，更对美国国内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由于战争切断了大量商品的进口渠道，美国商人们被迫开始发展本土生产，因此带来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轮工业化潮流。工业的发展——加上1820年代的保护性高关税——为美国的出口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扬基商人们再一次活跃在了加州的海岸上。这一次，他们更得到了政府背书：1817年上台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在对外政策上非常积极，希望加强美国在南北美洲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这一外向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恰逢其时——在1817年，南美洲的独立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阿根廷几乎已经完全脱离了西班牙的控制，而秘鲁和智利的反殖民战争也进入了第八个年头。这些地方的革命者和“军政委员会(Junta)”们不仅天然亲近美国的共和制度，也希望从美国处购买军火枪炮，正适合被其纳入国际贸易体系。

就这样，美国轻松地获得了在南美海岸经商的机会。原本流向西班牙本土的金银开始随着商船进入波士顿和纽约等大港，显著缓解了美国国内贵金属短缺的问题。一些精明的商人更发现，从智利和秘鲁购入的白银可以直接跨过太平洋运到清帝国的广州(Canton)从中国商人手里换取瓷器、茶叶和丝绸，再把它们带回美洲高价卖给追求时髦的中上层消费者。受这种利益的驱使，美国政府开始向智利的几个主要港口城市派驻领事，以此为基地向北开展了商业扩张——1818年5月，门罗派遣美国海军的“马其顿人号(USS *Macedonian*)”护卫舰前往智利的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港打击海盗；同年8月，炮舰“安大略号(USS *Ontario*)”抵达了加州以北的俄勒冈地区(Oregon Country)海岸以保障美国皮货商人在当地的经济利益。到了1820年，美国商船不仅控制了从智利到秘鲁的航运，也时常巡弋太平洋西北部和夏威夷等地；西属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夹在当中，自然不太好受。



更糟糕的是，就连墨西哥本身——西班牙在新世界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面积也最广大的殖民地——同样在慢慢滑出中央政府的掌心。这一切开始于1810年9月的一个晚上。根据比较通行的说法，墨西哥中部瓜纳华托(Guanajuato)地区多洛雷斯(Dolores)镇的牧师米格尔·伊达尔戈(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在16日的凌晨两点半敲响了镇上教堂的挂钟；待镇民们在广场上聚齐之后，这位很受爱戴的牧师拉起一张圣母像，向人群发出了著名的“多洛雷斯呼声(Grito de Dolores)”。这一呼声的具体词句没有流传下来——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说法是“独立万岁，西班牙人去死”，而如今墨西哥总统的独立日“呼声”则以“带来独立的英雄万岁”开头，再以三声“墨西哥万岁”结尾。总之，伊达尔戈的追随者很快达到了六万人之众，一度威胁到了墨西哥城的殖民政府大本营。这次起义最终在次年3月遭到了镇压，但革命的源头并未被消灭。多洛雷斯镇的斗争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长期以来经济和种族冲突的症状之一。

伊达尔戈本人就是这两种冲突的最好样本：他来自墨西哥一个中等富裕的克里奥尔(Criollo)家庭，父亲是一处乡下庄园的管理人。这些克里奥尔人（有时也被翻译成土生白人）大多是早期西班牙

移民的后裔，虽多有田产，但在社会地位和财富上通常远逊被称为“半岛人(*peninsulares*)”的上层殖民贵族(*gachupines*)。可能正因如此，作为中产阶级的克里奥尔人逐渐抛弃了他们作为西班牙人的文化认同，转而以墨西哥人的身份自居，开始将半岛人视作各种压迫的源头。与此同时，西班牙王室因连年战事积累了高额债务，只好在1798年颁布了《债券法令(*decreto de consolidación de vales reales*)》，要求地方政府没收并拍卖辖区内的教会产业，再用得来的款项填补债务亏空。该法令在本土推行时没有受什么阻力——本土的教会产业大多是经营不善的田地，正好可以卖给积极性高的农民和商人；但是，当王室在1804年将法令推广至殖民地时却出了大问题。由于殖民地缺乏完善的金融体系，当地教会通常担负起了为居民提供贷款的责任。用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大卫·布雷丁(David Brading)的话来讲：

[新西班牙的各种民间开支，]不论是因为收成不好、遭遇旱灾、进行矿业或商业投资、支付女儿的嫁妆或儿子的年金，还是仅仅由于花钱大手大脚，都常由抵押贷款承担。这种贷款的期限一般是五年，但几乎总是会无限期地延迟下去。

因此，在《债券法令》颁布的前夕，新西班牙的各个阶层都欠教会不少钱，而教会也持有大量证明这些贷款关系的票据。这样的债权关系在乡下和中产阶级间更加普遍——比起来钱更快的城市商业阶层或口袋满满的上层贵族，从事农业的克里奥尔人很难抛弃教会的贷款服务。根据一份1790年的政府报告，丘鲁拉(Cholula)农业区的五十多座庄园所欠的款项达到了它们本身价值的70%。这其实不算太严重的问题——新西班牙的教会并不是多严厉的债主：它们一般只从借款人处按年收取租金，而且由于地价被欠款拉低了，更多的中小农民也有机会从教会手里购得自己的田产。可是《债券法令》打破了这一平衡：殖民政府收缴了教会的抵押票据，而许多债务人也被迫一次性付清所有欠款，极大打击了新西班牙的生产活动，直接导致了1808年到1810年间的经济危机。这一危机，加上1809年农作物的大面积欠收、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本土所造成的政治混乱，以及伊达戈尔所起的表率，激发了接下来十年中一批又一批革命者举起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大旗。



而墨西哥的革命战争也影响到了圣何塞传教所的日常生活。我们之前提到了传教所的经济发展和基础手工业的出现，但传教士和生徒们仍然要靠墨西哥的工场与教会机构提供消费品、书籍、机器和金银，同时将传教所在交易中赚到的现钱送回总部保管或投资。这种双向运输一般会交给往返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货船或军舰，而运输途中最重要的节点就是位于墨西哥西海岸中部的圣布拉斯(San Blas)军港。这座港口由加尔韦兹——前文中出现过的殖民地最高监察官——在1768年左右建立，目的就是去保障西班牙对上加利福尼亚地区的控制与补给。而在1810年伊达戈尔起义后不久，一支革命军分队就攻占了军港附近的卡斯蒂罗(El Castillo)兵营，严重扰乱了船运线路。我们也可以推断圣布拉斯的陷落一度切断了圣何塞和墨西哥之间的联络，因为杜兰神父直到第二年年中才听说此事。他在1811年9月30日的信件里抱怨道：

我们才刚收到[传教所财政官]阁下您今年2月27日发出的信件，读到了您关于领地内糟糕情势的描述和对传教所未来困难的担忧……既然圣布拉斯已落入叛军之手，我们估计上次船运[回墨西哥]的888比索、油壶和一尊大钟都必遭了损失。

两个月后他又追加了一封急信，在催促墨西哥方面保障后勤的同时提到：

我们[自上次起]再未收到[墨西哥]本土来信，天知道到底情况有何变化。

也正是从这时候起，杜兰神父的信件中首次出现了西班牙船舰的名字。在1811年之前他也常提到海运问题，但从未确切说明船只的型号或名称——这一方面说明那时候船运不太需要他操心，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存在约定俗成的路线和承运人。但是，圣布拉斯港口的失陷和此起彼伏的独立斗争为海上运输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也逼着神父改变惯常的安排。比方说，在9月30日的信里他提到自己把传教所积累的一批农产卖给了“墨西哥人号(El Mexicano)”双桅帆船的船长何塞·德·阿赛(José de Arce)，还特别注明其目的地不再是阿赛的老家圣布拉斯，而是仍在西班牙控制下的商港阿卡普尔科(Acapulco)。三个月后这笔钱顺利送到了墨西哥城的方济各会学院手中，但由于革命导致的社会动荡，杜兰神父直到两年后的1813年8月还在怀疑阿赛船长私吞了传教所的辛苦钱。

与此同时，我们也能从杜兰的信里一窥墨西哥独立战事的进展。直到1813年中旬，墨西哥的革命似乎还没有对圣何塞造成太严重的困难：神父和商人们虽然有些措手不及，但很快恢复了一部分海运能力，就连杜兰觉得“必遭了损失”的888比索和油壶实际上也在叛军手中幸存。革命者似乎也没把圣布拉斯搅个天翻地覆——阿赛船长在当年8月前就回到了老家继续船运生意，而传教士在当地的代表泽斯塔夫(Zestafe)修士也得以不受阻碍地处理各种买卖。在8月19日的信件中，杜兰甚至提到了一位刚从阿卡普尔科抵达湾区的欧利瓦(Oliva)神父。我们不知道他离开阿卡普尔科的具体日期，但这座港口早在当年四月就落入了革命军队手中；因此，欧利瓦的顺利旅程也许说明当时的风云变幻还是相对平缓的，而战争也没有完全摧毁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脆弱的联系。

然而，在那之后墨西哥城的传教所总部陷入了整整三年的沉寂，直到1816年6月才发出了下一封通信。我们不知道这一现象的确切原因——也许财政官的信件从未送达，又或者墨西哥的混乱导致方济各会无暇顾及加利福尼亚的前哨；无论如何，1813到1816年间的革命战争显然达到了新的高度。然而，随着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何塞·莫雷洛斯(José Morelos)在1815年年底被俘，墨西哥的独立战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陷入了胶着——叛军的大部分活动被限制在墨西哥南部的乡村，而海上

运输也有了起色。自革命爆发以来第一回，杜兰神父在1816年11月左右收到了方济各会发来的五箱“官方补给”。尽管这些补给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颇堪忧——“其中没有包括布料和衣裤等需求最大的物件…而且缺了十一把斧头和一把镐子”——但神父也承认“这些问题是我们这个混乱时代所不可避免的”。不过这一稳定趋势并未持续多久。尽管革命活动暂时遭到了抑制，墨西哥城对加利福尼亚的控制已经松垮到了极限。杜兰在1817年10月15日的信件中告诉他的上级：

[上加利福尼亚]总督在文图拉召开了一场会议，在会上提出了些绝顶荒唐的意见。我获得的信息不太全面，但他好像表示说[加利福尼亚境内]四座要塞的餉钱今后都得由本省内部提供，以此减少王室财政的压力。换言之，从今往后我们传教所每年得多花十万比索[供给士兵]。真极荒谬！

显然那时西班牙的统治已经极不得人心，就连杜兰神父也在试探性地考虑和王室官员划清界限：

我们传教士从未拒绝[为西班牙]作牺牲，唯一有所顾虑的只是生徒的境遇。他们正逐渐认识到世上只有独一真神和独一王权，因此实际上更像地方附庸(vassal)。因此，如果现任总督在执行上述政策时遇到阻力也是自作自受，因为他背离了前任总督们有礼有节、小心谨慎的作风，遇事不是商量协调，而是喜欢发号施令。

到了1820年，西班牙国内的局势一下子发生了重大改变。要了解这一改变，我们必须回到1810年。我们之前提到了拿破仑在1808年对西班牙的入侵——尽管西班牙王室自愿向法国臣服，其人民和军队很快掀起了反抗法国统治的暴动，终于在1810年解放了重要港口加的斯(Cádiz)并重新拥立了前国王费尔南多七世(Ferdinand VII)。趁着王室虚弱，领导革命政府的进步派人士在1812年颁布了第一部西班牙宪法，对君主的各项权利进行了限制。不过，随着法国在1814年撤军，费尔南多得以全心投入到国内权力斗争中，很快废除了宪法，又回到了从前说一不二的位置上。这一举动极大激怒了国内的自由主义者，直接导致了1820年革命的爆发。真不巧的是，西班牙在美洲的连连败退也严重打击了军队的士气，更让被征召去新大陆镇压叛乱的士兵生出了不满之心。于是，在里耶哥(Rafael Riego)等军官的领导下，革命政府很快将费尔南多逮捕下狱、确认宪法仍然有效，而向墨西哥派兵的计划也被无限期推迟了。



这场革命对墨西哥历史的影响怎么说也不为过。首先，原本该前往美洲的一万四千余名精锐士兵得以留在国内，导致驻扎在殖民地的西班牙部队数量严重不足；其次，革命政府不那么重视西班牙的庞大殖民帝国，因此在情感上并不太介意墨西哥独立；最后，自由主义革命的成功让殖民地的保守军方领袖极不满意，更让几位手握重兵的军官投靠到了革命者一方，希望墨西哥可以和激进的西班牙新政府“割席”。这些军人中最主要的一位是阿古斯丁·伊图尔维德(Agustín Iturbide)上校——他来自一个显要的贵族家庭，因此希望在墨西哥保留贵族统治的“优良传统”，也希望自己

能在如此混乱局势中分一杯羹。在1821年2月24日颁布的《伊瓜拉计划书(Plan of Iguala)》中，伊图尔维德也丝毫没有掩盖自己的政治目标。他先宣布新西班牙仅认可罗马天主教，又装模作样地表示“其皇帝将由费尔南多七世…或其他受国会认可的皇室宗亲担任”，而“在皇室讨论该问题期间，该计划的维持将由军政委员会负责”——毫无疑问，上校本人就是该委员会的重要一员。终于，他的野心在计划书的第八条完全显露了出来：

如果费尔南多七世阁下认为自己不必要来墨西哥[接受帝位]，军政委员会或摄政会议将以他的名义治理本国，直到皇帝人选问题得到解决。



为了获得中下层革命者的支持，伊图尔维德也在计划书里扔了些甜枣——第十二条保证所有居民，“无论是欧洲人、非洲人还是印第安人”，都能获得相同的就业机会；第十三条承诺保护私有财产；而第十六条则建立了所谓“三诺军(Army of the Three Guarantees)”，宣誓保护天主教会、国家独立与内部和平，他则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该军的总司令。有了这些专业军人的加入，墨西哥革命部队在1820到1821年间有了质的飞跃，而仍忠于西班牙的殖民地官员则由于缺乏援兵而毫无还手之力。终于，灰心丧气的末任新西班牙副王多诺伦(Juan O'Donojú)在1821年8月24日与伊图尔维德签订了《科尔多瓦条约(Treaty of Córdoba)》，不太情愿地承认了“墨西哥帝国(Mexican Empire)”的独立。三诺军在一个多月后的9月27日开进了墨西哥城，正式接管了这座新西班牙的最大都市。第二天，军政委员会的要员们在副王的官邸内写下了墨西哥独立的宣言，又选出了摄政会议的五位成员。不出意外，伊图尔维德不仅名列其中，其签名也排在了宣言书上的第一位。

杜兰神父和他的同事们很晚才听说这几件事。由于路途遥远、通信不便，他们在1821年3月才刚刚按照副王的指令向《1812年宪法》宣誓效忠，而对伊图尔维德组织的“第一届国会议程全然不知”。但这并没有阻止神父们对政治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当月的一封长信里，杜兰忧心忡忡地写道：

现在我们间流传着各种猜测。有些人担心管理印第安人的职责将被交给其他机构，而勤勤恳恳的传教士们则会连肚子都填不饱。有些人怀疑新政府会赋予印第安人以完全自由，但认为他们不仅还不适于获得这般自由，甚至可能永不会达到此番进步——除非我们在已有传教所的基础上再行扩张。还有些人相信传教所会被重担压垮，因为新政府会要求我们用自己的收入维持本省运作，而意识不到就连传教所自身的存续也…完全系于传教士的勤俭劳苦。到头来，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只能…希望上帝引导事物向好，不要让世人无缘无故的名利心将过去五十年的血汗在一个日夜间化为乌有…

很不幸，传教所接下来三十年的历史将杜兰神父的担忧化作了现实。

所引材料

1-1 旧金山湾的形成和古生物群系

- Artz, Matthew. "Fremont to buy land where boys once dug up fossils," *East Bay Times*, 15 Feb. 2009. <https://www.eastbaytimes.com/2009/02/15/fremont-to-buy-land-where-boys-once-dug-up-fossils/>. Accessed 3 Sep. 2022.
- Boy Paleontologists*. Washington Township Museum of Local History. <https://museumoflocalhistory.org/exhibits/exhibit-boy-paleontologists/>. Accessed 26 Aug. 2022.
- Camp, Charles L. "Lorenzo Gordin Yates (1837-1909),"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Bibliography of Natural History*, vol. IV, no. 3, pp. 178-193.
- Children'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Children'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https://cnhm.msnuceus.org/information.html>. Accessed 2 Sep. 2022.
- Day, Dan. *Fremont's Hidden Geology*. Northern California Geological Society, March 2005. <https://www.ncgeol.org/past-field-trips/fremonts-hidden-geology/>. Accessed 26 Aug. 2022.
- "Fossils of Fremont." Math Science Nucleus.
- Gordon, Phil E. "Irvington Fossils - Background Information," Children'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7 Dec. 2004. <https://cnhm.msnuceus.org/information/boyindex.htm>. Accessed 2 Sep. 2022.
- Gordon, Wesley. "Wesley Gordon, 1975-10-25." Lecture recording created by Philip Holmes, Washington Township Museum of Local History (25 Oct. 1975), available via California Revealed. <https://californiarevealed.org/islandora/object/cavpp%3A12892>. Accessed 28 Aug. 2022.
- Gordon, Wesley. "Wesley Gordon, 1976-10-07." Lecture recording created by Philip Holmes, Washington Township Museum of Local History (7 Oct. 1976), available via California Revealed. <https://californiarevealed.org/islandora/object/cavpp%3A12880>. Accessed 28 Aug. 2022.
- MacStay, Ester. "Wesley Dexter Gordon Sr," Children'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https://cnhm.msnuceus.org/wesgordon.html>. Accessed 28 Aug. 2022.
- Mann, Lori. "The Formation of San Francisco Bay," Saving the Bay - The Story of San Francisco Bay. KQED Education.
- Sanders, Robert. "Don Savage, expert on mammalian evolution and former chair of paleontology at UC Berkeley, has died at 8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pr. 8, 1999). <https://www.berkeley.edu/news/media/releases/99legacy/4-8-1999.html>. Accessed 28 Aug. 2022.
- "The Hayward Fault," Berkeley Seismology Lab,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https://seismo.berkeley.edu/hayward/index.html>. Accessed 26 Aug. 2022.
- 一系列由俄文顿居民托马斯·格雷(Thomas M. Gray)在1957年年中寄送或接收的相关信件共5份，由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网上图书馆(National Park Service History eLibrary)收藏，具体如下：
- Miller, George P. *Letter to Mr. Thomas M. Gray*. 3 June 1957.
- Gray, Thomas M. *Letter to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7 June 1957.
- Thompson, Ben H. *Letter to Mr. Thomas M. Gray*. 26 June 1957.
- Maier, Herbert. *Letter to Mr. Thomas M. Gray*. 8 July 1957.
- Gray, Thomas M. *Letter to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10 July 1957.
- 一些由佛利蒙儿童自然科学博物馆提供或展示的材料，包括报纸剪贴。这些材料如下：
- Cunningham, Laura. "Irvingtonian Landscape (Details) 1 Million years ago." Recorded 30 Aug. 2022.
- Demoro, Harre. "Freeway to Erase Source of Fossils," *Oakland Tribune*, 8 Mar. 1966.
- "Fossil Deposit Value Attested," *Oakland Tribune*, 9 Mar. 1957.
- "Fossil Remains of a Mastodon Found in California," *The New York Times*, 17 July 1871.
- Fossils from Caltrans 680 Project*. Recorded 30 Aug. 2022.
- Fossils May Tell New Story*. Recorded 30 Aug. 2022.
- "Fremont Council Okays Freeway Route Plan 4-1," *The Daily Review*, 13 Mar. 1957.
- Glenister, Chase & James P. Walker. *New Rancholabrean mammal fossil site from Warm Springs District, Fremont, California*. Recorded 30 Aug. 2022.
- Johnson, Bob. "How Irvington Fossil Pit, New Road Site, Won Fame," *Mercury News*, March 1957.

“Mammoth Tusk Dug Out of Pit,” *The Daily Review*, 14 June 1957.
 “Mission Chamber Backs State Route,” *Oakland Tribune*, 12 Mar. 1957.
 Rose, Jon. “Year’s 1965 B.F. (Before Freeway) For Fossil Hunt,” *San Jose Mercury*, 27. Sep. 1965.
 Taylor, Flo. “Letter May Rescue Site Of Fossils,” *The Daily Review*, 5 Mar. 1957.
 Williamson, Gladys. “State May Help Save Fossil Bed,” *The Daily Review*, 4 Mar. 1957.

1-2 最早来到湾区的人类

Ainsworth, Diane. “San Francisco Bay: a 5,000-year perspective on the hum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ba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mpus News, 13 June 2002. https://www.berkeley.edu/news/media/releases/2002/06/13_sfbay.html. Accessed 3 Sep. 2022.

“Bread from Acorns, featuring Maggie, *née* Tra-Bu-Ce,” Standard Bell & Howell Company, 1933. *Youtube*, uploaded by A/V Geeks, 11 Feb.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4-F5N63Cdo/>. Accessed 20 Sep. 2022.

Brekke, Dan. “Uncovering the Real Story Behind the ‘East Bay Mystery Walls’,” KQED, 31 Aug. 2018. <https://www.kqed.org/news/11689504/uncovering-the-real-story-behind-the-mysterious-east-bay-walls>. Accessed 9 Sep. 2022.

Coyote Hills Shellmound ALA 329. The Megalith Portal, 14 March 2010. <https://www.megalithic.co.uk/article.php?sid=25143>. Accessed 22 Sep. 2022.

Chronological and Cultural Units: A Glossary of Proper Names in California Prehistory. Society for California Archaeology. <https://scahome.org/public-resources/glossary-of-terms/chronological-and-cultural-units/>. Accessed 17 Sep. 2022.

Hodge, Katherine. “Shelters in the Ground,” Project Archaeology. <https://projectarchaeology.org/2020/05/22/shelters-in-the-ground/>. Accessed 19 Sep. 2022.

How Did Mammoths Scratch Their Backs? Children’s Discovery Museum of San Jose. <https://www.cdm.org/mammothdiscovery/backscratcher.html>. Accessed 8 Sep. 2022.

Klivans, Laura. “There Were Once More Than 425 Shellmounds in the Bay Area. Where Did They Go?” KQED, 24 March 2022. <https://www.kqed.org/news/11704679/there-were-once-more-than-425-shellmounds-in-the-bay-area-where-did-they-go>. Accessed 22 Sep. 2022.

Leventhal, Alan M. *A Reinterpretation of Some Bay Area Shellmound Sites: A View from the Mortuary Complex from CA-ALA-329, The Ryan Mound*, published by the Muwekma Ohlone Tribe, 1993.

“Leventhal, Alan M.” San José State University, <https://www.sjsu.edu/people/alan.leventhal/>. Accessed 21 Sep. 2022.

Mason, J. Alden. “Nels Christian Nelson, 1875-1964,” *American Antiquity*, vol. 31, no. 3, part 1 (Jan. 1966), pp. 393-397.

Meyer, Jack & Jeffrey S. Rosenthal. *Archaeological and Geo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at Eight Prehistoric Sites in the Los Vaqueros Reservoir Area, Contra Costa County, California*. Sonoma State University Academic Foundation, Inc.,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Center (Dec. 1997), pp.IV52.

Nabokov, Peter & Robert Easton. *Native American Architec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9).

Nelson, N. C. “Shellmounds of the San Francisco Bay Reg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graphy*, vol. 7, no. 4 (Dec. 1909), pp. 310-348.

Parkman, Breck E. “Rubbing Rocks, Vernal Pools, and the First Californians: Pursuing the RanchoLabrean Hypothesis,”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Parks and Recreation. https://www.parks.ca.gov/?page_id=23566. Accessed 8 Sep. 2022.

Scott, Beatrice Berman (ed.). *Genealogy of the Coffinberry Family* (Inglewood CA, 1927, 1952).

Sher, Sandra. *The Native Legacy of Emeryville*. Emeryville Historical Societ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96. <https://emeryvillehistorical.org/native-early-history/the-native-legacy-of-emeryville/>. Accessed 19 Sep. 2022.

Skowronik, Russell K et al. *Rediscovering the Ceramic History of the California Frontier*. Ceramics in America 2015, Chipstone Foundation, 2015. <https://www.chipstone.org/article.php/719/Ceramics-in-America-2015/Rediscovering-the-Ceramic-History-of-the-California-Frontier>. Accessed 18 Sep. 2022.

“The Tuibun of Coyote Hills (Part 1),” *Nature Outside*, 9 Aug. 2016. <https://www.natureoutside.com/the-tuibun-of-coyote-hills-part-1/>. Accessed 19 Sep. 2022.

Ziesing, Grace H et al. *From Rancho to Reservoir: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the Los Vaqueros Watershed, California*. Sonoma State University Academic Foundation, Inc.,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Center, 1997.

和北美原住民冶金相关的材料参见：

Bebber, Michelle et al. “The exceptional abandonment of metal tools by North American hunter-gatherers, 3000 B.P.,” *Scientific Reports*, vol. 9, no. 5756 (2019),

Cooper, H. Kory. “Innovation and Prestige Among Northern Hunter-Gatherers: Late Prehistoric Native Copper Use in Alaska and Yukon,” *American Antiquity*, vol. 77, no. 3 (July 2012), pp. 565-590.

“How prehistoric Native Americans of Cahokia made copper artifacts,” *Science Daily*, 13 June 2011.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1/06/110613151714.htm>. Accessed 18 Sep. 2022.

Mendoza, Ruben G. “Metallurgy in Meso and North America,” in Helaine Selin (ed.), *Encyclopaedia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Non-Western Culture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1997), pp. 730-733.

一些和沉子有关的参考图片和资料参见：

Binus, Joshua. *Sinker Stone, Columbia River*. The Oregon History Project, 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 2004. <https://www.oregonhistoryproject.org/articles/historical-records/sinker-stone-columbia-river/#.YyahrOzML7E>. Accessed 17 Sep. 2022.

1991.051.1 *Grooved Sinker Stone*. North Lincoln County Historical Museum. <https://northlincolncountyhistoricalmuseum.org/sinker/>. Accessed 17 Sep. 2022.

原住民土屋的图片来自下文，原出处不明。

Hammond, Joanne. “Dig It: There’s no place like a (pit)home,” *Kamloops This Week*, 5 Dec. 2018. <https://www.kamloopsthisweek.com/community/dig-it-theres-no-place-like-a-pithome-4374729>. Accessed 19 Sep. 2022.

关于湾区贝丘的具体考察报告，见：

Uhle, Max. “The Emeryville Shellmou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vol. 7, no. 1 (1907), pp. 1-84.

1-3 加利福尼亚的“中晚期过渡”

Brenner, Mark et al. “Possible role of climate in the collapse of Classic Maya civilization,” *Nature*, vol. 375 (June 1995), pp. 391-394.

Chronological and Cultural Units: A Glossary of Proper Names in California Prehistory. Society for California Archaeology. <https://scahome.org/public-resources/glossary-of-terms/chronological-and-cultural-units/>. Accessed 22 Sep. 2022.

“Chumash Indians Were Using Shell Bead Money 2,000 Years Ago,” *SCI News*, 29 Jan. 2021. <https://www.sci.news/archaeology/chumash-money-09303.html>. Accessed 24 Sep. 2022.

Claassen, Cheryl. “Shell Symbolism in Pre-Columbian North America,” in Antczak, Andrzej & Roberto Cipriani (ed.), *Early Human Impact on Megamolluscs*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Oxford, 2008), pp. 231-236.

Codding, Brian E. & Terry L. Jones. “History and Behavioral Ecology during the Middle-Late Transition on the Central California Coast: Findings from the Coon Creek Site (CA-SLO-9), San Luis Obispo County,” *Journal of California and Great Basin Anthropology*, vol. 27, no. 2 (2007), pp. 125-151.

Colten, Roger H. “Faunal Exploitation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Period Transition on Santa Cruz Island, California,” *Journal of California and Great Basin Anthropology*, vol. 17, no. 1 (1995), pp. 93-120.

D’Oro, Stella. “Native Californian Prehistory and Climate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Master’s Thesis,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2009.

Easterbrook, Don J. “Geological Evidence of Recurring Climate Cycl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Caus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s—The Past is the Key to the Future,” in *Evidence-Based Climate Science* (2011).

- Gamble, Lynn H.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Origin of the Plank Canoe in North America," *American Antiquity*, vol. 67, no. 2 (2002), pp. 301-315.
- Glassow, Michael A. & Teresa L. Gregory. "A Terminal Middle Period Site Near Purisima Point, Western Santa Barbara County, California," *Journal of California and Great Basin Anthropology*, vol. 22, no. 1 (2000), pp. 133-150.
- Gleaton, Robert S. "Geo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at a Stage Mound (CA-CCO-297), a Late Period Shellmound: A Study of Archaeological Site Formation and Paleoenvironment Reconstruction along the San Francisco Bay Estuary, California," Master's Thesis, Sonoma State University, 2015.
- Lentz, Kari. "Flaked and Ground Stone Technology at CA-ALA-554: Mortar Bowls and Stockton Points," *SCA Proceedings*, vol. 26 (2012), pp. 192-211.
- Lüning, Sebastian et al. "Warming and Cooling: The Medieval Climate Anomaly in Africa and Arabia," *Paleoceanography and Paleoclimatology*, vol. 32, issue 11 (Nov. 2017), pp. 1219-1235.
- Malamud-Roam, Frances P., et al. "Holocene paleoclimate records from a large California estuarine system and its watershed region: linking watershed climate and bay conditions,"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vol. 25 (2006), pp. 1570-1598.
- MacEwen, Patricia. "Biological distance in prehistoric populations of Central California: evidence of the Megan's Intrusion," Master's Thesis,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cramento, 2013.
- Richardson, B. Gill et al. "Drought and the Maya Collapse," *Ancient Mesoamerica*, vol. 18 (2007), pp. 283-302.
- Rick, Torben C. *The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Ecology of Late Holocene San Miguel Island*, as Arnold, Jeanne E. (ed.) *Perspectives in California Archaeology, Volume 8*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07).
- Saltré, Frédérik & Corey J. A. Bradshaw. "Climate explained: what was the Medieval warm period?" The Conversation, 20 Apr. 2021. <https://theconversation.com/climate-explained-what-was-the-medieval-warm-period-155294>. Accessed 24 Sep. 2022.
- Tushingham, Shannon & Colin Christiansen. "Native American Fisheries of the Northwestern California and Southwestern Oregon Coast: A Synthesis of Fish-Bone Data and Implications for Late Holocene Storage and Socio-Economic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California and Great Basin Anthropology*, vol. 35, no. 2 (2015), pp. 189-215.
- "What is upwelling?" U.S.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Ocean Service, 9 Sep. 2022. <https://oceanservice.noaa.gov/facts/upwelling.html>. Accessed 25 Sep. 2022.
- "卷圈"篮子的图片来自:
- Marks, Ben. "How Railroad Tourism Created the Craze for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Baskets," *Collectors Weekly*, 1 July 2014. <https://www.collectorsweekly.com/articles/the-craze-for-traditional-native-american-baskets/>. Accessed 23 Sep. 2022.
- 不同橄榄贝饰品的比较图来自:
- Bennyhoff, J. & R. Hughes. "Shell bead and ornament exchange networks between California and the Western Great Basin," *Anthrop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vol. 64: part 2 (New York, 1987), pp. 80-175.
- 两面石鏢和石制箭头非常直观的比较图来自:
- Denoyer, Allen. "My Flintknapping Problem," *Archaeology Southwest*, 17 Dec. 2015. <https://www.archaeologysouthwest.org/2015/12/17/my-flintknapping-problem/>. Accessed 25 Sep. 2022.

1-4 奥隆尼民族的形成

- "A Watershed Approach to Fire, Floods, and Drought," *Sustainable Conservation*, 2 June 2022. <https://suscon.org/blog/2022/06/climate-resilience-webinar-3/>. Accessed 29 Sep. 2022.
- Bacich, Damian. "Native Americans of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The Ohlone Tribe, Part 1," *The California Frontier Project*. https://www.californiafrontier.net/ohlone-tribe-language-food-clothing/#Ohlone_Houses. Accessed 27 Sep. 2022.
- Bean, Lowell John. "California Indian,"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California-Indian>. Accessed 27 Sep. 2022.

- Brother, Rosemary Ellen. "Retracing the Penutian Expansion: Using Visual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Research to Map Changes in California Native American Basketry," Master's Thesis,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cramento, Fall 2019.
- "California Indian Languages," AAA Native Arts, <https://www.aaanativearts.com/california-indian-languages>. Accessed 27 Sep. 2022.
- Callaghan, Catherine. *Proto Utian Grammar and Dictionary*, as *Trends in Linguistics Documentation, Volume 31* (De Gruyter Mouton, 2014).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276770>.
- "Distinguished Expert J. Fernando Niebla," California Council on Science & Technology. <https://ccst.us/people/distinguished-experts/j-fernando-niebla/>. Accessed 28 Sep. 2022.
- Golla, Victor. *California India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 Hunn, Eugene S. "Review of Linguistic Information," Chapter 4 in *Cultural Affiliation Report* (Archaeology of Kennewick Ma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Park Service, 2000).
- "INFOTEC Development, Incorporated," Open Corporates, https://opencorporates.com/companies/us_ca/C0897297. Accessed 28 Sep. 2022.
- "Ken Whistler," The Org. <https://theorg.com/org/unicode-consortium/org-chart/ken-whistler>. Accessed 29 Sep. 2022.
- "Michael J. Moratto," The Digital Archaeological Record. <https://core.tdar.org/browse/creators/8498/michael-j-moratto>. Accessed 28 Sep. 2022.
- Milliken, Randall et al. *Ohlone/Costanoan Indians of the San Francisco Peninsula and their Neighbors, Yesterday and Today*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Consultants: Oakland, CA, June 2009).
- Mithun, Marianne & Lyle Campbell.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Encarta Encyclopedia (1998). <http://mithun.faculty.linguistics.ucsb.edu/pdfs/1998%20Nat%20Am%20Lgs%20Encarta.pdf>. Accessed 27 Sep. 2022.
- Moratto, Michael J. et al. *California Archaeology* (Academic Press, 1984).
- Native Peoples of the East Bay: Past to Present*. East Bay Regional Park District, 2018.
- "Ohlone." *Merriam-Webster*,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Ohlone>. Accessed 27 Sep. 2022.
- Tarpe, Marie-Lucie. "A Pan-Penutian Database of Materials for Comparison and Reconstruction: Its Organization, Uses and Current Results," in *Publications of the Survey of California and Other India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2), pp. 119-136.

1-5 奥隆尼人的生活方式：政治和社会组织

- "American Indian Social Structur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Service. https://www.nrcs.usda.gov/Internet/FSE_DOCUMENTS/nrcs141p2_023458.pdf.
- Arellano, Monica V. et al. "An Ethnohistory of Santa Clara Valley and Adjacent Regions; Historic Ties of the Muwekma Ohlone Tribe of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and Tribal Stewardship over the Tuipun Táareštak [Place of the Fox Man] Site: CA-SCL-894," The Muwekma Ohlone Tribe, 2014.
- Cambra, Rosemary. "The Muwekma Ohlone Tribe," The Muwekma Ohlone Tribe, 2011.
- Cartier, Robert. "An Overview of Ohlone Culture," Santa Cruz Public Libraries Local History Collection.
- Frazer, James.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Penguin Books: London, 1996).
- James, Steven R. & Suzanne Graziani. "California Indian Warfare," *Contribution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Faculty*, no. 23 (May 1975), pp. 49-109.
- Johnson, John R. "Randall Theodore Milliken (1946-2018)," *California Archaeology*, vol. 10, no. 1 (2018), pp. 121-128.
- Lee, Wayne E. "Peace Chiefs and Blood Revenge: Patterns of Restraint in Native American Warfare, 1500-1800,"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71, no. 3 (July 2007), pp. 701-741.
- Leventhal, Alan et al. "The Ohlone Back From Extinction," in Bean, Lowell John (ed.), *The Ohlone Past and Present: Native Americans of the San Francisco Bay Region* (Ballena, 1994), pp. 297-336.
- Margolin, Malcolm. *The Ohlone Way: Indian Life in the San Francisco-Monterey Bay Area* (Heyday Books: Berkeley, CA, 1978).
- Milliken, Randall et al. *Ohlone/Costanoan Indians of the San Francisco Peninsula and their Neighbors, Yesterday and Today*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Consultants: Oakland, CA, June 2009).

- Peebles, Christopher S. & Susan M. Kus. "Some Archaeological Correlates of Ranked Societies," *American Antiquity*, vol. 42, no. 3 (July 1977), pp. 421-448.
- Salokoski, Märta. *How Kings Are Made - How Kingship Changes: A Study of rituals and ritual change in pre-colonial and colonial Owamboland, Namibia*. Research Series in Anthropology (Helsinki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Helsinki, 2006).
- Simonse, Simon. "Tragedy, Ritual and Power in Nilotic Regicide: The regicidal dramas of the Eastern Nilotes of Sud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Declan Quigley (ed.), *The Character of Kingship* (Routledge: London, 2005), 34 pages.
- "The Aramai," The Association of Ramaytush Ohlone. <https://www.ramaytush.org/the-aramai.html>. Accessed 1 Oct. 2022.
- 两幅奥隆尼人贵族男子的图片由路易·科里斯(Louis Choris)在1816年绘制，其中三人组的绘画被描述为“穿戴王家礼典服饰(regalia)”的奥隆尼族男子。图片有多个网上来源，其中一处如下：“Tribal Leaders,” Costanoan Rumsen Carmel Tribe. <https://www.costanoanrumsen.org/tribal-leaders.html>. Accessed 30 Sep. 2022.
- 持弓箭的奥隆尼人图片来源如下；最初来源不明：“Native Americans of Carmel Valley,” Carmel Mission, <http://mission-carmel-isheeta.weebly.com/history.html>. Accessed 30 Sep. 2022.

1-6 奥隆尼人的生活方式：宗教和神话体系

- "A Muwekma Ohlone Chochenyo Song by Jose Guzman," c. 1934. *Youtube*, uploaded by Muwekma Ohlone Tribe of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Official), 2 Mar. 20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SSzuVYoMOE>. Accessed 3 Oct. 2022.
- Buck, Christopher & Kevin Locke. "Kuksu and Marumda: What Defines an Indigenous Holy Messenger?" *Bahai Teachings*, 15 Feb. 2022. <https://bahaiteachings.org/kuksu-and-marumda-what-defines-an-indigenous-holy-messenger/>. Accessed 2 Oct. 2022.
- De Angulo, Jaime.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ligious Feeling in a Primitive Trib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28, no. 2 (April 1926), pp. 352-360.
- Dees, Sarah E.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in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Feb. 2018).
- "Eagle, Hummingbird and Coyote: An Ohlone Creation Myth," Multo (Ghost), 29 June 2016. <https://multoghost.wordpress.com/2016/06/29/eagle-hummingbird-and-coyote-an-ohlone-creation-myth/>. Accessed 5 Oct. 2022.
- "Edwin Meyer Loeb: 1894 - 1966," *publication unknow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p. 54-66.
- Freeland, L. S. "Pomo Doctors and Poisone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vol. 20 (1923), pp. 57-73.
- H. B. D. "Tradition of the California Indians," *Hesperian Magazine*, vol. 2-3 (ed. F. H. Day, *San Francisco*, vol. III, no. 1, Sep. 1859), pp. 326.
- Harper, Daniel. "Creation myth of northern Ohlone (Coastanoan) Indians," *Yet Another Unitarian Universalist*, vol. 1, 11 Feb. 2010. <https://www.danielharper.org/blog/?p=6348>. Accessed 5 Oct. 2022.
- Hedges, Alicia A. "Recognition Through Remembrance: A Consideration of Muwekma Ohlone Oral Histories with Kuksu-Associated Material Culture to Infer Precolonial Connections to Place," Master's Thesis, San José State University, May 2019.
- Jones, Barbara Lee. "Mythic Implications of Faunal Assemblages from Three Ohlone Sites," Master's Thesis,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Jan. 2010.
- Jones, Doug. "Ritual and Religion in the Ohlone Cultural Area of Central California," Master's Thesis,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Fall 2015.
- Kroeber, A. L. *Handbook of the Indians of California*.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Bulletin 78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1925). See Chapter 24.
- Kroeber, A. L. "Indian Myths of South Central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vol. 4, no. 4 (1907), pp. 168-251.

Kroeber, A. L. "Principal Local Types of the Kuksu Cult," in Heizer, R. F. & M. A. Whipple (ed.), *The California Indians: A Source Boo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 485-495.

Loeb, E. M. "The Western Kuksu Cul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graphy*, vol. 39, no. 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32), pp. 1-137.

"Ohlone Coyote Stories," Native Languages. <http://www.native-languages.org/ohlonestory.htm>. Accessed 5 Oct. 2022.

"Papers of John Peabody Harrington, 1907-1957," National Archives, <https://www.archives.gov/nhprc/projects/catalog/john-peabody-harrington>. Accessed 3 Oct. 2022.

库科苏崇拜的分布图摘自：

Loeb, E. M. "The Eastern Kuksu Cul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vol. 33, no. 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33), pp. 139-232.

波莫人的仪式性头饰图片摘自：

Moratto, Michael J. et al. *California Archaeology* (Academic Press, 1984).

库科苏入社礼的绘画为：

Painting by Mort Kunsler, "Kuksu Ceremony of the Pomo", photogallery of FirstPeople.us, 摘自 Stuart, David. "Deep History of the Delta," *Soundings Journal*, 24 Oct. 2020. <https://soundingsmag.net/2020/10/24/deep-history-of-the-delta/>. Accessed 4 Oct. 2022.

其他图片来自：

"A Native Land: Oakland Pre-1852," The Planning History of Oakland, CA. <https://oaklandplanninghistory.weebly.com/early-history.html>. Accessed 5 Oct. 2022.

Heizer, Robert F. & A. B. Elsasser. *Archaeology of HUM-67, the Gunther Island Site in Humboldt Bay, California* (Coyote Press, 1964), 162 pages.

"Ideas and stimulus for making the show:" The Bear, 6 Mar. 2013. <http://bearwhodunnit.blogspot.com/2013/03/ideas-and-stimulus-for-making-show.html>. Accessed 6 Oct. 2022.

"Man of the Ohlone or Costanoan people dancing at Mission San Francisco," Alamy, 28 July 2020.

一部1964年的黑白影片记录了一场波莫人“视梦医”的治疗活动，似乎是一个较现代的变种。它记录了“西南波莫族卡西亚(Kashia)部落中一场治病典礼的第二晚，也是最后一晚的完整情形”。片中的萨满正处在催眠状态(hyptonic trance)以寻找疼痛的源头并从体内移除病菌：

Sucking Doct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Extension Media Center, 1964, uploaded to Internet Archive on 20 Apr. 2017. <https://archive.org/details/suckingdoctor#reviews>. Accessed 6 Oct. 2022.

1-7 奥隆尼人的生活方式：经济和日常活动

Bacich, Damian. "Native Americans of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The Ohlone Tribe, Part 1," The California Frontier Project. https://www.californiafrontier.net/ohlone-tribe-language-food-clothing/#Ohlone_Houses. Accessed 10 Oct. 2022.

Bacich, Damian. "Native Americans of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Part 2): Ohlone Culture," The California Frontier Project, 30 Apr. 2018. <https://www.californiafrontier.net/ohlone-tribe-culture/#Games>. Accessed 11 Oct. 2022.

Boats connect to Monterey fishing heritage. Monterey Bay Aquarium. <https://www.montereybayaquarium.org/stories/boats-connect-monterey-history>. Accessed 14 Oct. 2022.

Cartier, Robert. "An Overview of Ohlone Culture," Santa Cruz Public Libraries Local History Collection.

Davis, James T. "Trade Routes and Economic Exchange among the Indians of California," *Repor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rchaeological Survey*, no. 54 (31 Mar. 1961), pp. 1-71.

Day, Mark R. "Aboriginal Pathways and Trading Routes Were California's First Highways," ICT, 13 Sep. 2018. <https://indiancountrytoday.com/archive/aboriginal-pathways-and-trading-routes-were-californias-first-highways>. Accessed 12 Oct. 2022.

Hemingway, Heather. "From Peace to Present: A Look at the Ohlone Indians," Monterey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1996. <http://mchsmuseum.com/ohlonepeace.html>. Accessed 11 Oct. 2022.

- Hudson, Travis. "Patterns of Chumash Names," *The Journal of California Anthropology*, vol. 4, issue 2 (1977), pp. 259-272.
- Kidder, Norm. "Acorn Granaries of California," *Primitive Ways*, 2004. <https://www.primitiveways.com/acorn%20granary.html>. Accessed 10 Oct. 2022.
- Loeb, E. M. "The Western Kuksu Cul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graphy*, vol. 39, no. 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32), pp. 1-137.
- Margolin, Malcolm. *The Ohlone Way: Indian Life in the San Francisco-Monterey Bay Area* (Heyday Books: Berkeley, CA, 1978).
- Marino, Anika & Elise Hsu. "The Ramaytush Ohlone: Prevalent, yet absent from Carlmont education," *Scot Scoop* (Carlmont High School, 15 Feb. 2022). <https://scotscoop.com/the-ramaytush-ohlone-prevalent-yet-absent-from-carlmont-education/>. Accessed 7 Oct. 2022.
- "Monterey Bay Discovered," *Adventures of a Home Town Tourist*, 24 Sep. 2012. <https://carmelbytheseaca.blogspot.com/2012/09/monterey-bay-discovered.html>. Accessed 11 Oct. 2022.
- Ortiz, Beverly R. *Ohlone Curriculum*. East Bay Regional Park District, 2015.
- Rubenstein, Steve. "Reeds, hands and old ways come together to make Ohlone boat to paddle to Alcatraz,"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1 Oct. 2019. <https://www.sfchronicle.com/bayarea/article/Reeds-hands-and-old-ways-come-together-to-make-14515025.php>. Accessed 14 Oct. 2022.
- Seipel, Tracy. "Tule Magnificent: Linda Yamane's tule reed boats honor Ohlone tradition, ancient technologies," *Santa Clara Magazine*, 26 Nov. 2019. <https://magazine.scu.edu/magazines/winter-2019/tule-magnificent/>. Accessed 14 Oct. 2022.
- Selkowitz, Jourdan. "Family and Life Cycle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the Ohlone Native People," *California First People's Research Paper*, date unknown, 12 pages.
- Squier, Robert J. "The Manufacture of Flint Implements by the Indians of Northern and Central California," in *Papers on California Archaeology*. Repor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rchaeological Survey, no. 19 (Salinas, California: Coyote Press), pp. 15-37.
- "Transportation," *Primitive Ways*. http://www.primitiveways.com/Labiste_gallery15.html. Accessed 14 Oct. 2022.
- Tule Boat Youth Education Project*. Costanoan Rumen Carmel Tribe. <https://www.costanoanrumsen.org/tule-boats.html>. Accessed 14 Oct. 2022.
- Woozy. "Ohlone Indian girls name and any other west coast native american info," *Drift*, 31 Aug. 2012. <https://absolutewrite.com/forums/index.php?threads/ohlone-indian-girls-name-and-any-other-west-coast-native-american-info.253521/>. Accessed 8 Oct. 2022.
- 来自郊狼丘地区公园游客中心(Coyote Hills Regional Park Visitor Center)的材料如下:
Black-Tailed Deer: Resource for Native Peoples. Recorded 24 Sep. 2022.
Tule Boat Voyage. Recorded 24 Sep. 2022.
- 村庄景象复原图为:
 Depiction of Puristac, a Ramaytush village in what is now Pacifica, by Amy Host & Linda Yamane, 2019.
 Yamane, Linda. "Life in an Ohlone Village Near San Francisco Bay," *Golden Gate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Apr. 2019. <https://www.nps.gov/articles/ohlonevillagelife.htm>. Accessed 8 Oct. 2022.
- 鹿皮猎人图画来自:
 Yamane, Linda. "A Rich Native Heritage," *Santa Lucia Conservancy*. <https://slconservancy.org/inspire/native-american-culture/>. Accessed 11 Oct. 2022.
- 蒙特雷湾水族馆的莎草舟演示照片来自:
 Segal, Elysia. "WINTER 2018 -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Building the Perfect Program (Michelle Myers)," *International Museum Theatre Alliance*, 26 Feb. 2018. <http://www.imtal-us.org/insights-articles/5877522>. Accessed 14 Oct. 2022.
- 两幅渔民图画分别来自:
 By Maureen Self, from *Shellmound, Ohlone Heritage Site and Sacred Grounds*, <https://shellmound.org/learn-more/>. Accessed 11 Oct. 2022.
 Illustration by Louis Chorus of California Indians traveling through the San Francisco Bay-Delta Estuary, 1816. Courtesy of The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以下是一些和奥隆尼语言相关的词汇表：

- Shaul, David L. & Louise J. Miranda Martinez. "Lex Welel - Our Language," Ohlone Costanoan Esselen Nation. <http://www.ohlonecostanoanesselenation.org/Language.html>. Accessed 11 Oct. 2022.
- Warner, Natasha et al. *Mutsun-English English-Mutsun Dictionary*,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Conservation Special Publication No. 11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 Winegarner, Beth. "First Names: San Francisco's Ramaytush People and Language," 18 June 2020. <https://www.bethwinegarner.com/bite-sized-blog/2020/6/18/first-names-san-franciscos-ramaytush-people-and-language>. Accessed 11 Oct. 2022.

2-1 西班牙人殖民新世界

- Álvarez-Nogal, Carlos & Leandro Prados de la Escosura. *The Rise and Fall of Spain (1270-1850)*. Universidad Carlos III de Madrid, Apr. 2011.
- Anderson, James. "Historical Gold Silver Ratio Long Term and Now," SD Bullion, 30 Sep. 2019. <https://sdbullion.com/blog/historical-gold-silver-ratio-long-term-and-now>. Accessed 15 Oct. 2022.
- Blackmar, Frank W. "Spanish Colonial Policy,"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ug. 1900, 3rd Series, vol. 1, no. 3, Essays in Colonial Finance by Member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900), pp. 112-143.
- Bovey, Alixe. "Peasants and their role in rural life," British Library, 30 Apr. 2015. <https://www.bl.uk/the-middle-ages/articles/peasants-and-their-role-in-rural-life>. Accessed 14 Oct. 2022.
- Cartwright, Mark. "The Gold of the Conquistadors," World History Encyclopedia, 25 July 2022. <https://www.worldhistory.org/article/2045/the-gold-of-the-conquistadors/>. Accessed 15 Oct. 2022.
- Chen, Yao et 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Spanish money supply, 1492-181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81 (2021), no. 101401, 26 pages.
- Cherny, Robert W. et al. *Competing Visions: A History of California* (SMC Book Gallery, 2021).
- Davis, Ryan S. "The Lasting Consequences of Plague in Siena,"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2005. <https://www.montana.edu/historybug/yersiniaessays/davis.html>. Accessed. 14 Oct. 2022.
- "English, French, and Spanish Colonies: A Comparison," Media Projects Incorporated, Facts on Files Inc.
- Fisher, J. R. "Gold in the Search for the Americas," *Gold Bulletin*, vol. 9 (1976), pp. 58-63.
- Gelman, Judith R. *The English Economy Following the Black Death*. 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Bureau of Economics, Nov. 1982.
- Hurley, Denis. "Spanish Colonial Economies: An Overview of the Economy of the Viceroyalty of Peru, 1542-1600," Cornell Historical Society, 2011.
- Klein, Alexander et al.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300-1850: Some Preliminary Estimates," Leverhulme Trust, Reference Number F/00215AR, 14 Dec. 2009.
- Modern Jewish History: The Spanish Expulsion (1492)*. Jewish Virtual Library.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the-spanish-expulsion-1492>. Accessed 15 Oct. 2022.
- Moses, Bernard. "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Spai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4 (Sep. 1893), pp. 513-534.
- Pamuk, Sevket.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across Europe, 1300-1600,"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 (2007), pp. 289-317.
- "Spanish California,"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collections/california-first-person-narratives/articles-and-essays/early-california-history/spanish-california/>. Accessed 18 Oct. 2022.
- Stack, Bill. "Native American Gold," United States Gold Bureau, 15 May 2018. <https://www.usgoldbureau.com/news/native-american-gold>. Accessed 17 Oct. 2022.
- "The Spanish Colonization of Florida," HistoryMiami Museum, 2006. <https://historymiami.org/exhibition/the-spanish-colonization-of-florida/>. Accessed 18 Oct. 2022.
- "Unit 1 - Spain in the New World to 1600," National Park Service, 14 Apr. 2015. <https://www.nps.gov/fora/learn/education/unit-1-spain-in-the-new-world-to-1600.htm>. Accessed 15 Oct. 2022.
- Vidal-Robert, Jordi.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Spanish Inquisition's Motivations and Consequences," Job Market Paper, Oct. 2011.

Youngs, Les. *Map of California Historic Gold Mines*.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 Division of Mines and Geology, 1998.

两幅原住民开矿的图片分别来自：

Image of Potosí from Antonio de Herrera y Tordesillas, *Historia general* (Antwerp: Juan Bautista Verdussen, 1728). 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 at Brown University.

An engraving by Theodor de Bry, of Indians mining gold in Hispaniola, from Fisher, J. R. “Gold in the Search for the Americas,” *Gold Bulletin*, vol. 9 (1976), pp. 60.

圣雅各之路的地图摘自：

By Manfred Zentgraf, Volkach, Germany - Manfred Zentgraf, Volkach, Germany, CC BY-SA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748316>.

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地区殖民地的地图摘自维基公有资料：

Giggette, CC BY-SA 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2-2 加州传教所体系的建立

A Short History of Florida. Museum of Florida History.

Alden, Dauril. “The Population of Brazil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 Preliminary Study,”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3, no. 2 (1963), pp. 173-205.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Outbreak,” National Army Museum. <https://www.nam.ac.uk/explore/american-war-independence-outbreak>. Accessed 21 Oct. 2022.

“California,” The Mavens’ Word of the Day, 26 Apr. 200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11221113408/http://www.randomhouse.com/wotd/index.pperl?date=20000426>. Accessed 28 Oct. 2022.

Carter, Clarence E. “The Beginnings of British West Florida,” *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 4, no. 3 (Dec. 1917), pp. 314-341.

Dahl, Fermín Reygadas et al. “Tezontle in Spanish Colonial Baja California,” *Pacific Coast Archaeological Society Quarterly*, vol. 51, no. 3 & 4 (2015), pp. 117-131.

Deagan, Kathleen A. “Spanish Florida as Part of the Circum-Caribbean Colonial Sphere,” presented at Proceeding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reh Man, Fl. 1983.

Jackson, Robert H. *Jesuits in Spanish America before the Suppression* (Brill, 2021).

King, Matt. “A History of the French Quarter,” French Quarter Citizens, 23 Oct. 2011. <https://frenchquartercitizens.org/a-history-of-the-french-quarter/>. Accessed 24 Oct. 2022.

Landers, Jane. “Spanish Sanctuary: Fugitives in Florida, 1687-1790,” *The Florida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62, no. 3 (Jan. 1984), pp. 296-313.

Mapp, Paul. “The Spanish Empire and the Seven Years’ War,” Common Place, Sep. 2000. <http://commonplace.online/article/the-spanish-empire-and-the-seven-years-war/>. Accessed 24 Oct. 2022.

McCaa, Robert. “The Peopling of Mexico from Origins to Revolution (preliminary draft),” in Steckel, Richard & Michael Haines (e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Dec. 1997. <https://users.pop.umn.edu/~rmccaa/mxpoprev/cambridg3.htm>. Accessed 21 Oct. 2022.

McLachlan, Jean. “The Seven Years’ Peace, and the West Indian Policy of Carvajal and Wall,”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53, no. 211 (July 1938), pp. 457-477.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1600-1800 A.D.,” The Met, Heilbrunn Timeline of Art History. <https://www.metmuseum.org/toah/ht/09/ca.html>. Accessed 21 Oct. 2022.

Morse, Richard M. “Trends and Patterns of Latin American Urbanization, 1750-1920,”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6, no. 4 (Sep. 1974), pp. 416-447.

Patterson, Julia Bendimez et al. “The Missions and Camino Real of Baja California: A Binational View,” *Boletín of California Missions Foundation*, vol. 32, no. 1 (2016), pp. 120-141.

Pearce, Adrian J. “The Peruvian Population Census of 1725-1740,”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36, no. 3 (2001), pp. 69-104.

Peterson, Robert. “California, Calafia, Khalif: The Origin of the Name ‘California’,” KCET, 15 Dec. 2015. <https://www.kcet.org/shows/departures/california-calafia-khalif-the-origin-of-the-name-california>. Accessed 28 Oct. 2022.

- “Population in the Colonial and Continental Periods,” in Rossiter, W. S. *A Century of Population Growth*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01), pp. 3-15.
- Priestley, Herbert Ingram. *José de Gálvez: Visitor-General of New Spain (1765-1771)*, in Stephens, H. Morse & Herbert E. Bolton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History, Vol. V*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16).
- “Saint Junipero Serra,”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https://www.usccb.org/offices/general-secretariat/saint-junipero-serra>. Accessed 30 Oct. 2022.
- “The Duel for North America, 1608-1763,” in Kennedy, David M. & Lizabeth Cohen, *The American Pageant* (15e) (Cengage Learning, 2012), pp. 109-125.
- “The European Competition for North America: The British & American Colonial Perspective: A Sampling, 1699-1763,” 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 Resource Toolbox, 2009.
- “The Four (+1) California Presidios,” California Mission Guide, 2015. <http://californiamissionguide.com/california-mission-history/the-presidios-spanish-outposts-in-alta-california/>. Accessed 30 Oct. 2022.

波托拉肖像画引自：

Exposició Gaspar de Portolà en California, Public Domai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83122620>.

加尔韦兹肖像画引自：

By Unknown author. Public Domai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75996777>.

塞拉神父肖像画引自：

Bardell Art Ptg. Co. *Father Junipero Serra*, Museum of Ventura County, undated. <https://calisphere.org/item/8224442c8fac10de4f07f6741f922f7c/>. Accessed 30 Oct. 2022.

下加利福尼亚半岛上的Misión de Nuestra Señora de Loreto Conchó版画引自：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21873>.

2-3 圣何塞传教所的奠基和早期发展

- “Barcenilla, Isidro,”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University of Arizona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BID Number: 19301). <https://uair.library.arizona.edu/item/237966>. Accessed 4 Nov. 2022.
- Barba, Lloyd D. “California’s Cross: A Cultural History of Pentecostalism, Race, and Agricultur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16.
- Barton, Bruce Walter. *The Tree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 Story of the California Missions* (Ross-Erikson Publishers, Inc.: Santa Barbara, 1980).
- “Building with Adobe Brick Technique,” Solid Earth Adobe Buildings. <https://www.solidearth.co.nz/earthbuilding-information/building-with-adobe-brick-technique/>. Accessed 7 Nov. 2022.
- “Concepcion Arguello & Nikolai Rezanov: A Presidio Love Story,” Golden Gate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Presidio of San Francisco, 27 Jan. 2022. https://www.nps.gov/people/concepcionarguello_nikolairezanov.htm. Accessed 6 Nov. 2022.
- Farris, Glenn. “The Age of Russian Imperialism in the North Pacific,” *Kroeber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Papers*, no. 81 (date unknown), pp. 187-194.
- Forbes, A. S. C. *California Missions and Landmarks: El Camino Real* (3 ed., rev.) (Los Angeles, 1915).
- Guinn, J. M. *El Camino Real* (Los Angeles, 1906).
- Holmes, Philip. *Two Centuries at Mission San Jose, 1797-1997* (Fremont Museum of Local History: Fremont, 1997).
- Isham, Mindy & Gary Dorighi. *The Story of Mission San José* (Mission San José: Fremont, 2020).
- Kurillo, Max & Erlene M. Tuttle. *California’s El Camino Real and Its Historic Bells* (Sunbelt Publications: San Diego, 2000).
- Milliken, Randall et al. *Ohlone/Costanoan Indians of the San Francisco Peninsula and their Neighbors, Yesterday and Today*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Consultants: Oakland, CA, June 2009).
- Nava, Yolanda. “A Road Over Time: El Camino Real and America’s New Mexican Roots,” *El Palacio* (Museum of New Mexico, unspecified date), pp. 10-15.

Patterson, Julia Bendímez et al. “The Missions and Camino Real of Baja California: A Binational View,” *Boletín of California Missions Foundation*, vol. 32, no. 1 (2016), pp. 120-141.

Petrov, Alexander & Dawn Lea Black. “Natalia Shelikov: Her Unique and Influential Involvement in the Mercantile and Imperial Russian Arenas,” Fort Ross Conservancy Library (undated), 3 pages.

Pierce, Richard A. (ed.) *Rezanov Reconnoiters California, 1806* (The Book Club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1972), online scanned copy accessed through Fort Ross Conservancy Library.

“Spanish California,”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collections/california-first-person-narratives/articles-and-essays/early-california-history/spanish-california/>. Accessed 4 Nov. 2022.

“The Royal Road, aka The King’s Highway,” El Camino Real, 2015. <http://californiamissionguide.com/california-mission-history/el-camino-real/>. Accessed 4 Nov. 2022.

“Timeline of San José History,” San José Public Library. <https://www.sjpl.org/sjhistory>. Accessed 4 Nov. 2022.

“Trails and Roads: El Camino Real,” California Highways, 2020. <https://www.cahighways.org/elcamino.html>. Accessed 4 Nov. 2022.

Von Langsdorff, G. H. *Voyages and Travel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during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1806, and 1807, Part II* (Henry Colburn, English and Foreign Public Library: London, 1814).

圣何塞传教所奠基仪式的复原画作由本地画家 Harold “Hal” Booth 所作，似乎有两个略微不同的版本。一个版本登载于 Holmes, *Two Centuries at Mission San Jose*; 这里所采用的版本来自：“Tri-City History in Photographs,” Washington Township Museum of Local History, 2022. <https://museumoflocalhistory.org/tri-city-history-in-photographs/>. Accessed 4 Nov. 2022.

圣何塞传教所1797年复原图由 Al Gregor 创作，来自：*Mission San José 225th Anniversary*. Mission San Jose, 2022. <https://mission225.org/walking-tours>. Accessed 4 Nov. 2022.

多洛雷斯传教所的明信片图片由 Eric Fischer 提供给：

Smith, Heather. “Mission Dolores: Ours Once Again,” Mission Local, 25 Sep. 2010. <https://missionlocal.org/2010/09/the-mission-dolores-ours-once-again/>. Accessed 2 Nov. 2022.

娜塔莉亚·谢里科娃的肖像来自：

Unknown author - <http://radiovera.ru/grigoriy-i-natalya-shelihovyi.html>, Public Domai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60143445>.

列扎诺夫的肖像来自：

Nikolai Petrovich Rezanov. Date unknown. Unknown artist. Photograph of an engraving. Collection of Oakland Museum of California. The Oakland Tribune Collection. Gift of Alameda Newspaper Group. Link at: <https://picturethis.museumca.org/pictures/nikolai-petrovich-rezanov>. Accessed 6 Nov. 2022.

朗格多夫的肖像来自：

Hércules Florence (1804 - 1879) - <http://www.sergiosakall.com.br/montagem/langsdorff.jpg>, Public Domai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308441>.

康瑟希昂·阿圭罗的肖像来自：

“Concha Arguello,” Santa Barbara Historical Museum. <https://www.sbhistorical.org/concha-arguello/>. Accessed 6 Nov. 2022.

圣何塞传教所土坯教堂的老照片来自：

Historic American Buildings Survey, Creator, Archbishop Of San Francisco, Saint Joseph Parish, Francisco Father-Presidente De Lausen, Luis Gonzaga Gil Y Taboada, Narciso Duran, Isidore Barcenilla, et al., Kerrigan, Robert W, photographer. Mission San Jose de Guadalupe, Mission & Washington Boulevards, Fremont, Alameda County, CA. California Fremont Alameda County, 1933. Documentation Compiled After. Photograph. <https://www.loc.gov/item/ca0006/>.

加州传教所的分布图来自：

Shruti Mukhtyar - Provided to me by author for upload, CC BY-SA 4.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2904365>.

2-4 传教所的政治与经济

- Bacich, Damian. "California Mission Founders: Names, Dates and Bios," The California Frontier Project, 17 Mar. 2017. https://www.californiafrontier.net/mission-founders/#Fr_Narciso_Duran_1776-1846. Accessed 7 Nov. 2022.
- Bacich, Damian. "Land Grants in Alta California," The California Frontier Project, 25 Feb. 2020. https://www.californiafrontier.net/land-grants-in-alta-california/#Missions_and_Land_Grants_in_Alta_California. Accessed 8 Nov. 2022.
- Barton, Bruce Walter. *The Tree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 Story of the California Missions* (Ross-Erikson Publishers, Inc.: Santa Barbara, 1980).
- Christiansen, Paige W. "The Presidio and the Borderlands: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the West*, vol. 8, no. 1 (Jan. 1969), pp. 29-37.
- Crane, Clare B. "The Pueblo Lands," *The Journal of San Diego History*, vol. 37, no. 2 (Spring 1991).
- Glass, Fred. "Native Americans in the Mission Economy," FoundSF. https://www.foundsf.org/index.php?title=NATIVE_AMERICANS_in_the_MISSION_ECONOMY. Accessed 10 Nov. 2022.
- Gomez, Placido. "The History and Adjudication of the Common Lands of Spanish and Mexican Land Grants," *Symposium on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Law*, vol. 25, issue 4 (Fall 1985), pp. 1039-1080.
- Habig, Marion A. "The Franciscan Provinces of Spanish North America," *The Americas*, vol. 1, no. 1 (Jul. 1944), pp. 88-96.
- Habig, Marion A. "The Franciscan Provinces of Spanish North America [Concluded]," *The Americas*, vol. 1, no. 3 (Jan. 1945), pp. 330-344.
- Hackel, Steven W. "Land, Labor, and Production: The Colonial Economy of Spanish and Mexican California," in Gutiérrez, Ramón A. & Richard J. Orsi (ed.), *Contested Eden: California Before the Gold Rus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98), pp. 112-138.
- Hackel, Steven W. "The Staff of Leadership: Indian Authority in the Missions of Alta California,"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54, no. 2 (Apr. 1997), pp. 347-376.
- Holmes, Philip. *Two Centuries at Mission San Jose, 1797-1997* (Fremont Museum of Local History: Fremont, 1997).
- Jackson, Robert H. "Durán, Fray Narciso (1776-1846)," [encyclopedia.com](https://www.encyclopedia.com/humanities/encyclopedias-almanacs-transcripts-and-maps/duran-fray-narciso-1776-1846). <https://www.encyclopedia.com/humanities/encyclopedias-almanacs-transcripts-and-maps/duran-fray-narciso-1776-1846>. Accessed 7 Nov. 2022.
- Kashevaroff, A.P. "Fort Ross - An Account of the Russian Settlement in San Francisco Bay," *Alaska* (1926), reprinted by Fort Ross Conservancy Library, 10 pages.
- Mitchell, Kathryn E. "Fort Ross, Russian Colony in California, 1811-1841," Master's Thesis,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1984.
- Orbann, Carolyn Marie. "Traditional Kinship Structures and European-derived Diseases at Mission San Diego, California: A Study of the 1805-1806 Measles Epidemic,"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May 2014.
- Pitti, Stephen J. *The Devil in Silicon Valley: Northern California, Race, and Mexican America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3).
- Servín, Manuel P.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California Missions: A Reappraisal," *Southern California Quarterly*, vol. 47, no. 2 (June 1965), pp. 133-149.
- Williams, Mary Floyd. "Mission, Presidio and Pueblo: Notes on California Local Institutions under Spain and Mexico,"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vol. 1, no. 1 (Jul. 1922), pp. 23-35.
- Wright, Robert E. "Spanish Missions," Texas Stat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 Feb. 1996. <https://www.tshaonline.org/handbook/entries/spanish-missions>. Accessed 8 Nov. 2022.
- 本节中所使用的圣何塞传教所草图列表如下：
- Greger, Al. *Conceptional View of Mission San Jose - ca. 1830*. Reprinted in Holmes, *Two Centuries at Mission San Jose, 1797-1997*.
- Smyth, William. *Mission San Jose as drawn by William Smyth during his visit with the Beechey Expedition in 1826*. Reprinted in Holmes, *Two Centuries at Mission San Jose, 1797-1997* and digitally accessible at <https://mission225.org/images-of-mission-san-jose/historical-drawings>.

圣何塞传教所的彩色平面图来自美国土地局(U.S. Land Office)1854年的记录, 引自:
San José. California Missions, 2022. <https://www.missionscalifornia.com/missions/san-jose/>. Accessed 8 Nov. 2022.

奥隆尼生徒在传教所内聚众赌博的图画来自:

Painting by Louis Choris, Bancroft Library, Berkeley, CA (brk00000869 24a).

罗斯要塞的版画来自:

Meares, Hadley. "From Russia with Love: Fort Ross and Russia's Failed Attempt to Conquer California," KCET, 2 Aug. 2017. <https://www.kcet.org/shows/california-coastal-trail/from-russia-with-love-fort-ross-and-russias-failed-attempt-to-conquer-california>. Accessed 11 Nov. 2022.

2-5 杜兰神父和传教所的宗教活动

Bowman, J. N. "The Number of California Indians Baptised During the Mission Period: 1770 to 1834,"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Quarterly*, vol. 42, no. 3 (Sep. 1960), pp. 273-277.

"Brief history of the Organ in the Church," a partial synopsis of Williams, Peter. *A New History of the Organ: from the Greeks to the Present Da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1 Mar. 2020.

Drake, Joshua. "Birth of the Pipes: The Organ from its Beginnings through the Baroque Era," Cedarville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Symposium, 20 Apr. 2016.

Durán, Narciso & Francis Price (trans.). "Letters of Narciso Durán: From the Manuscript Collections in the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Library,"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vol. 37, no. 3 (Sep. 1958), pp. 241-265.

Durán, Narciso & Francis Price (trans.). "Letters of Narciso Durán: From the Manuscript Collections in the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Library (Concluded),"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vol. 37, no. 2 (Jun. 1958), pp. 97-128.

Geiger, Maynard. "Harmonious Notes in Spanish California," *Southern California Quarterly*, vol. 57, no. 3 (Fall 1975), pp. 243-250.

Hackel, Steven W. "The Staff of Leadership: Indian Authority in the Missions of Alta California,"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54, no. 2 (Apr. 1997), pp. 347-376.

"History of marriage in California facts for kids," *Kiddle Encyclopedia*, 29 Oct. 2022. https://kids.kiddle.co/History_of_marriage_in_California. Accessed 13 Nov. 2022.

Holmes, Philip. *Two Centuries at Mission San Jose, 1797-1997* (Fremont Museum of Local History: Fremont, 1997).

Martin, Andrew. "For the Kindling of Devotion," *The Valley Village View*, 5 Jan. 2020. <https://valleyvillage.home.blog/tag/fr-narciso-duran/>. Accessed 14 Nov. 2022.

Newell, Quincy D. "'The Indians generally love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Native American marriage and sexual practices in Missions San Francisco, Santa Clara, and San Jose,"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91, issue 1 (Jan. 2005), accessed via Gale Academic Onefile.

Newell, Quincy D.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Baptized Indians at Mission San Francisco de Asís, 1776-1821,"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vol. 32, no. 4 (Fall 2008), pp. 412-442.

"Ornaments, Ecclesiastical," in Strong, James & John McClintock, *The Cyclopaedia of Biblical, Theological, and Ecclesiastical Literature* (Harper and Brothers: New York, 1880), accessed via McClintock and Strong Biblical Cyclopaedia, <https://www.biblicalcyclopedia.com/O/ornaments-ecclesiastical.html>. Accessed 11 Nov. 2022.

Rosales, Manuel.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anish-Style Organ," Westfield Center for Keyboard Studies Symposium "The Historical Organ in America," Jan. 1992. <http://www.rosales.com/instruments/op14/index.htm>. Accessed 14 Nov. 2022.

Wright, Carroll D. *Comparative Wages, Prices, and Cost of Living* [From the Six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assachusetts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Labor, for 1885] (Wright & Potter Printing: Boston, 1889).

传教所教堂剖面图来自:

Barton, Bruce Walter. *The Tree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 Story of the California Missions* (Ross-Erikson Publishers, Inc.: Santa Barbara, 1980), pp. 3.

传教所内部的照片来自：

Hsieh, Wayne. "Mission San Jose Chapel Interior," Flickr, 2 Sep. 2018. <https://www.flickr.com/photos/whsieh78/46440827215>. Accessed 11 Nov. 2022.

杜兰神父和生徒的黑白版画来自：

De Mofras, Eugène Dufloy. *Exploration Du Territoire De L'Oregon, Des Californies Et De La Mer Vermeille, Exécutée Pendant Les Années 1840, 1841 Et 1842* (Paris, 1844). Accessed from "San José," California Missions, <https://www.missionscalifornia.com/missions/san-jose/>. Accessed 13 Nov. 2022.

合唱谱的图片来自：

Choirbook in the hand of Father Narciso Durán. Santa Clara University Archives & Special Collections, SCU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s://content.scu.edu/digital/collection/p17268coll8/id/27>.

两名方济各会会士和大幅合唱谱的合影来自：

Monks displaying an illuminated score at Mission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ca. 1904.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Digital Library,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 1860-1960. Unique identifier UC141143. <https://doi.org/10.25549/chs-m16667>.

杜兰神父和原住民乐团的图画来自：

Harmer, Alexander. *San José Mission Band Led by Fr. Narciso Durán*, undated. Colorized by Pentacle Press LLC., 2014. Accessed from "San José," California Missions, <https://www.missionscalifornia.com/missions/san-jose/>. Accessed 14 Nov. 2022.

圣何塞传教所内部大管风琴的照片来自传教所官网：

<https://missionsanjose.org/rosales-opus-14-organ>. Accessed 14 Nov. 2022.

2-6 传教所外的世界

Bauer, Arnold J. "The Church in the Economy of Spanish America: Censos and Depósitos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3, no. 4 (Nov. 1983), pp. 707-733.

Blakemore, Erin. "The Louisiana Purchase was a bargain. But it came at a great human cost," *National Geographic*, 30 Apr. 2020.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history/article/louisiana-purchase-bargain-came-great-human-cost>. Accessed 12 Dec. 2022.

Bowman, J. N. "The Peraltas and Their Houses,"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vol. 30, no. 3 (Sep. 1951), pp. 217-231.

De la Teja, Jesús "Frank". "Mex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Texas Stat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8 Aug. 2018. <https://www.tshaonline.org/handbook/entries/mexican-war-of-independence>. Accessed 15 Dec. 2022.

"Distant Neighbors: The U.S.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 (1753-1811)," Hispanic Reading Room,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rr/hispanic/mexico/hidalgo3.html>. Accessed 15 Dec. 2022.

Doe, Nick. "British Columbia's Mexican Connection: The Naval Base at San Blas 1768-1810," *BC Historical News*, vol. 34, no. 4 (Fall 2001), pp. 4-7.

Durán, Narciso & Francis Price (trans.). "Letters of Narciso Durán: From the Manuscript Collections in the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Library,"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vol. 37, no. 3 (Sep. 1958), pp. 241-265.

Durán, Narciso & Francis Price (trans.). "Letters of Narciso Durán: From the Manuscript Collections in the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Library (Concluded),"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vol. 37, no. 2 (Jun. 1958), pp. 97-128.

Hamnett, Brian 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imension of the Revolution of Independence in Mexico, 1800-1824," *Ibero-amerikanisches Archiv*, vol. 6, no. 1 (1980, Neue Folge), pp. 1-27.

- Irwin, Douglas A. "Historical Aspects of US Trade Policy," *The Reporter*, no. 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ep. 2006). <https://www.nber.org/reporter/summer-2006/historical-aspects-us-trade-policy>. Accessed 13 Dec. 2022.
- Irwin, Douglas A. "Revenue or Reciprocity? Founding Feuds over Early U.S. Trade Policy," in *Founding Choices: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790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 89-120.
- Irwin, Douglas A. "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1763-1789," in *Clashing over Commerce: A History of U.S. Trade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p. 31-67.
- "Luis Maria Peralta Adobe," National Park Service, Early History of the California Coast, undated. <https://www.nps.gov/nr/travel/ca/ca32.htm>. Accessed 14 Nov. 2022.
- Mack, Graeme. "Seaborne Sovereignities: Pacific Trade and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Commercial Maritime Imperialism, 1787-184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22.
- Odgen, Adele. "The First Yankee Traders in Spanish California, 1796-1805," in *The California Sea Otter Trad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1, reprinted 2019), pp. 32-44.
- Onuf, Peter. "Thomas Jefferson: Foreign Affairs," Miller Cente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https://millercenter.org/president/jefferson/foreign-affairs>. Accessed 12 Dec. 2022.
- Ostrander, Gilman M. "The Colonial Molasses Trade,"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30, no. 2 (Apr. 1956), pp. 77-84.
- "Peraltas and Native Americans, 1807-1821," Peralta Hacienda Historical Park, undated.
- Plan of Iguala [Translation]*, Rice University. <https://scholarship.rice.edu/jsp/xml/1911/20697/3/aa00005tr.tei.html>. Accessed 2 Jan. 2023.
- Rodríguez O., Jaime E. "New Spain and the 1808 Crisis of the Spanish Monarchy," *Mexican Studies/Estudios Mexicanos*, vol. 24, no. 2 (Summer 2008), pp. 245-287.
- "Ships & Shipbuilding,"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National Park Service. <https://www.nps.gov/nr/travel/maritime/ships.htm>. Accessed 11 Dec. 2022.
- Stauffer, Brian & Salvador Salinas. "Independence, Revolution, and Celebration in Mexico: 1810, 1910, and 2010," University of Texas, 2010.
- Stoltz III, Joseph F. *The U.S. Army Campaigns of the War of 1812 - The Gulf Theater 1813-1815*.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Washington D.C., 2014).
- Thurman, Michael 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San Blas and Its Initial Naval Fleet: 1767-1770,"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3, no. 1 (1963), pp. 65-77.
- Timmons, W. H. "The Hidalgo Revolt. Prelude to Mexican Independenc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7, no. 4 (1967), pp. 574-575.
- Tutino, John. "Breaking New Spain, 1808-21: Remaking Power, Production, and Patriarchy before Iguala," *Mexican Studies/Estudios Mexicanos*, vol. 37, no. 3 (2021), pp. 367-393.
- Woodward, Margaret L. "The Spanish Army and the Loss of America, 1810-1824,"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8, no. 4 (1968), pp. 586-607.
- 一些材料来自佛利蒙市内相关历史公园自行印发的材料，包括：
 "The Ohlones and the Mission San Jose," Rancho Higuera Historical Park.
 "The Rancho del Agua Caliente and The Higuera Adobe," Rancho Higuera Historical Park,
 费尔南多七世和伊图尔维德的肖像都来自相对的维基百科页面。
 路易斯·佩拉塔的肖像来自：
 "Spanish & Mexican Era - 1760s to 1840s," Emeryville, California. <https://www.ci.emeryville.ca.us/658/Spanish-Mexican-Era-1760s-to-1840s>. Accessed 14 Nov. 2022.
- 1830年代波士顿港的油画来自国会图书馆，可以参见：
 Begley, Andrew J. "Searching for Caption Blue: Exploring Maritime Records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Boston and Beyond," *Prologue Magazine*, vol. 49, no. 1 (Spring 2017). <https://www.archives.gov/publications/prologue/2017/spring/blye-maritime-records>. Accessed 11 Dec. 2022.
- 波士顿港的黑白版画由William Burgis在1743年创作，参见：
A South East View of ye Great Town of Boston in New England in America. Accessed from Baker, William Avery. "Vessel Types of Colonial Massachusetts," *Publications of The Colonial Society of Massachusetts*, vol. 52 (1980). <https://www.colonialsocty.org/node/1977>. Accessed 11 Dec. 2022.
- 詹姆斯·门罗总统肖像画由Thomas Sully创作于1829年，目前展出于美国国务院接待厅，参见：

Portrait Bust of James Monroe. The Diplomatic Reception Room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diplomaticrooms.state.gov/objects/portrait-bust-of-james-monroe/>. Accessed 13 Dec. 2022.

米格尔·伊达尔戈的壁画来自：

“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Miguel-Hidalgo-y-Costilla>. Accessed 15 Dec. 2022.